

发现中国™

彩色插图珍藏本

唐代 的外来文明

189 幅绘画精品

106 件文物珍宝

解读

[美] 爱德华·谢佛 / 著

吴玉贵 / 译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Edward Scheer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观中国
彩色插图珍藏本

唐代 的外来文明

189 幅绘画精品
106 件文物珍宝
解读

【美】爱德华·谢希 / 著
吴玉贵 / 译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Edward Schuler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制作者：吃个大鸭梨

目录

Content

[第一章 大唐盛世历史概况（1）（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历史概况（2）（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历史概况（3）（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历史概况（4）（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历史概况（5）（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的外国人（1）（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的外国人（2）（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商船与海路（1）（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商船与海路（2）（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商队与陆路（1）（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商队与陆路（2）（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1）（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2）（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3）（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4）（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5）（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6）（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7）（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8）（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9）（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唐朝外来居民的待遇（1）（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唐朝外来居民的待遇（2）（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唐朝外来居民的待遇（3）（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唐朝外来居民的待遇（4）（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唐朝外来居民的待遇（5）（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进贡](#)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胡风（1）（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胡风（2）（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胡风（3）（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胡风（4）（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胡风（5）（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胡风（6）（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外来事物在文学中的反映（1）（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外来事物在文学中的反映（2）（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外来事物在文学中的反映（3）（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外来事物在文学中的反映（4）（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外来事物在文学中的反映（5）（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外来事物在文学中的反映（6）（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外来事物在文学中的反映（7）（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外来事物在文学中的反映（8）（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外来事物在文学中的反映（9）（图）](#)

[第二章 人战俘（1）（图）](#)

[第二章 人战俘（2）（图）](#)

[第二章 人战俘（3）（图）](#)

[第二章 人战俘（4）（图）](#)

[第二章 人奴隶（1）（图）](#)

[第二章 人奴隶（2）（图）](#)

[第二章 人奴隶（3）（图）](#)

[第二章 人侏儒（1）（图）](#)

[第二章 人侏儒（2）（图）](#)

[第二章 人人质（图）](#)

[第二章 人贡人](#)

[第二章 人乐人和舞伎（1）（图）](#)

[第二章 人乐人和舞伎（2）（图）](#)

[第二章 人乐人和舞伎（3）（图）](#)

[第二章 人乐人和舞伎（4）（图）](#)

[第二章 人乐人和舞伎（5）（图）](#)

[第二章 人乐人和舞伎（6）（图）](#)

[第二章 人乐人和舞伎（7）（图）](#)

[第二章 人乐人和舞伎（8）（图）](#)

[第二章 人乐人和舞伎（9）（图）](#)

[第二章 人乐人和舞伎（10）（图）](#)

[第三章 家畜马（1）（图）](#)

[第三章 家畜马（2）（图）](#)

[第三章 家畜马（3）（图）](#)

[第三章 家畜马（4）（图）](#)

[第三章 家畜马（5）（图）](#)

[第三章 家畜马（6）（图）](#)

【关注公众号】：[奥丁读书小站（njdy668）](#)

- 1.每日发布新书可下载。公众号首页回复书名自动弹出下载地址。
- 2.首次关注，免费领取**16**本心里学系列，**10**本思维系列的电子书，**15**本沟通演讲口才系列，**20**本股票金融，**16**本纯英文系列，创业，网络，文学，哲学系以及纯英文系列等都可以在公众号上寻找。
- 3.我收藏了**10**万本以上的电子书，需要任何书都可以这公众号后台留言！看到第一时间必回！
- 4.也可以加微信【**209993658**】免费领取需要的电子书。
- 5.奥丁读书小站，一个提供各种免费电子版书籍的公众号，提供的书都绝对当得起你书架上的一席之地！总有些书是你一生中不想错过的！上千本电子书免费下载。

第一章 大唐盛世历史概况（1）（图）

耕获图 佚名 中唐敦煌榆林窟第25窟北壁

627年，开创者唐太宗将中国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繁荣的时代。皇帝富有创新精神的土地改革保证了农业的繁荣，边境与商路都受到军队的保护，贵族与廷臣们有充足的时间从事无聊的事情。依靠发展对外贸易发达起来的商人沉溺于最近获得的情趣中。此图客观形象地描绘了农家一年四季耕田、播种、收割、扬场等生产劳动的场景，反映了大唐盛世的平安祥和，人们过着衣食无忧的安乐生活，手法写实，形象生动传神，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你的费财、物件， 货物，水手…… 你由海上运出的货物， 就使许多国民充足， 你以许多的费财、货物， 使地上的君王丰富。 —《以西结书》，第27章，第27—32行。 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是李姓王朝统治时期的，唐朝帝国的外来物品。中世纪时，唐朝在整个亚洲地区声名显赫，而在远东地区，唐朝的声威至今还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在这里，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唐朝的历史。有唐一代历时三个世纪，这三个世纪各个阶段的历史又不尽相同，所以必须对唐朝的历史进行必要的划分，以形成一个年代框架，这

样就便于安排我们所要讨论的内容。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这样一种框架结构无疑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因为它过多地考虑了历史上的一些重大的变化，而对于那些没有变化，或者是变化很小的因素，却考虑的太少。所幸的是，我们要讨论的内容主要是限于商业和艺术方面，这样就允许我们可以比较随意地以世纪为单位，对当时的各个历史阶段进行一些大致的划分。而且我们也相信，这种划分的结果与实际情况不会相去太远。

第一章 大唐盛世历史概况（2）（图）

西州高昌县手实

唐贞观十四年至二十三年长29.5、宽18.1厘米1969年吐鲁番市哈拉和卓39号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手实是唐代在基层官吏的监督下居民自报户口、田亩以及本户赋役承担情况的登记表册，是制定计帐和户籍的主要依据，每年填报一次。由于吐鲁番地区的居民普遍有利用废旧官、私文书之类“故纸”制作附葬的鞋靴、冠带等葬俗，所以这里的古墓葬区保存下许多像本件被剪成了鞋样的古代文书。该件纪年已残，但唐是在贞观十四年灭高昌设立西州，且贞观以后为避太宗名讳，将“世业田”改称“永业田”。因此，根据文内所称“世业”，此手实的填报时间应在太宗贞观十四年至二十三年之间，即公元640—649年之间。本件与唐代史籍中记载的手实内容相同，说明唐中央政府的政令在西域地区同样贯彻执行。

七世纪是唐朝征服和移民的世纪。最初，李渊父子推翻了隋朝政权，摧毁了那些与他们的情况差不多的，野心勃勃逐鹿中原的对手。此后，又使位于现在蒙古草原的东突厥政权和位于现在东北地区与朝鲜境内的高丽、百济王国屈膝称臣，并且最终征服了西突厥政权和西域地区，即相当于现在中国突厥斯坦的古代城邦诸国的君主²，使唐朝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权。唐朝在以上边疆地区设立的军镇，使得唐朝本土以外的人和物品源源不断地流入唐朝这片乐土成为可能。在七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唐朝的物价都很低廉，经济也很稳定，这样就有可能将小块农耕地分配给农民，从而为制定出一种新的，稳定的税收制度提供了可能性。这种新的税收制度就是著名的租庸调制。租是由每个成年男性必须交纳的粮食税；调是由家庭妇女交纳丝绢或者麻布（另外要附加一份绵或麻），以此作为家庭税收；庸则是在一定的时期内为公共工程所服的劳役，庸也是由家里的男子来承担的³。

第一章 大唐盛世历史概况（3）（图）

文苑图 周文矩 南唐 卷 绢本 设色 纵31.3、横58.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这件作品以前被认为是唐代韩作，根据是画上有宋徽宗赵佶题“韩文苑图”及“天下一人”押字等。但据今人考证，此图乃五代周文矩《琉璃堂人物图》的后半部。在文人隐居时所喜爱的乡村风格的背景中，一群8世纪的文人们聚集在一起沉思和评论。其中两人（下、左）在讨论一份写成卷轴的文学作品的优点，一位诗人（下、右）正在构思一首诗歌，陷入了沉思，他的童子正在为他磨墨。这些文人们无法预言的性格与非正统的生活方式困扰着传统道德家，以致一位官员提出警告，认为艺术家是维持良好秩序的威胁。大多数唐朝皇帝不理睬这种偏见，相反，他们给予艺术家创作的自由和尊敬，这使唐朝进入了中国历史上文学丰产的豪华时代。画家驾驭人物性格、再现特定情境的功力在这一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五个人物姿态各不相同，并在变化错落中达到了和谐统一。全画着色沉着淡雅，勾线坚凝而多折，是周文矩的“战笔”画法。

七世纪是一个大迁徙的时代，这时有大批的移民迁入了现代中国的中部和南部地区，他们将这些地区看做是寻求新的机遇的地方，在他们心目中，这里也是有可能存在着大批财富的地方，当然他们之所以涌入这些不发达的地区，也是为了逃避征募、洪水以及野蛮人的入侵⁴。七世纪又是一个社会变革的时期，来自南方的地方士人通过正式的科举制度确立了他们的政治地位，而这一切都是以牺牲北方旧贵族及其与突厥文化的传统联系作为代价来实现的。在七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即武则天皇后和她的昙花一现的周帝国统治时期，这种变革达到了顶峰⁵。七世纪也是一个印度文化大量入侵的时期，伴随着印度天文学、数学、医学以及语言学等学科的涌入，佛教哲学在这时已经渗透到了唐朝上流社会的生活之中。最后，七世纪还是一个崇尚外来物品的时代，当时追求各种各样的外国奢侈品和奇珍异宝的风气开始从宫廷中传播开来，从而广泛地流行于一般的城市居民阶层之中。

第一章 大唐盛世历史概况（4）（图）

唐朝的自由

唐朝宫廷的妇女们享受着高度的自由。女子着男装是唐朝，尤其是盛唐时期流行的习俗，无论尊卑，皆为时尚。这件陶女俑（上图）出土于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的盛唐贵族墓葬，着圆领袍服，腰束带，脚穿靴，除未戴幞头外，看上去与男子无异。而公主们则写诗、打马球并介入政治，还经常超过男人。也有些贵族妇女拒绝奢华成为佛教的尼姑，下图即为王妃剃度的情景，比丘尼小心地手握剃刀，婢女或站或跪，双手托盛器，承接剃落的头发。因为人物为女性，按习惯要用布帷遮挡，人物形象生动、传神，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八世纪的唐朝历史包括了文人们（杜甫、李白和王维等）笔下的“盛唐时期”和“中唐”的大部分时期。盛唐时期一直延续到了765年⁶，而中唐则一直持续到了九世纪二十年代。中唐时期是唐王朝从深重的灾难中缓慢地得到复原的时期，而且一场真正的文化复兴运动(以韩愈、白居易和柳宗元为代表)也在这一时期发展到了其顶峰阶段⁷。以八世纪中叶为界，唐朝的历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我们可以依此将八世纪的历史划分为前后时间基本相等的两个时期。其中前五十年是唐朝处于顶峰的最辉煌的时期，而后五十年则是唐朝逐渐恢复元气和偏离发展轨道的时期。前一个时期就是盛唐时期，它相当于唐玄宗统治的那一段和平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是一个时间漫长、富足安定、物价低廉的时代，是一个“天下无贵物”的时代⁸。这时的人们可以非常便利地周游各地，“南游荆、襄，北至太原、范阳，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千里不持寸刃”⁹。在这些安全得到保障的道路上，旅客用以代步的工具是骡子和马¹⁰。为了将庸调丝绢顺利地长江口转输到京城，在历史上曾经设计了复杂的运河系统来满足漕运的需要，到了玄宗统治时代，又将这条运河系统加以改进，使它在转输丝绢的同时，也能够运送外国来的奢侈品¹¹。良好的陆路和水路交通状况，大大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但同时也很快就改变了唐玄宗这位年轻的君主的嗜好。当玄宗最初继位时，他曾经将一大批金银器玩、珠玉、锦绣等珍贵物品堆放在大殿前付之一炬，以使天下人都知道他对这种奢靡之物的鄙视。但是在短短的几年之后，当玄宗听到了广州堆积着大量的外国来的财宝的传闻时，在这种消息的诱惑下，玄宗皇帝开始对昂贵的进口货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不无嫉妒地派人监视外国贸易的情况¹²。在古老的自然经济统治下，丝绢是正式的价值尺度，它可以来与任何物品——从一头骆驼到一亩土地——进行交换¹³。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古老的自然经济开始动摇，并最终在731年¹⁴被得到官方认可的货币经济取代了。货币经济地位确立的结果，促成了经济状况的空前繁荣，而像扬州和广州这样的商业中心就更其如此¹⁵。钱币是商业机器运转的油料，钱币得到认可，为正在兴起的

商人阶层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七世纪实行的税收制度这时已经到了非放弃不可的地步了：德宗建中元年(780)，唐朝开始实行了一种新的“两税法”改革，这种新的制度规定，每年分两次用钱币来支付税收，以此取代了七世纪时以实物和人丁为主的税收制度。税收制度的这种变化也是正在发展中的货币经济的反映，而且税制的变革也大大鼓励了商人阶层的积极性¹⁶。新的金融界不仅代表了商人和中间商的全盛时代，而且也宣告了独立的自耕农的崩溃，唐朝创建初期授予自耕农的小块土地在八世纪时就已经丧失殆尽了。所以除了八世纪中叶的一段时间之外，八世纪是自由的自耕农转变为无土地者和境况凄惨的佃农的时代，也是反对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和大庄园主的时代。而这一切都是战争、徭役、以及税收所导致的结果¹⁷。

第一章 大唐盛世历史概况（5）（图）

明皇幸蜀图 李昭道 唐代 长卷 绢本 设色 纵55.9、横51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画面描绘的是唐代安史之乱时唐明皇逃往四川避难的情形。右下角，明皇骑马从山路飞奔下来，突然看见小桥，马惊而不前。先行的侍从正在一小块平地上疲惫地坐着，队伍声势浩大却狼狈不堪，艰难的蜀道的确难为了这群养尊处优的人。作者因为政治原因而着重加强了春天山岭间的诗意，层峦叠嶂中飘浮着片片白云，树木流水秀丽动人。人物虽然很小，却分毫必现，使人轻易分辨其身份。李昭道擅长青绿山水，官至太子中舍的他，传说直接参加了唐明皇的这次逃亡。对于新的文人阶层来说，玄宗统治时期是一个胜利辉煌的时代，政治家张九龄卓尔不群的一生，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张九龄生长在酷热的南方，是南方的土著人，是武人和政治家的对头，也是南方人和商人的朋友。然而，文人的辉煌并不长久，同样也正是在玄宗统治时期，特权阶层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特权阶层的胜利是随着李林甫的专权而实现的，李林甫的专权则迎合了唐玄宗希望加强政府权力的愿望¹⁸。当专权者李林甫死后，受到他庇护的安禄山(“禄山”，Rokhshan，意思是“光明”)¹⁹在河北地区“纯”汉族血统的一些氏族的支持下，立即亲自出兵，发动了反对新贵族的战争。安禄山率领麾下能征惯战的将士，从东北地区进入了黄河流域，洗劫了唐朝的东、西两京²⁰。安禄山的叛乱，使八世纪后半叶成了衰落和毁灭的时代，也导致了唐朝人口的大幅度减少²¹。八世纪也是唐朝边疆地区形势变动不居的时代：新建立的南诏国(即后来的云南省)的武士们横跨在通往缅甸、印度的道路上，不肯放弃们的独立地

位。而在西北边疆地区，则在八世纪中叶兴起了回鹘政权——回鹘人既是唐朝傲慢的朋友，同时又是它的对手。在东北地区，正在兴起的契丹民族(在未来的两个世纪中，他们还不足以构成巨大的威胁)也在逐步侵蚀唐朝边镇的势力。吐蕃人一直骚扰着唐朝通往西方的通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高丽族大将军高仙芝将他们打败为止。但是在天宝十载(751)形势急转直下，高仙芝这位英雄在塔拉斯河畔目睹了自己的军队在阿拔斯朝军队的猛烈进攻之下，被打得分崩离析的境况。此后，伊斯兰势力控制了中亚，大食人也开始在唐朝各地出现了：大食军队曾经帮助唐朝政府镇压了安禄山的叛乱，而(相反地)在短短的数年之后，大食海盗却卷入了对广州的劫掠²²。对于外来的宗教信仰而言，八世纪是一个容忍和默认的时代，各种教派的佛教徒、叙利亚籍的景教徒以及回鹘族的摩尼教徒都聚集在唐朝的城市里，他们得到了唐朝政府的保护，在各自的圣殿中举行神秘的宗教仪式，吟诵祈祷文。北方地区在遭到唐玄宗的宠臣安禄山的蹂躏之后，经济和文化的恢复阶段一直持续到了九世纪的头二十年。按照我们的看法，唐朝九世纪的历史实际上是从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左右开始，到917年²³，随着唐朝的灭亡而宣告结束的。九世纪是一个灾难深重的世纪。随着两税法颁布后的紧缩时期的到来，在九世纪的头三十年里，物价就开始逐渐上升。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与人为的灾难一起接踵而至，天灾人祸导致了昂贵的进口货物以及生活必需品的极端匮乏，同时也带来了遍及唐朝全国各地的大灾难²⁴。九世纪历史上最有毁灭性的灾难是黄巢起义，在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唐朝境内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因为黄巢起义而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而其中特别不幸的事件是僖宗乾符六年(879)黄巢对广州外国商人的大屠杀。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严重地破坏了贸易活动，而且也破坏了来源于贸易的税收财源²⁵。九世纪是唐朝在其原来的附庸国和保护国中的威望下降的时代，而且也是唐朝的新对手出现的时代，例如，南诏人当时成了古代中原王朝在越南的保护国的入侵者²⁶，而黠戛斯人则成了强大而老于世故的回鹘人的征服者。回鹘的衰亡使他们的国教摩尼教在唐朝失去了保护，在武宗会昌五年(845)大规模迫害外来宗教的运动中，摩尼教也和佛教一样，遭到了劫难。这场迫害运动的目标是使僧侣们还俗，并将大批青铜神像改铸为钱币，而它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税收²⁷。只有在产生了畏惧和排外的背景之下，这些经济的动机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²⁸。九世纪也是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国家权力受到极大削弱的世纪。强大的地方军阀的统治中心变成了小朝廷，而李唐皇室及其大唐政权也最终在十世纪时从历史舞台上永远地消失了。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的外国人（1）（图）

波斯银币 萨珊王朝 约重4克 直径3.1—3.2厘米 1959年乌恰县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这枚铸币埋藏于公元7世纪后半叶，发现于丝绸之路沿线的乌恰县山中石缝里，同时出土的银币有947枚，很多锈成一团。推测这些钱是过路的西域商人当时放在袋囊或包袱中，由于遇到危险而临时掩藏起来的。这批银币以波斯库思老二世和阿拉伯倭玛亚朝代的“库思老二世式样”银币为主，银币两面花纹用模子打压而成，正面主要是国王半身像，背面是波斯国教祆教的祭坛，此外周边有文字和压印的新月抱月等简单图案。有些“库思老二世式样”正面边缘空白处压印的是科发体阿拉伯文字“以阿拉的名义”。

在唐朝统治的万花筒般的三个世纪中，几乎亚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过唐朝这片神奇的土地。这些人是怀着不同的目的到唐朝来的：他们中有些是出于猎奇，有些是心怀野心，有些是为了经商谋利，而有些则是由于迫不得已。但是在前来唐朝的外国人中，最主要的还是使臣、僧侣和商人这三类人。他们分别代表了当时亚洲各国在政治、宗教、商业方面对唐朝的浓厚兴趣。在前来唐朝的使臣中，最显贵的人物是波斯王伊嗣俟三世的儿子，萨珊朝后裔卑路斯——七世纪时，萨珊波斯是唐朝的一个弱小的保护国²⁹。在外国使臣中，有许多使臣的地位并不像卑路斯那样高，但是他们也如同卑路斯一样，为了各自所代表的兴盛的，或者是衰落的王朝的利益，到唐朝来乞求恩惠。来到唐朝的僧侣中不仅有大批佛教僧徒，而且有许多信奉各种不同宗教的波斯僧侣，例如祆教徒——太宗贞观五年(631)唐朝在长安为祆教徒重建了祆寺；景教徒——他们也为在贞观十二年(638)建立了一所教堂而感到荣幸；摩尼教徒——武后延载元年(694)他们将摩尼教怪诞奇异的教义³⁰带到了唐朝宫廷³¹。唐朝境内人文荟萃，奇货云集，突厥王子仔细揣摩着来自阿曼的珠宝商的神情举止；而日本的参拜者则以惊奇的目光凝视着粟特商队的商人。难怪他们会感到诧异，因为当时的确没有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东西能够与这些民族和职业联系起来。所有的旅游者都将他们本地的各种货物带到了唐朝——或是作为国王的礼物，或是作为销售的商品，或是仅仅作为他们自己随身携带的附属物品。反之，他们中有些人也在唐朝获得了荣耀——例如被唐朝任命为安南保护人的粟特商人就是如此³²；而有些人则得到了财富——例如阿曼的犹太商人从唐朝带回了一个黑瓷瓶，瓶子上盖着金盖，里面放着“……一枚黄金制作的鱼，鱼的眼睛是用红宝石镶嵌成的，瓶子里还添加了质量最上乘的麝香。光是瓷瓶里盛放的东西的价值就达五万第纳尔”³³。他们中也有些是为了寻求知识到唐朝来的，这些人的表现可能就要谦恭得多。他们的态度与年轻的吐蕃贵族是一样的——为了能够准确地翻译汉文经典著作，一些吐蕃贵

族子弟被他们的父辈专门送到长安来学习汉语³⁴。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的外国人（2）（图）

各国王子图 佚名 壁画 尺寸不详 甘肃敦煌莫高窟⁶⁵窟

此窟以建筑、塑像和壁画的三位一体来综合表现佛祖涅槃时的情景。长方型的穹顶窟中，灵台上塑涅槃佛像，周围则画满悼念的僧众和各国王子。此幅壁画绘于卧佛雕像脚后的墙面上，表现了佛祖涅槃之后，佛教诸弟子痛不欲生的情景。画中人服饰各异，相貌肤色也不尽相同，以示来自不同的国家。各国王子对佛祖涅槃那痛不欲生的表情刻画得很是逼真写实，其悲伤之态溢于言表，或嚎啕不已，或自割其耳，或自毁双目，或割腕放血，或伏剑自尽。画面充盈着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而且，画家对各种服饰的描绘也很见功力，以刚健的线条和妍丽的彩色使这些人的态势富有了强烈的冲击力，突现出强烈的悲剧效果，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一章 大唐盛世商船与海路（1）（图）

青铜龙头 朝鲜

此7世纪，中国疆域最辽阔的唐朝将其帝国的统治从首都长安向北扩展到蒙古和朝鲜，向南扩展到越南，向西穿越中亚远达阿富汗和波斯。这些臣属国和被保护国都受到来自其征服者的信仰和文化方面的深刻影响。这是在朝鲜的一座庙宇的旗杆顶部发现的、具有与众不同的中国风格的青铜龙头，这证明了，唐朝的影响已远至朝鲜这样的国家，而这种影响的到达最初或许是通过海路达到的。通往唐朝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商队走的陆路通道，另一条是船队航行的海上通道。定期往来于印度洋与中国海的大船，将急切的西方人载往灿烂的东方。在北部海域，特别是在七世纪六十年代新罗国消灭了百济国和高丽国之后，航海技能和海上贸易主要掌握在朝鲜人的手中。来自战胜国的使臣、僧人和商人，还有来自被征服国的难民，都大批地云集在了唐朝境内³⁵。朝鲜的船舶通常是在黄海北部沿岸航行，以山东半岛作为登陆的港口。这条航道也是从肥前出海的，来自日本的船只航行的正式航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七世纪末期，即日本与新罗国交恶时为止³⁶。在八世纪时，日本人为了躲避新罗，被迫从长崎越过公海，向着淮河口或者长江口方向行进，有时甚至取道向更南部的杭州湾航行。但是到了九世纪

时，事实已经证明日本船只选择的这段航道是非常危险的，为了躲开这段航程，日本的参拜者和使臣们宁愿搭乘更安全的朝鲜船，经由山东到达淮河河口，或者甘愿冒险乘坐唐朝的船只——唐朝船不从扬州登陆，而是在更南部的浙江或者福建沿海靠岸³⁸。虽然新罗船只在这些水域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在文化上完全仰仗唐朝的，东北地区的渤海国的商船也时常来往于北方的海域³⁹，就如同唐朝政府在山东的登州为新罗使臣设置了客馆一样⁴⁰，唐朝也为渤海国的使臣专门设立了客馆，为他们提供膳宿。总而言之，朝鲜人在北方水域占据了多数，而且他们也确实在唐朝境内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侨民团体，他们生活在楚州和涟水这样的城镇里——这些城镇位于连接长江与黄河的大运河沿岸。他们不仅得到了唐朝的慷慨的保护，而且也象其它外国人一样，享有某种形式的治外法权⁴¹。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唐朝海外贸易的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南中国海和印度洋来进行的。经由南中国海的贸易决定于海洋季风的周期性转移。从广州出发前往海外的商船都是在东北季风到来之前，即在秋末或者是在冬季启航离开广州的⁴²。东北季风也是使距离唐朝以西数千里之遥的，波斯湾大港的商船启航的季风，甚至在由唐朝启航的商船离开广州之前，从伊斯兰地区出发的商船就已经动身上路了：如果他们在九月或者十月离开巴士拉或者西拉夫的话，就可以及时驶出波斯湾，而顺风的冬季季风将带着他们跨越印度洋，此后就能赶上六月多风暴的西南季风，西南季风会带着他们从马来亚向北跨越南中国海，到达他们在中国南部的目的地。东、西方的共同规律是“冬季向南，夏季朝北”⁴³。从七世纪到九世纪期间，印度洋是一个安全而丰饶的海洋，各国的船舶都蜂拥而至，聚集在了这里。这时的阿拉伯海得到了伊斯兰政权的保护，尤其是阿拔斯朝的首都从大马士革迁移到位于波斯湾上部的巴士拉之后，更是极大地促进了东方贸易的繁荣⁴⁴。巴士拉是一座阿拉伯城市，也是距离巴格达最近的港口，可是当时最大的船只还不能驶入巴士拉。另一个重要的港口是位于巴士拉以下，坐落在波斯湾头的，波斯古代港口伍布莱。在所有的港口城市中，最富庶的城市是位于海湾的波斯一边，处在设拉子下方的西拉夫城，西拉夫的繁荣完全要归功于东方贸易。直到977年被地震摧毁为止，西拉夫城一直在海湾贸易中占有主要的地位⁴⁵。西拉夫城的主要居民是波斯人，但是也有一些阿拉伯潜水采珠人和来自美索不达米亚或者阿曼，将要乘船前往印度和唐朝的商业冒险家⁴⁶。九世纪七十年代时，起来造反的非洲奴隶掠夺了巴士拉和伍布莱，使得海湾与远东地区的贸易大大衰退，而此后巴士拉的衰落，对于海湾与远东的贸易来说，就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⁴⁷。

第一章 大唐盛世商船与海路（2）（图）

陶船 东汉 明器 高16、长54厘米 1954年广东省广州市先烈路出土

这件陶船船首有碇，用于船只的停泊。船后有舵，舵杆通过舵室固定在尾部。它不同于近代的舵，还保留着由梢演变而来的迹象；但比梢短，比一般河船的舵则长些。舵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上的重要发明，这是现知最早的例子。陶船上塑有6个人物，分立各处作操作状。如按陶塑人物身高比例推算，真船可长达14—15米，载量约有“五百斛以上”。此外甲板上还布置有6组矛和盾，说明这是一艘有武装保护的内河航船

的模型。七世纪到九世纪时，许多国家的商船都是从这些港口启航的，所有的商船上都配置了说波斯语的水手——因为波斯语是不同母语的人在海上商业贸易中相互间通用的一种混合语⁴⁸，这就正如同粟特语是中亚陆路商业贸易中通用的混合语一样⁴⁹。在驶出海湾进入印度洋的途中，商船会在阿曼的马斯喀特稍事停留，然后驶入印度洋；有时候他们可能也会铤而走险，前往海盗出没的信德沿海港口，或者是直接出发去马拉巴尔⁵⁰，然后从马拉巴尔到达锡兰。锡兰也被称做“狮子国”或“红宝石岛”，商人们可以在锡兰购买到宝石⁵¹。从锡兰起，海路向东通往尼科巴群岛，在这些岛上，商人或许能够与独木舟中那些裸体的野蛮人交换椰子和龙涎香。然后，他们将在马来半岛靠岸登陆——据认为，登陆的具体地点是吉打州。此后，商船从马来半岛穿越马六甲海峡，前往黄金大陆(Suvarnabhumi)——传说中的东印度群岛。最后，他们将转而向北进发，在湿润的夏季季风的驱动下，驶向河内或者广州，甚至取道前往更北部的沿海港口，进行丝绸贸易⁵²。

在唐代，中国沿海的各港口中挤满了远涉重洋，不远万里而来的航海商船，唐朝人对这些商船庞大的体积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将这些航海船舶称做“南海舶”、“西域舶”、“南蛮舶”、“昆仑舶”、“师子舶”或者是“婆罗门舶”，在所有的称呼中，“波斯舶”是最常见的一种称呼⁵³。但是，我们还无法断定，唐朝的商船是否也从事过前往西拉夫的漫长而危险的航行。中国的大型航海船的出现是在若干世纪之后，即在宋、元以及明三朝⁵⁴。在唐代，前往西方的唐朝行人大多都是搭乘外国的货船。当九、十世纪的阿拉伯作家谈到“停靠在波斯湾港口里的中国船”时，他们说的“中国船”，其实是指“从事与中国贸易的商船。这种说法与我们现在说的“Chinaclipper”⁵⁵

和“EastIndiaman”⁵⁶所代表的含义是一样的；至于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将肉桂和檀香木称做“Chinese”⁵⁷，则是因为他们是从距离中国不远的地方，或者就是从中国的船上得到这些货物的⁵⁸。同样地，汉文古籍中出现的“波斯舶通常必定也是仅仅指“从事与波斯湾地区贸易的商船，这些船舶上使用的一般都是马来或者泰米尔船员⁵⁹。根据汉文史料记载，在唐代繁荣昌盛的海外贸易中，最大的商船是来自锡兰的师子舶。

锡兰的商船长达二百英尺，可以装载六百人或七百人，许多船只还拖着救生艇，并且配置了信鸽⁶⁰。独桅三角帆船是在波斯湾地区建造的，这种船形体较小，装备有三角帆，船身是葡萄牙轻快帆船的那种样式。独桅三角帆船是用原木板的边与边相接而做成的⁶¹，木板不是用钉子钉在一起，而是用椰子皮壳的纤维加以缝合，然后涂上鲸油，或者抹上一层象黑漆一样的，可以凝固的中国橄榄树脂，这样就可以防止船体漏水了⁶²。

第一章 大唐盛世商队与陆路（1）（图）

大食旅行者陶俑 唐代 明器 高27厘米 陕西省西安市出土

大食商人高鼻、深目、浓眉、络腮胡，穿翻领皮毛褊衣，腰束带，系一小香囊，手拿水罐，背着沉重的行李。唐代的丝绸之路连接中国和中亚、西亚乃至欧洲诸国。在丝绸之路上，许多波斯、阿拉伯人、技艺人前往长安，此俑生动再现了奔波在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商人形象。东方各地的财富也经由陆路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了大唐的土地上——或车装，或驼载，或马运，或驴驮。东北诸民族以及朝鲜的物产通过森林地区和辽阳平原(这里是东胡各民族与原始蒙古部落生息的地方)向南到达渤海湾沿岸，然后运抵位于高山和大海之间的狭长走廊上的长城尽头，即地势险峻的战略要地卢龙(意思是“黑龙”)城。原来这里有一条叫做“渝水的河流，但从唐代以后它就消失了。卢龙城不但是唐朝的一个重要的边防要塞，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关税征收地⁶³。伟大的丝绸之路是唐朝通往中亚的重要商道，它沿着戈壁荒漠的边缘，穿越唐朝西北边疆地区，最后一直可以抵达撒马尔罕、波斯和叙利亚。从玉门关向西，有两条道路可供行人选择，这是两条令人望而生畏的道路。商队经过的地区有时候根本就没有正式的路径，只能以倒毙的行人和驮畜的残骸作为前进的标志。由敦煌通往吐鲁番的那条骇人的道路就是如此。从敦煌到吐鲁番途中要经过白龙堆(所谓“白龙堆”就是古代罗布泊遗留下来的盐壳)，白龙堆是一片地地道道的荒漠，不仅穿行极其艰难，而且沿途还有妖魔出没，所以商队宁愿取道伊吾(即今哈密)⁶⁴。这样就可以躲开白龙堆，向北绕道抵达吐鲁番⁶⁵。从吐鲁番起，旅行者可以向西穿过西突厥的地面(即天山北部地区)，也可以越过西南方，进入天山南部地区，继续通过库车以及塔里木盆地其它的绿洲城市西行。当时从敦煌出发，另外还有一条与敦煌至吐鲁番的道路平行的道路。这条道路叫做南道。南道沿着神秘的昆仑山脉的北缘西行，然后到达和阗和帕米尔⁶⁶。这些道路之所以能够通行，完全是靠了巴克特里亚骆驼的特殊长处，这种骆

驼不仅可以嗅出地下的泉水，而且还能够预告致命的沙暴：风之所至，唯老驼预知之，即嗅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中。人每以为候，亦预以毡拥蔽鼻口。其风迅，斯须过尽。若不防者，必致危毙⁶⁷。除了以上道路外，另外还有一条陆路商道，这条道路是从四川经过现在的云南省境内，进而分作两条道路，通过缅甸境内上伊洛瓦底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峡谷，然后再前往孟加拉。这是一条非常古老的通道，但是在唐朝之前却几乎没有利用过。唐代的云南属于西南蛮地区，唐朝政府曾经徒劳无益地试图征服西南蛮，但是由于八世纪时在这里新兴起了南诏政权，这样就使唐朝重新开通这条通往缅甸的古道的努力最终化成了泡影。南诏国对于入侵唐朝边疆的吐蕃人的态度，要比对唐朝的态度友好得多。当南诏在懿宗咸通四年(863)入侵东京湾之后，唐朝政府最终得以摧毁了南诏的军事力量，但是这时正是唐朝对外贸易的衰落时期，所以已经取得的胜利也就没有多少可供利用的价值了。在通往缅甸的道路中，有一条道路从密支那的琥珀矿通过。密支那距离现代开采翠鸟色翡翠的矿区不远，这里出产的翡翠很受欢迎。一直到了后代，这里的翡翠也是穿过缅甸古道，经由云南境内运送到北京的玉石工匠的手中的⁶⁸。最后，参拜圣地的佛教徒有时也会选择通过西藏地区前往印度的通道。这条迂远而艰难的道路通常是经由尼泊尔到达印度的⁶⁹。

第一章 大唐盛世商队与陆路（2）（图）

骆驼砖 唐代 长35.8、宽4.5厘米，厚5厘米 敦煌佛爷庙唐墓出土 敦煌研究院藏

砖为灰陶质地，方形。骆驼为北方常见的双峰驼，牵驼人为胡人形象，故称为胡商。这是以砖雕形式表现丝绸之路上胡商形象的惟一遗物，十分宝贵。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1）（图）

兴庆宫图拓片 1934年陕西省西安市出土 原石藏于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博物馆

兴庆宫在唐时长安城兴庆坊，为唐玄宗藩邸，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始为离宫，后扩建为兴庆宫朝堂，成为听政之所。宫东西宽1080米，南北长1250米，四周夯筑古墙，有兴庆殿、大同殿、南熏殿、花萼相辉楼、沉香亭等主要建筑。与大明宫、曲江池之间，有夹城阁道相

通。唐玄宗处理政务、接见外国使者多在这里。唐末朱全忠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兴庆宫遭到严重破坏。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那些聚集着许多外国人的唐朝的城市和乡镇，看看外国人在唐朝境内四处流动时所要经行的道路。首先我们从南方地区谈起。在唐朝以前，前来中国海的航海者一般都是以东京湾，即现代河内附近地区作为停泊的港口。但是当唐朝建立之后，阿拉伯和东印度群岛的商人就纷纷将他们的商船驶向广州，或者甚至停泊在更北部的沿海港口⁷⁰。唐代的交州是唐朝建立在东京湾地区的保护领地的统治中心所在地，这里居住着嚼槟榔的安南人，龙编是交州的出海港⁷¹。七世纪时，随着广州的兴起，交州的对外贸易虽然有些衰落，但是通过交州进行的海外贸易却从来没有完全绝迹。相反在八世纪中叶以后，即在八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由于广州地区贪得无厌的官僚和中间代理商的敲榨勒索，外国商人宁愿在交州进行贸易，所以这时交州的对外贸易甚至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⁷²。但是，南方的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的乡镇，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阿拉伯人将广州称做“Khanfu”，而印度人则将广州称做“China”⁷³。当时的广州是位于热带荒原边缘的一个边疆城镇，热带荒原里栖息着凶猛残暴的野兽，在这里随时还会受到讨厌的疾病的折磨，但是绿意葱笼的荔枝树、柑橘树、香蕉树和榕树，又将这莽莽荒原点缀得分外秀美动人。在李唐皇室统治时期，虽然广州只有二十万人口，而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是南蛮，但是这时的广州已经成了一座地地道道的汉族城市⁷⁴。广州既是一座富庶的城市，也是一座非常容易毁损的城市，在广州城内大量密密层层木屋周围，环绕着三层城墙⁷⁵。广州的木屋曾反复遭到火灾的扫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宪宗元和元年(806)，这时一个聪明的广州都督命令广州人用瓦来装修屋顶⁷⁶。在这座异彩纷呈但又不堪一击的城市前面的海湾里，停泊着许许多多外国的商船，“……有婆罗门、波斯、昆仑诸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⁷⁷。那些皮肤黝黑的外国人在广州出售他们带来的，气味芬芳的热带木材和几乎近于神奇的药材，求购大捆的丝绸、成箱的瓷器和奴隶。他们从事的贸易活动使那些甘愿放弃北方的舒适生活，来到南方经商营利的商人发了大财，同时也使广州城和岭南道的统治者得以具有了超乎寻常的崇高地位，据记载，“(广州)都督执六纛，一纛一军，威严不异于天子”⁷⁸。这段记载生动地表明了广州地方官员的特殊地位。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2）（图）

闸口盘车图卷 五代 绢本 设色 纵53.3、横119.2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五代后期出现了“界画”，即利用界尺来准确描绘楼阁屋宇建筑的风景画。“界画”技法严谨，工细而有法度，亭台楼阁，甚至舟船车马，皆比例切实，规整有序，符合数学规律，生动自然，因此界画较为难作，被许多画家视为畏途。《闸口盘车图》用科学的形象和真实的表现手法记录了古代的建筑、器物、服饰及生活场面，图中描绘了一官营面场，有水磨、罗面机、望亭、河道、木桥、篷船、车辆和酒店。这些丰富的物体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画面，其中穿插了54个人物的活动，表现了磨石、罗面、打粮、扬簸、净淘、挑水、引渡、赶车等劳动场面，同时还有官吏在关卡查点和饮酒作乐，同民工紧张的劳动形成了鲜明对比，是描绘市桥舟车的现实生产活动的优秀风俗画卷。

在广州的外来游客中，有许多人居住在城内专门为外国人划定的居住区内。根据唐朝的法令，外国人居住区设置在河的南岸，以便许许多多选定在广州逗留的，各种不同种族和国籍的商人从事贸易活动，或者是等待返回故乡的顺风。外国人由一位特别指定的长者管理，而且享有某种治外法权⁷⁹。来自文明国家的公民(例如大食人、僧伽罗人等)与文化教养较低的商贾们(例如白蛮、赤蛮等)都居住在这里，而且他们之间的交往都很密切⁸⁰。在这里，你还会发现信奉正统宗教的外国人与信仰异教的外国人之间的关系相处得也很融洽，例如印度的佛教僧侣与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印度来的佛教徒居住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寺院里，院子内的池塘中还点缀着芬芳的蓝睡莲⁸¹。而广州的穆斯林则是为了躲避呼罗珊的宗教迫害而来到远东的，他们在这里停留下来并建立了自己的清真寺⁸²。简而言之，每当午时的鼓声敲响时，居住在广州的各种肤色的外国人以及来自唐朝境内各地的汉人，都被召唤到了大市场上，他们或在店邸中密谋策划，或在商船上讨价还价，进行紧张的贸易活动；而每当日落时分的鼓声敲响时，他们又都各自散去，返回自己的居住区。有时在晚间，他们偶而也到夜市去，操着异国腔调大声地讲价钱⁸³。

广州这座繁华的城市有着一部色彩斑驳的历史，谋杀、海盗的抢劫以及贪官污吏的掠夺，在广州的历史上涂抹上了这些斑驳陆离的色彩。这些祸患互为因果，相互引发，一直无法根除。例如在形势安定的七世纪时，广州都督路元利用职务之便巧取豪夺，结果被一艘马来货船⁸⁴的首领刺杀。这件事发生在武后嗣圣元年(684)。此后，唐朝政府又任命了一位品行优良的官员⁸⁵代替了倒霉的路元⁸⁶。但是在以后的若干年里，许多形形色色的丝绸贸易掠夺者——这些人被流放到了广州，从而也就失去了在京师时的放荡生活——仍旧以牺牲那些倒霉的商贾的利益作为代价，利用掠夺手段来充分补偿他们在流放生活中遭受的苦难，出于给广州城带来秩序和整肃风纪的目的，为了保证宫廷能够得到广州的奢侈品，同时也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唐朝政府在八世纪初期设立了“市舶使”这一官职

87。市舶使的职责是管理海关。在广州这座情况复杂的城市里，设立市舶使是十分必要的，它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同时又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肥差。市舶使的设立，部分也是那些因为遭受到掠夺而向唐朝皇帝抱怨的外国商人请求的结果⁸⁸。然而广州城的灾祸并非全部都是由唐朝官吏造成的：比如在肃宗乾元元年(758)，一帮大食人和波斯人驱逐了广州都督，他们抢劫店邸，焚烧住房，然后又从海上离去。这些海盗很可能就住在海南岛上⁸⁹。这次灾难使广州作为一个港口的地位一落千丈，广州变得微不足道了，而外国商船则转而驶往河内停泊。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有半个世纪之久⁹⁰。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3）（图）

姑苏繁华图 徐扬 清代 长1255厘米

《姑苏繁华图》，又名《盛世滋生图》，为清人徐扬于乾隆年间所绘。描绘了乾隆年间盛世苏州的繁华景象。历史上，苏州是南北往来的水陆交通要道，江南地区最主要的货物集散地。宋元明清时期，苏州的丝织业达到了鼎盛，日出万绸，衣被天下，万商云集。到清康熙年间，苏州已是除了首都北京以外的天下第二大城市。画面中市镇密集，商旅如织，舟楫相连，水运繁忙，布局严谨，气势恢宏，重点描绘了一村（山前）、一镇（木渎）、一城（苏州）、一街（山塘）的景观。虽历经百年沧桑，画面中木渎斜桥、石湖、水盘门、虎丘等景观至今仍依稀可辨，是一幅极有价值的社会风俗画。

骚扰广州这座边疆珠宝城的另一场劫难是在八世纪逐渐形成的，任命来自宫廷的宦官担任“市舶使”这一关键职务的惯例。这种带来了许多恶果的惯例，在当时被委婉地称做“宫市”，而所谓的宫市，其实就是由地位显赫的宫使对贸易活动横加干预⁹¹。代宗广德元年(763)，这帮高贵的恶棍之一⁹²竟至于起兵反对皇帝。唐朝政府克服了许多困难，才平定了这次宦官叛乱。与此同时，广州的海外贸易实际上也开始停顿了下来。诗人杜甫在两首诗中谈到了这时从广州流入北方的奢侈品濒临中断的情况。他在其中一首诗中写道“南海明珠久寂寥”⁹³，而在另外一首诗中则有“近供生犀翡翠稀”的描述⁹⁴。从代宗大历四年(796)开始，李勉在广州担任了三年地方长官，他没有对那些不幸的外来客商横加勒索，所以在他的管理下，广州海外贸易的数额增加了十倍之多⁹⁵。然而即便是像李勉这样廉直的都督，也无法阻止小官吏的掠夺⁹⁶。八世纪末年，王锬担任广州都督时，“能计居人之业而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锬以两税钱上供时进及供奉外，余皆自入。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由是锬家财富于公藏。

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称商货而出诸境”⁹⁷。王锬这样披着官吏外衣的大强盗只是偶一有之，但是像他那样的小强盗却何止千数。正是由于这些急性的和慢性的痼疾，使得原来集中在广州港的商业贸易有些转移到了交州，而有些则进一步朝北，转向了海阳(即潮州)的港口⁹⁸。然而不知是由于什么缘故，广州城与它的繁荣的贸易并没有被永久地摧毁。在九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广州地区又出现了几位正直而明智的都督⁹⁹，广州的社会状况也有了相当大的改观。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这时唐朝开始了其灭亡前的阵痛时期。僖宗乾符六年(879)，农民起义军首领黄巢率部掠夺了广州，他们屠杀外国人，并且摧毁了养蚕的桑园(唐朝的主要出口产品就是依靠蚕来生产的)，这样就导致了广州的财富及其显赫地位的大幅度下降。尽管在九世纪末年，广州又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恢复时期，但它以往的重要地位却再也没有能够完全恢复¹⁰⁰。宋朝统治时期，来自南中国海的商船越来越多地转向了福建和浙江的沿海港口。虽然这时的广州仍然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港口，但是，它往昔的垄断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一位天竺的佛教徒，或是一名河陵的使臣，抑或是一位林邑的商贾希望由广州前往北方游历，到传说的唐朝京城其他一些大城市去时，有两条穿越崇山峻岭，通向北方的道路可供选择。一条道路是由广州正北沿着浚水(现在称做北江)到达韶州，然后转向东北方向，翻越“梅岭”¹⁰¹，入赣江流域。从赣江流域就可以轻易地穿过现在的广西省，经由洪州—洪州当时住有许多波斯人¹⁰²—进入长江流域，此后沿着长江可以直抵有名的商业城市扬州，或者是到达中国心脏地区的其他地方。翻越梅岭的这条道路的状况在当时可能无法满足唐朝初年贸易和交通大幅度增长的需要，为了促进海外贸易的繁荣，加速广州的发展，由宰相张九龄发起，修建了一条翻越梅岭的新的大道。这项伟大的工程完成于开元四年(716)¹⁰³。张九龄本人就是一位同情中产阶级的，出生于南方的暴发户。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4）（图）

京杭大运河（局部）王翬 绘画 1698年

此图是长达20米的巨幅画的一部分，反映了京杭大运河边旖旎的风光及17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从画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城市的商业已极为繁荣，临街有许多店铺，从木器到盆景，经营的品种十分齐全。另外一条道路虽然非常古老，但是却很少使用。这条道路从广州取道西北方向，溯桂江而上，通过现在广西省的东部地区，沿着桂江

到达其源头所在地——即一片海拔低于一千英尺的高地。这块高地也是湘江的源头所在。从这里沿着湘江，可以到达湖南省的潭州(长沙)，进入中国中部潮湿的低地地区。湘江的源头又称漓江，而漓江实际上是由一条古代运河与桂江的源头连接起来的。这条古代运河现在与唐代相比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所以现在流向北方的河流与流向南方的河流的源头都已经合而为一了。就小船而言，在唐代很可能能够从广州一直行驶到中国中部和北部的大水道中。甚至可以一路抵达唐朝的都城¹⁰⁴。九世纪的诗人李群玉在他的两行诗中曾经提到这两条道路：曾泊桂江深岸雨，亦于梅岭阻归程¹⁰⁵。总之，不管游人选择哪一条道路，他都能够能够在帆蓬、桨棹或者是风力的推动下，轻易地通过长江以南的众多大湖，从而到达其目的地。从八世纪后期起，他们甚至可以借助明轮的推动到达目的地¹⁰⁶。一般来说，游人大多首先是前往繁华的扬州。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5）（图）

维护黄河堤坝（部分） 17世纪

中国的水域有利有弊，利在河流浇灌并滋润了大地，弊在不定期地爆发洪水，淹没平原和村庄。从3世纪开始，屯垦的军人就全力以赴地建造灌溉渠和防洪堤了。其中最大的工程是7世纪建成的大运河，大运河的主要作用是将南方的粮食运至1000公里外的北方。清初，治河是同国计民生有关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黄河自北宋以来改道南移，夺淮入海，黄淮合流。在南北1500公里的运河中，有100公里借道黄河河道而行，黄淮一有灾变，漕粮运输就会大受其阻。此图的一些劳动者正在修筑堤坝，整治黄河。八世纪时，扬州是中国的一颗明珠。当时的人们竟至于希望能死在扬州，从而圆满地结束自己的一生¹⁰⁷。扬州的富庶与壮美。首先要归功于它处于长江与大运河的结合部的优越地理位置。长江是中国中部众水所归的一条大江，而大运河则是将全世界的物产运往北方各大城市的一条运河。正因为如此，唐朝负责管理国家盐务专营的朝廷代理商(这是一个权势非常显赫的角色)将其衙门设在了扬州。扬州是唐朝庞大的水路运输网络的中枢，由唐朝和外国商船运来的各种货物都要在扬州换船，装入北上的运河船¹⁰⁸。所以这里也是亚洲各地商贾的聚集之所。从广州运来的盐(这是人人必需的消费品)、茶(当时北方饮茶已经相当普遍)、宝石、香料和药材，从四川沿着长江航道运来的珍贵的锦缎以及织花罩毯等，都集中在了扬州，然后再转输到各地。作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的居民，扬州人的生活在那时也很富足¹⁰⁹。而且扬州还是重要的金融中心和黄金市场，就扬州地区而言，金

融家的重要性一点也不在商人之下。简而言之，扬州是一座钱货流畅，熙熙攘攘的中产阶级的城市¹¹⁰。扬州还是一座工业城市，扬州以精美的金属制品(尤其是青铜镜)、毡帽、丝织物、刺绣、苧麻布织品、精制蔗糖、造船、精良的细木工家俱等特产而著称于世。扬州的毡帽当时在长安的年轻人中曾盛行一时。著名的扬州蔗糖是在七世纪以后根据从摩揭陀传入的工艺制作的¹¹¹。扬州是一座奢侈而放荡的城市，这里的人们衣着华丽，可以经常欣赏到最精彩的娱乐表演。扬州不仅是一座遍布庭园台榭的花园城，而且是一座地地道道的东方威尼斯城，这里水道纵横、帆樯林立，船只的数量大大超过了车马¹¹²。扬州还是一座月色融融，灯火阑珊的城市，一座歌舞升平，妓女云集的城市。虽然殷实繁华的四川成都素来以优雅和轻浮著称，但是在当时流行的“扬一益二”这句格言中，还是将成都的地位放在了扬州之下¹¹³。扬州城如此繁荣兴旺，外国人势所必然要在这里设立他们的店铺¹¹⁴。肃宗上元元年(760)，当唐朝叛将田神功的部众掠夺扬州时，曾经在这里杀害了几千名大食和波斯商人，根据这一事实，我们就可以断定居住在扬州的外国商人的数目是相当惊人的¹¹⁵。尽管扬州经历了这次巨大的灾难，但是一直到九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扬州城还保持着它的富庶与显赫的地位。九世纪末年，扬州又遭受了黄巢的追随者，如毕师铎、孙儒等反叛首领的蹂躏。十世纪初年，在唐朝废墟上兴起的吴国，部分地恢复了扬州往日的繁荣。但是到了十世纪中叶，当北方的后周入侵吴国的继承国南唐时，扬州再次毁于兵燹¹¹⁶。宋朝初年的扬州呈现出一片颓败残破的景象，而新的宋王朝统治者所采取的政策，则更加速了扬州的衰败。宋初统治者鼓励在靠长江更近的扬子县发展贸易、运输和金融业。并且下令由扬子县来转输其他地方的工业品¹¹⁷。扬子县后来改称真州。洪迈在他十二世纪时撰写的著作中，对八九世纪时期的诗人们表现出来的，对于扬州的热情感到惊诧不已。在洪迈所处的时代，扬州的境况已非复旧貌，抚今追昔，洪迈不禁感叹：“今日真可酸鼻也。”¹¹⁸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6）（图）

清明上河图（部分） 张择端 宋代 长卷 绢本 设色 纵24.8、横528.7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著名风俗画作品《清明上河图》是写实主义的伟大作品，宏伟壮阔，笔法严谨精细，作品采用了传统的手卷形式，从鸟瞰的角度入手，不断推移视点来摄取景物。全卷共有人物五百余，牲畜五十余，船只、车轿各二十余，安排得有条不紊，繁而有序。“清明”指农历清明节前

后，一般认为此图是描写北宋京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和汴河两岸清明时节的风光。此图为画卷的中段，描绘了汴河的繁荣景象。画面上巨大的漕船，有的往来于河上，有的停泊在码头。一座宛如飞虹的拱桥横跨汴河，街市在桥的两端相望，人们熙熙攘攘往来，车水马龙，与桥下繁忙的水运相呼应。

大运河的开通以及扬州的繁荣都应该归功于隋朝统治者的努力，但是大运河与扬州的兴盛时期却是在八世纪时才到来的。随着八世纪唐朝人口与物质财富的惊人增长，黄河流域的农耕地的出产已经无法满足两京以及北方其他城市的需求了，这样就不得不从长江流域将谷物运送到北方。这些新的需求使古老的运河系统承担了原来意想不到的巨大的压力。开元廿二年(734)，唐朝政府想出了一种补救的办法，这就是从扬州到长安的途中，沿途在一些要害地区设立粮仓。每当大运河无力承担繁重的转输任务时，就可以将粮食妥善地贮藏在这些粮仓中，从而避免了货物运输的延误和阻塞，杜绝了粮食的腐烂和被盜，而且也使得稻、粟等谷物可以安然地换载与运河河道宽度相应的船只。由于采用了这种新的方法，就保证了粮食能够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但是，日益增多的来自遥远的南方的奢侈品的运输量，大大加重了运河船只以及唐朝新的中继转运系统水道的负担，这一点是当时所始料不及的，或者说当时至少没有公开提倡这种做法¹¹⁹。象牙、龟甲、檀香木等珍贵货物在漕运船上堆积如山，而这些漕运船最初则是计划用来装载粮袋的。

不过当时的漕运船上的船师以及船上搭载的游客对这些严重的经济问题并不知情。如果他们不愿骑马或乘车的话，便会驾船离开扬州，顺着运河前往北方和西北地区，一路上对围着漕运船游来游去的一群群鸭、鹅大加兴叹¹²⁰。在途中，他们可能会与盐院的船只擦肩而过——船上像雪一样洁白的盐粒在阳光的照射下晶亮闪光；也许他们会在繁华的睢阳和陈留城停留歇脚——这两个城市当时是外国人，尤其是波斯人的重要居留地；到了汴州(即开封)，他们也许会顺路去看看城里的拜火寺¹²¹——开封城当时有五十多万人口，但是这时它还没有具备以后将要获得的大都市的殊荣。最后，旅游者终于到达了唐朝的东都，即洛阳古城。在唐朝境内游历的外国人，或者是在唐朝定居的外国人，都愿意集中在像广州、扬州那样的，充满生气的南方商业城市里。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也乐于聚集在历史悠久的北方城市中。北方的大城市既是政权的中心，也是贵族的渊薮。在北方的大都市里，那些度藏丰富的藏书家，或者是冲锋陷阵的武士的社会地位，都要比一个成功的商人的地位重要得多。作为唐朝两大都城之一的洛阳，其地位仅仅次于长安，在全国位居第二；而就其人口而言，洛阳有一百多万人口¹²²，也是唐朝的第二大城市。洛阳城有着使人景仰的一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一点上，它一点也不比长安逊色。洛阳古城与它西面的长安城相比，无论

规模还是历史都不相上下，但是洛阳还有某种更为温馨，更加高雅的精神生活气氛。洛阳城还是武则天女皇的“神都”¹²³——到了十一世纪时，洛阳就发展成了中国最辉煌、最美丽的城市，而唐代的洛阳则正在朝着这个方向顺利发展。洛阳有宫殿、亭园和大批官员。洛阳还以它特有的新鲜的水果、美丽的花卉，带有彩色图案的锦缎、精美的丝织布以及各式各样的陶瓷制品而著称于世¹²⁴。南市是洛阳的一个巨大的市场，南市的占地面积达两个街区(即“坊”)。在这个市场里，有一百二十个分类经营商品的集市或街，整个市场包括数千家单独的商店和货栈¹²⁵。对于居住在洛阳的外国人来说，洛阳城里有平时奉祀外国神的寺院，在这些寺院中有三所是拜火寺，从而证明了波斯移民的存在¹²⁶。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7）（图）

清明上河图（部分） 张择端 宋代 长卷 绢本 设色 纵24.8、横528.7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这张长5米的杰出画卷捕捉到了和平时代中国人的繁荣城市生活。宋朝都城汴京位于华北平原的中心，是拥有近百万人口的喧哗的大都市。市区街景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四周是纵横交错的街道，街道两侧是发达的手工工场，这里的美食和夜生活也闻名遐迩。街上行人摩肩接踵，往来不绝，男女老幼，士农工商，无所不有。图中所绘了开封的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形形色色的人穿梭其中。路边有商店、茶馆和各种小吃，而那个三层楼的饭店可以提供更为精致的饮食（中部）。一对驮着当地物产的骆驼正通过12个主城门之一而离开宋朝的都城，城门上是华美的城门楼。城墙之内商业繁荣；一位为人代笔者收费为人写信，而一位顾客正在试验一个弓箭商人所售的弓的柔韧程度。在画的右下角，一位理发师正在为另一名顾客刮脸。 天宝二年(743)，唐朝在西京长安以东兴建了一座人工湖，这个湖其实就是一个货物转运潭。唐朝人喜欢说的一句俗谚叫做“南舟北马”，但是在这一年，以马代步的北方人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们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船只都汇集在了这个转运潭里，船上满载着税物和各地被指派向朝廷进献的土贡——来自北方的红毡鞍鞴，来自南方的略带酸涩的红橘，来自东北的，用粉红色丝绸作为缘饰的毛织物以及来自西方的深红色的绛矾。所有的货物都被换装到了小斛底船上，“驾船人皆大笠子、宽袖衫、芒履，如吴、楚之制”¹²⁷。这里就是那条从广州开始，通往唐朝最大的都市长安的，绵绵不绝的水路的终点。长安城的纳税人口将近二百万人，其数量相当于位于这条漫长的水道和运河网络另一端的广州城的纳税人口的十倍。与长安的人口

数量相适应，居住在长安的外来居民的数量也相当庞大¹²⁸。长安城的外来居民的成份也与广州港的外来居民有较大的差异。长安的外来居民主要是北方人和西方人，即突厥人、回鹘人、吐火罗人和粟特人等，而聚集在广州城里的外来居民则主要是林邑人、爪哇人和僧伽罗人。但是在长安和广州两地都有许多大食人、波斯人和天竺人。在入居唐朝的外来居民中，来自伊朗的居民占有重要的地位，唐朝政府甚至专门为伊朗居民设置了“萨宝”这个官职来监管他们的利益¹²⁹。萨宝()的字面意思是“商队首领”。长安城有东、西两个大市场，每个市场里都有许多集市¹³⁰。东市坐落在贵族和官僚住宅区附近¹³¹，这里没有西市拥挤，环境比西市安静，场面也更奢华；西市则更嘈杂，更大众化，暴力事件也更多——西市是处决犯人的地方¹³²。此外，西市的外国货也比东市多。每个集市都被货栈所环绕，而且都有自己独特的商品种类和一位首脑(行头)。依照唐朝法令的规定，每个集市都要陈列出写明其专营货物名称的标志。大多数外国商人都来到西市，陈列出自己带来要出售的商品。当通过西市时，你会看到一排排的屠宰市、金属器皿市、衣市、马市、丝绸市和药市¹³³。八世纪中叶以后，茶叶商人特别受到消费者的欢迎。新的饮茶风尚并非仅仅在汉人中流行，据说，来到长安的回鹘人在办事之前，第一件事就是驱马前往经营茶叶商人的店铺¹³⁴。这些嗜茶者的同胞——回鹘高利贷商人，在西市的胡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无数负债累累的汉族商人和挥霍无度的衣冠子弟，将他们的土地、家俱、奴隶甚至祖传的纪念遗物，都当做现金担保典当给了回鹘高利贷者。在九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当物价飞涨，人人都陷入债务中无法自拔时，这些放债人简直被看成了瘟疫。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回鹘人¹³⁵的傲慢无礼也确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位回鹘人因为在光天化日之下用刀杀死了一个商人而遭到拘禁，回鹘行头居然未经唐朝官员审理而将他非法营救了出来¹³⁶。唐朝人对回鹘高利贷商人的反感越积越深，最后在文宗开成元年(836)，唐朝政府明令规定“自今已后，应诸色人，宜除准敕互市”外，并不得与蕃客钱货交关。¹³⁷回鹘人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傲慢行为，是引发九世纪中叶排外运动和迫害外来宗教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8）（图）

中国的茶

茶在公元3世纪就在中国的南方被当做饮料，而在中国北方的贵族培养起对它的兴趣以后，在唐朝时成为真正的全民族的饮品。从好的瓷

杯中啜饮可以加重这种饮料的绿色。唐朝的鉴赏家们将烹茶演变成为了一种复杂的仪式，不仅传遍全中国，还远至日本。但是大众对茶的喜爱却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从健康的角度来看，沸水冲茶的功效，据信对长寿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使中国人口迅速增长，在8世纪的上半叶从4100万增至5300万。但是，长安城里的居民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来追寻安慰，从而在寻求慰藉的过程中积累更多的债务。例如，他可能会参加收入丰裕的佛寺中举办的各种大型的节日活动、舞会以及戏剧演出等。这样的佛寺遍布长安。佛寺举办的这些新奇的文娱活动最初可能起源于印度和突厥斯坦的佛教国家。这些活动不仅具有强烈的诱惑力，而且还可以起到教化人心的作用¹³⁸。如果是没有家室的市民，则他可以在位于东市与宫城之间的平康坊的妓女中找到另外一种慰藉。平康坊有许多娴熟音乐、舞蹈而且又善解人意的妓女，只要向妓女的“鸨母”交纳一千六百文铜钱，就可以与妓女一起共度良宵¹³⁹。享有父辈荣耀的贵族子弟，或者是将科场功名作为通往仕途的惟一途径的少年文士都会轻易地因这些妩媚动人的妓女而深陷爱河。如果这些风流客又兼有一些文学才能的话，他们就会用自己写的情意缠绵的诗歌或者是悱恻动人的传奇故事来取悦那些明艳照人的妓女¹⁴⁰。沿着长安城东面的城墙，由“春明门”往南的一个住宅区¹⁴¹里有许多酒馆，在这些酒馆里花钱更少，但却可以感受到更浓郁的异国情调。如果有朋友要踏上向东的旅程，前往东都洛阳的话，这些酒馆就成了饯别的好去处。在这里，精明能干的老板娘会雇佣带有异国风韵的、面目姣好的胡姬(比如说吐火罗姑娘或者粟特姑娘)，用琥珀杯或玛瑙杯为客人斟满名贵的美酒。而这些姑娘则使酒店的生意更加兴隆。由胡儿吹箫伴奏的甜润的歌唱表演和迷人的舞蹈，也是酒店老板增加销售量的重要手段，友好和善的服务，正是招揽顾客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尊。”¹⁴²这些温顺可人，金发碧眼的美人儿使诗人们心荡神迷，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我们还依稀可以看到她们绰约的风姿，大诗人李白是这样描述她们的：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9）（图）

杜秋娘图（部分） 周朗 长卷 纸本 设色 纵32.5、横285.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以唐代杜牧所作《杜秋娘诗》为题，杜秋娘为唐代南京名妓，

色艺双全，曾入宫，受宠于唐宪宗和唐穆宗，后因其子参与内乱，被遣回金陵，又树艳旗，立香寨，门下娇娘无数，引五陵少年蜂拥而至。曾作《金缕衣》：“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图中杜秋娘梳高髻，着唐装长裙，手执排箫独立凝思，其面容丰满端庄，衣带飘拂，婀娜多姿。画家用浓墨重染发髻，衬托出白晰的面容。衣纹用笔细劲飘逸颇有唐人遗韵，较好地表现了这位歌舞伎的丰姿与惆怅的心境。周朗，生卒年不详，字朗伯，号冰壶画隐。元顺帝时人。擅画马，亦工仕女画。《杜秋娘图》是他仅见的传世之作。

现在，让我们在这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离开长安，再来看看其他那些常常有外国人滞留的城镇。当然，不管是在哪里，只要是有利可图的地方，你就会发现外国人活动的踪迹。在富庶的川中流域，或者是在洞庭湖附近湿润的低地地区，你都会发现求购丝绸锦缎的外国商人¹⁴⁴。但是在那些没有水道与通都大邑连接的地区，外国人最乐意居住的还是商队经过的河西走廊地区。这条走廊是通往塔里木盆地的必经之地，沿着茫茫戈壁的边缘散布着一座座唐朝的城镇。这些城镇之间往往都相隔一定的距离，城镇里都配备有商队歇脚的客店。你会在这里发现伊朗拜火教徒和伊朗乐师。河西走廊所有的城镇都是向背无常的：今年这里还是由唐朝的官员驻守——他们引经据典，用道德规范来劝化人民；但是明年就会有突厥人挥舞弓矢，策马入侵；除了突厥人以外，这里在唐朝还常常被吐蕃贵族占领。在这些使用多种语言的边镇中，最典型的是凉州古城。凉州在唐代以前曾经被匈奴和匈奴以后的游牧统治者征服。唐朝的哥舒翰将军曾一度节度凉州。在这期间，他的奢华的排场几乎可以与帝王相埒。哥舒翰经常大摆宴席，款待宾客，幸运的客人在宴席上不仅能欣赏到舞狮、舞刀的表演，而且还可以得到朱唇侍者的悉心侍奉¹⁴⁵。因为“(凉)州之分野，上应白虎之宿，金气坚刚，人事慷慨”¹⁴⁶，所以这里的居民一向以坚忍、顽强著称。八世纪时，凉州的常住人口有十万多人。凉州居民中有一部分是汉人，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的祖籍是天竺，这些人的汉姓叫“申屠”(Shindu)，申屠这姓就是根据他们的种族来源而起的。此外，还有许多人的种族来源可以追溯到阿姆河和锡尔河边疆地区的国家¹⁴⁷。凉州是牧马的重要场所，特别是仍然保留着古代蒙古语名称的“Tmigen”河沿岸地区，更是水草丰美的，优良的牧地。“Tmigen”，鲜卑语的意思是“骨髓”，正是因为这一带的土地丰饶肥沃，它才被称为“骨髓”¹⁴⁸。凉州出产优质的缎¹⁴⁹、龙须席、毯、野马革，而芎这种治疗头疼的良药，则更是凉州著名的土产¹⁵⁰。凉州是一座地地道道的熔炉，正如夏威夷对于二十世纪的美国一样，对于内地的唐人，凉州本身就是外来奇异事物的亲切象征。凉州音乐既融合了胡乐的因素，又保持了中原音乐的本色，但是它又不同于其中的任何一

种，这样就使它听起来既有浓郁的异国情调，又不乏亲切熟识的中原风格。在中世纪早期的远东，凉州音乐曾经风靡一时。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唐朝外来居民的待遇（1） （图）

太白醉酒图 苏六朋 清代 立轴 纸本 设色 纵204.8、横93.9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诗仙李白以醉酒的形象闻名于世。醉意醺然的李白靠在侍者身上，胡须、头巾轻轻飘起，眼神中依然透出灵动、多情的诗人气质。这是唐玄宗召他进宫一同吟诗品酒后的情形。画面略省背景，三个人物顶天立地，充满画幅。最前面侍者的背影和后面的人露出一半的头部，使李白的脸正好处于画面的兴趣中心。深色的衣服衬托出李白挺拔的身体和微微倾斜的动态。人物面部用笔工整，层层晕染，表情呼之欲出，和简练的衣纹刻画形成明朗的对比。唐朝政府对待外来居民的态度和政策是很复杂的。即便是在唐朝最崇尚外来物品的时期，对于外来居民而言，最好的办法也莫过于选择唐朝人的思想方式和生活习俗，而当时许多外来居民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但是另一方面，唐朝政府有时又偏偏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例如，代宗大历四年(779)时，“回纥(即回鹘)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针对这种情况，唐朝政府颁布诏令，规定“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不得效华人”。在诏令中还严厉禁止胡人“诱娶”汉人妇女为妻妾，或者以任何方式冒充汉人¹⁵¹。这条诏令的发布可能是由于普遍憎恶回鹘高利贷者的结果，但是唐朝还有其他一些与此类似的规定，而这些规定除了出于虔诚的地方长官维持唐朝人习俗的纯洁性的强烈愿望之外，别无任何理由。例如，文宗开成元年(836)卢钧擢任岭南节度使时，他发现广州的外来居民与唐朝人杂居在一起，不仅没有实行种族隔离，而且相互自由通婚。于是卢钧强迫他们分处而居，禁止通婚，甚至不许外国人占田和营建房舍。他自认为是在整饬这座荒淫放荡的城市，认为自己是一个正直而坚持原则的人：总归一句话，他的这种做法其实就是一种“种族清教徒”的行为¹⁵²。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唐朝外来居民的待遇（2） （图）

牵骆驼黄釉陶俑 唐代 明器 高42.4厘米 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鲜于庭海墓

出土

唐代，大批外国商人、政府使节、留学生和宗教徒等经陆路和水陆来到中国。他们多居住在长安、洛阳和其他一些重要的商业城市。在现今的考古中，经常可以发现各种形象的外国人俑。这些深目高鼻的胡人蕃客，是当时中外经济交流的具体实现者，也是中外思想观念、宗教、艺术和科学技术交流的使者。唐朝人对外来居民的称谓中有许多俚言俗语，如“富波斯”(因为他们富有，所以他们是受人羡慕的)¹⁵³、“黑昆仑”(因为他们肤色黑，所以他们是丑陋的)、“裸林邑”(因为他们是裸体，所以他们是淫荡的)等等，这些说法只是一些形象化了的俚言俗语，对于官方政策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至少就唐朝民间而言，对于外来居民的态度总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当时的人们常常在酒宴上摆放一个头戴宽沿帽，蓝眼睛，高鼻梁的小木偶人，用它来表示喝醉的胡人。当这种滑稽的小木偶跌倒时，如果它倒的方向指向哪位宾客，则这位宾客就必须将杯中的酒喝干¹⁵⁴。年轻的诗人们常常在妓院里用这种木偶人取乐。他们一方面嘲弄、取笑着这种木偶，另一方面也正是他们，在苦苦思恋着大都市酒肆中那些楚楚动人的伊朗女侍者。八世纪是中亚的琴师和舞女在唐朝的大都市中受到热情欢迎的世纪，同时也是数千名并无恶意(但却富有)的波斯、大食商人在扬州被残杀的世纪。九世纪时，外来物品价格特别昂贵，而且也很不容易得到，这样一来，一种充满着浪漫的回忆色彩，以反映外来事物作为主要特点的文学作品就开始大量流行起来。奇怪的是，同样是在九世纪，正当有关那些来自西极的，乐善好施的富豪的故事到处流传之时¹⁵⁵，也正是外来居民遭受猜忌和迫害之日。在这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同在一个时代里，对于外来居民而言，他很可能会在唐朝政府中上升到很高的地位——特别是他本人如果与新贵结成联盟的话，这种可能性就更大(唐朝的新贵阶层是由科举制度造就的、反对世袭贵族的一个社会阶层)。我们可以举一位大食人为例，在九世纪中叶，这位大食人曾经得到了“进士”这样的殊荣。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唐朝人心目中的“理想的”外国人的形象与真正的外国人分离开了：随着物价的增长，唐朝人对于外来富商的憎恶与日俱增；唐朝政权的不断削弱，使政府只能听任异族对唐朝国土的入侵¹⁵⁶，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唐朝人对外国人的看法。总之，对于外国人的不信任的和敌视的态度，与对外来物品的喜爱，这两者之间并不是完全不能相容的。当七、八世纪唐朝处于朝气蓬勃的全盛时代时，这种对于外来物品的喜爱并不算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九、十世纪的文学作品中保留了七、八世纪胡风盛行时的状况，使后人得以抚今追昔，发思古之幽情。在这时的文艺作品中，恋情依依地回顾了七、八世

纪那段美好的旧时光—唐朝军队的优势力量和唐朝艺术的优越地位，在当时得到了普天之下的外国人的承认。这时哪怕是普普通通的唐朝市民，也完全有可能享用到来自遥远的地方的珍稀货物。这就正如同在我们的时代，一位前德国士兵可能会追忆起他可以开怀畅饮法国酒，而不必承认法国的平等地位的日子；或者就像一位前英国的文官深深地怀恋着大英帝国统治时期野蛮的印度的财宝一样。以货比人，外国人永远也无法与外国奢侈品相提并论。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唐朝外来居民的待遇（3） （图）

蛮夷职贡图 佚名 唐代 绢本 设色 长39.5、宽46.7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馆藏

此画无作者款印，金章宗完颜作瘦金书题签：“周蛮夷执贡图”，不知何据。论其画风，应比周的时代略早，属职贡类的绘画题材，很可能是一长卷中一段。所谓“蛮夷”，是古代对边远尚未开化的少数民族的蔑称，也泛称外国。他们依附于强大的汉、唐封建王朝时，必须定期向朝廷缴纳一定数额的贡品，以示臣服，同时也反映了国与国之间友好交往的历史。此图画一着异域装束的高鼻深目者向大唐献贡，贡品是牵着的一头长角怪羊，很可能是来自西域的友邦。笔法圆劲，古厚凝重，有着极强的写实性。幅上仅以粉白略染羊毛，风格简约朴质，人物动态作收缰止步状，力度内敛。此作虽与“周家样”有些不同，但有助于今人认识唐代人物画的多种面貌和不同风格。

唐朝人对于商业的态度也有一些模棱两可的地方。唐朝的商业贸易从来没有能够从政治的羁绊中脱离出来。商品对于公众的幸福越是必需，或者说越是上层社会渴望得到的商品，国家就越是要参与这些商品的分配。对于国内产品，例如盐、铁、钱以及有时对于酒和其他日用消费品的传统的政府垄断政策，成了唐朝政府对于外来奢侈品进行控制的模型。八世纪时在广州设立的“市舶使”这种新的官职，就是以古代的“盐铁使”作为典范和原型而设立的。

“市舶使”的职责是购买朝廷想要控制的所有的进口货物(特别是朝廷或者是受到朝廷宠信的集团所需要的进口货)，防止走私，并且要遵循垄断国内货物的老皇历来垄断进口货¹⁵⁷。根据这种态度得出的结论必然是：贸易与外交应该是不可分割、紧密相关的，从而将外国带给唐朝朝廷的礼物看做是外国向唐朝天子遍布四海的权势屈服的象征，而实际上这些通常是由大量珍贵的货物组成的礼物，应该属于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¹⁵⁸。称“进贡国”被迫奉献纳贡，只不过是一句自欺欺人的假话。外国—包括与唐朝疆域相接惧怕唐朝势力的国家以及那

些由于路途迢迢而真正独立于唐朝的国家—都是纯粹出于自身的利益将它们货物送到唐朝，然后从唐朝政府那里得到它们希望得到的“礼物”，从而避免它们可能会遇到的麻烦¹⁵⁹。就外国商人而言，他们对于这样一种交易制度肯定是有些犹豫的。因为这种制度要求他们首先要在唐朝都城将他们的部分商品奉献给朝廷，或者是在报关口岸将货物装进政府的货栈，而这样一来他简直就不能算是一个自由的代理商了。但是如果他想要以个人的计划行事，则他可能就会招致官方的干涉，甚至有可能带来祸患。至于地方长官，他们在解释朝廷限制贸易的政策方面宁可走得更远一些，也不愿意冒着被砍头的危险随意放宽政府的限制¹⁶⁰。甚至允许外国人向平民自由出售的货物，也不得不在那些处在政府代理商严密监督下的大市场中交易¹⁶¹。更糟糕的是，由于政府惟恐失去其应得的一份利润，所以外国人最想带回本国的那些货物，也恰恰正是唐朝的官吏最着意加以监视的货物。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唐朝外来居民的待遇（4） （图）

步辇图 阎立本 唐代 长卷 绢本 设色 纵38.5、横129.6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步辇图》是阎立本名作之一。此图据说为宋代摹本，但摹绘精湛，仍不失原作之真美。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吐蕃王松赞干布仰慕大唐文明，派使者禄东赞到长安通聘。《步辇图》所绘即是吐蕃使者禄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图卷右半部分是在宫女们簇拥下坐在步辇中的唐太宗，左半部三人前为典礼官，中为禄东赞，后为通译者。唐太宗的形象是全图焦点，他面目俊朗，目光深邃，神情庄重，展露出盛唐一代明君的风范与威仪。而宫女们的娇小、稚嫩及各种体态则衬托出唐太宗的壮硕、深沉与凝定。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结婚后，将中原地区的粮食种子、医药、天文、历算，以及养蚕、纺织、造纸、建筑、制碾、酿酒等生产技术传到吐蕃，吐蕃的药材和马匹也不断运到内地。通过开元二年(714)的一项诏令，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货物的种类。诏令中规定禁止向外国人出口或出售的商品主要有锦、绫、罗、绣，织成、¹⁶²、绢、丝，牦牛尾、真珠、金、铁等物品。相反地，唐朝政府对于那些它们认为对社会风化来讲是轻佻的和有害的商品的进口和销售，也规定了一些古怪的限制条件—尽管事实证明这些商品可能是商人货船中最有利可图的货物。确实正像在广州的一位波斯僧发现的那样，甚至出售假造的奢侈品和掺假的货物也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虽然这样做很

可能会使从事进口的商人身陷囹圄¹⁶³，但是如果碰巧不被发现的话，他还是大大有利可图的。这位波斯僧就是专门为精明世故的唐朝朝廷制作外国“奇巧”的¹⁶⁴。可是正如千万个外国商人在唐朝境内的经商活动证实的那样，如果经营者是一位聪明的商人，而且他知道什么货物可以进口，什么货物能够出口，知道他所置身的环境如何的话，那么即使他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商人，也能够独自经营得非常好。但是话又说回来，即使是最聪明的商人，也无力避免其他一些棘手的问题：如果地方长官对于唐朝官员应该具有的道德原则不管不顾的话，商人货物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有可能在“关税”的名义下，被地方长官剥夺而去。甚至如果海关关卡的检查者碰巧是一位廉直的官员，唐朝政府所要求的东西很可能也是过份的。根据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记载，当他的同胞到达唐朝时，他们的船货有三分之一都被迫交到了唐朝的货栈里¹⁶⁵。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唐朝政府没有一项规定是永久性的，任何事情在这里都是不可逆料的。头一年看起来还是异想天开的想法，到第二年就有可能会变成一项政策。唐朝政府以诏令的形式一次次地颁布免征税收的规定，这些规定大大改变了商人的处境，从而使他们获取更高利润的想法变得更为合情合理。太和八年(834)由唐文宗颁布的一项诏令，就是这样一个例证。这道诏令是在文宗疾病痊愈之际颁发的“德音”。在诏令中赦免了各种级别的罪犯，而且同时也特别施与了朝廷对于在岭南、福建、扬州等地经商的，来自海外的“蕃客”的保护。因为这些蕃客“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所以指令地方长官允许蕃客“来往交流，自为贸易，不得重加率税”¹⁶⁶。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唐朝外来居民的待遇（5） （图）

宾客图 佚名 唐代 壁画 纵187、横342厘米 陕西唐李贤墓

李贤墓的墓道东西两壁各绘有一幅礼宾图，这是东壁的一幅。唐代长安是个国际性大都市，当时外国使节、宾客纷至沓来，中外文化、经济交往十分频繁。“宾客图”形象地记录了这一史实。画面共有6人，左边3人为唐鸿胪寺官员，头戴笼冠，身着红袍，手执笏板，正侃侃而谈，接待友好宾客。第5人头戴羽冠，身穿红领袖白袍，腰束宽带，黄靴，据《旧唐书》有关日本、高丽的记载推断，似为日本或高丽使节。其他两人可能是东罗马使节和中国东北少数民族来宾。礼宾官与使节位置安排得当，主次分明。人物形象写实，特征显著，神采飞动，气氛严肃和谐。用线流畅精炼，根据人物官品、国别、民族特征而随类赋彩，

着色浓淡相宜。这幅具有确切年代的壁画原作，比今传为阎立本作的《职贡图》摹本更为可信，表现了各国和各民族的友好往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与艺术价值。但是唐朝的外来居民还面临着其他一些必须正视的困难。首先他要面对与商业贸易无关的，在社会和经济方面没有保障的状况。如果外来商人不幸客死在了唐朝的境内，他的货物就会被封存起来，如果在短时间内找不到他的妻子或者是后嗣的话，这些货物将由政府予以没收¹⁶⁷，而寻找继承人的期限是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外来居民娶了汉族妇女为妻，或者是纳汉族妇女为妾的话，他就得留在唐朝境内，绝对不允许外国人携带汉族妇女一起返回其故土。这是在贞观二年(628)颁布的一道诏令中规定的，目的主要是保护汉族妇女，避免她们与外国使臣及其随从之间的临时婚姻——这些人在离家外出期间，需要利用这种露水姻缘来得到一时的满足¹⁶⁸。对于下嫁游牧部落酋领的唐朝公主来说，这种规定当然是不适用的。皇室公主毫无怨言地被送往草原地区，她未来的丈夫与唐朝的关系是否友好，对唐朝的政策来说是很重要的。九世纪初期，在回鹘政权鼎盛时期嫁给回鹘可汗的唐室公主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位公主的出嫁是为了交换(事实的确是这这样)回鹘使臣献给唐朝的，以使公主成行的礼物：驼褐、白锦、白练、貂鼠裘、鸭子头玉腰带等，此外还有一千匹马，五十头骆驼¹⁶⁹。不管是因为遵从唐朝的法令，还是出于自愿，我们知道在九世纪时，有许多外来居民已经在唐朝境内生活了四十多年，而且他们全都有了妻室儿女¹⁷⁰。正如我们注意到的那样，外来居民都有义务服从专横的隔离法令，只是由于另外一些较为宽松的法令，才使这种情况部分地提到了缓和——这些法令允许唐朝城市中的外国移民选举他们自己的首领，而且在移民之间可以根据其本国的法律和习俗处理诉讼案件¹⁷¹。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进贡

一旦普通商人得到官方的允许，获准在唐朝的市场上进行贸易，他就可以在其同胞中住下来，从事自己的商业活动了。但是，代表外国政府来唐朝的使臣与此不同，尽管他们的主要兴趣可能是在商业方面，或者说至少是为了有利可图地交换珍贵的物品，可是至少在表面上，他们却不得不去应付那些等待着每一个进贡国代表的豪华场面，这样一来，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就当然地承担了进贡国的义务——虽然这些使臣即使是在与好友私下密谈时，对此也是佯作不知。但是也有一些属于例外的事例：当萨珊王室的末代后裔卑路斯来到长安，寻求唐太宗的保护和帮助时，我们无法猜测这位逃亡的萨珊王子究竟为唐朝皇帝带来什么象征性

的礼物，或者说他究竟向唐朝皇帝进献了怎样的表示臣服的象征物172。但就一般情形而言，使臣大多都是普通政客、国王的近亲、高僧大德，或者干脆就是由商人充任的。一般来讲，这些人对于俯首称臣这种事情是不太在乎的。那些路途遥远，但又希望促进与唐朝之间的贸易的国家，往往宁愿请求其友好邻邦的使臣代表他们出使唐朝，而不是派遣本国的使团。婆利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贞观四年(630)，婆利国派了一位使者带着本国的方物，随同林邑使团一起到唐朝朝廷进贡

173。外国使臣到达唐朝都城时，必须携带正式的国书，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合法的特权。外国君主如果想求得唐朝的帮助或保护的话，就得上表乞请，乞请的物事或是金带锦袍，或是一名作为常驻顾问的汉官，或是一部汉文经典著作，或者是乞求所有的这些东西。但是在所有的乞请物事中，外国君主最希望得到的礼物是一种精美的袋囊，他的使臣可以用这种袋囊盛放官方符信174。这种符信是一种铜制的鱼形符信，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只是一枚铜鱼的一半。对于每一个与唐朝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唐朝政府都给它们分发十二枚这种被分作两半的铜鱼。每枚铜鱼都按顺序编号，并且刻上了接受铜鱼的国家的国名。“雄”的一半保留在唐朝宫廷之内；“雌”的一半赠送给“进贡”国。派往唐朝的使臣将鱼符放入锦缎袋囊中，他携带鱼符的顺序号，应该与他到达长安的那一月的月份相符合175。如果他带来的一半鱼符与唐朝保留的另一半契合，他就会得到与唐朝政府规定提供的权利和优惠相一致的接待。例如，外国使臣的粮料供应，就是按照该使臣所在国的距离远近比例来配给的。所以天竺、波斯、大食等国的使臣可以按规定分配到六个月的食粮；来自尸利佛誓、真腊和诃陵的使臣也有四个月的食粮；而来自与唐朝边界相邻的林邑的使臣则只能得到三个月的食粮176。即使是大型的代理商也不能轻易取得优先的待遇：例如在肃宗乾元元年五月壬申(758年6月11日)，回鹘与黑衣大食的使臣携带“贡物”同时到达唐朝宫廷，他们为了优先进入宫门而相互发生了争执，为此皇帝专门发布了一道诏令，确定了他们进入宫门的礼仪，即允许双方使臣同时经由左、右门进入皇宫177。长安城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设有一座城门，每个城门附近都备有客馆，当外国使臣最初到达长安时，就先在一所这样的客馆中临时安顿下来178。从这时起，外国使臣就在鸿胪寺官员的指导下进行活动179。鸿胪寺是唐朝设置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官署，它的主要职责是掌管唐朝皇室成员的丧葬事宜和接见、款待外国的客使180，而且鸿胪寺还起着搜集有关外国资料的情报交流机构的作用，这种职能与鸿胪寺的基本职责相去甚远，但是对于整个国家，尤其是对于军队的决策人物来说，却有着巨大的价值。当外国使臣刚刚到达长安时，政府就会派一位兵部的特殊代理人来会见使臣。讯问其本国的

山川、风土状况，然后再根据使臣提供的素材绘制成地图¹⁸¹。伟大的地理学家贾耽在八世纪曾经担任过一段鸿胪寺的长官。据说贾耽非凡的世界地理知识，就是从他本人会见来访的外交使臣时得到的¹⁸²。

在外国使臣滞留唐朝期间，最重大的时刻就是受到皇帝接见的那一天。在这种场合，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使唐朝统治者赫赫威严的气派和凌凌逼人的权势在外国使臣心目中留下深刻的映象。如果使臣官高位尊，有资格参加冬至那天为属国藩王召开的大朝会的话，他将会发现自己面对着召见大殿前的左右厢排列的十二列仪仗卫队——其中有刀手、戟兵、矛兵、弓手等等。每一列仪仗卫士都披着艳丽夺目、色彩各异的大氅，而且每一列队伍都有相应的旗帜——鸂鶒或孔雀羽毛做的三角旗，或者是刺绣着野驴和豹子的旗子，或者是刺绣着其他象征勇敢的动物的旗帜。即使是官职卑微的使臣，在平时接受召见时也可以看到当番的皇室禁卫军。禁卫军的卫士分作五仗，其中有四仗身穿猩红衫，头戴东北雪雉尾羽装饰的帽子，而第五仗则穿着刺绣着野马形象的战袍。所有卫士“皆带刀捉杖列坐于东、西廊下”¹⁸³。这种浩大的场面使外国使臣茫然不知所措。在按照唐朝的规矩实行了跪拜礼之后，使臣们亦步亦趋地走上前来，将贡物陈放在召见大殿前。然后使团首领走近御坐，在陪同他的唐朝官员¹⁸⁴的低声指点下，向皇帝致意，说“某国蕃臣某敢献壤奠”¹⁸⁵。皇帝继续庄严端坐，缄默不语，由有司官员以皇帝的名义接受礼物，并且从使团随员手中接纳作为贡物的赠礼¹⁸⁶。作为对奉献纳贡的酬答，进贡国国王及其使臣将会在唐朝政府中得到一个徒具虚名，但却十分荣耀的官衔。这样他就名符其实地成了唐朝天子的封臣，而唐朝政府也会赐予他们丰厚的“俸薪”¹⁸⁷。当尸利佛誓¹⁸⁸国王向唐太宗贡献了象征性的贡物之后，唐玄宗随即宣布了对其特许的权力的认可，并且宣称“……嘉其乃诚宜有褒赐，可遥授左武卫大将军，赐紫袍金钿带”¹⁸⁹。

外国使臣以自己本国君主的名义接受了这些殊荣之后，就被引导出殿。这时他就可以享用比较轻松的宴飨，以洗去旅途的劳顿。八世纪初期的一位日本使臣就曾享受过这样的待遇。皇帝在召见之后下诏说：日本国远在海外，遣使来朝，既涉沧海，兼献方物，其使真人莫问等，宜以今月十六日于中书省宴集¹⁹⁰。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胡风（1）（图）

仪仗队列 唐代 壁画 高223、宽281厘米 陕西乾县乾陵章怀太子墓 1971年发掘

墓道东、西壁绘仪仗队各十人，这是东壁的画面。除为首的统领

外，其余九人，分为三组，皆戴头巾，着圆领黄长袍，腰间佩带箭、弓囊和剑，脚穿黑靴，其中一人举旗，整齐壮观。上面我们讲了唐朝接待那些带来奇珍异巧的异域人的方式。这些奇珍异巧就是唐朝的贵族阶层以及模仿贵族者梦寐以求的物品。唐朝人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了唐朝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各式各样的家庭用具上，都出现了伊朗、印度以及突厥人的画像和装饰式样。虽然说只是在八世纪时才是胡服、胡食、胡乐特别流行的时期¹⁹¹，但实际上整个唐代都没有从崇尚外来物品的社会风气中解脱出来。当时有些人物对这种新的观念感到痛心疾首。例如诗人元稹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八世纪末年写道：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咸、洛是指长安(诗中用已经废弃的，长安的前身咸阳来代指长安城)和洛阳两座都城。在唐代，这两座城市是胡风极为盛行的地方。胡风的盛行波及到了语言文字领域，唐朝有些汉人是懂得突厥语的¹⁹³。当时有一部供正经学者使用的突厥—汉语词典¹⁹⁴，而且在唐朝的一些诗歌中，也表现出了突厥民歌对唐诗诗体的影响¹⁹⁵。有许多虔诚的佛教徒还学习了梵文。但是对于其他一些外语，如高丽语、吐火罗语、吐蕃语以及林邑语等语种的学习是否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们还不清楚。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胡风（2）（图）

彩绘戴帗帽骑马仕女泥俑唐代 通高46厘米 1973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地206号墓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仕女上穿桔黄色低圆领短袖襦，下穿蓝、棕色相间的竖条纹宽松式裤；白肤红唇，头梳高髻，戴垂纱帗帽，纱笼娇颜，半遮半露，骑着一匹红马潇洒地出游。帗帽原为居住在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出门防风用的实用性帽子，传到中原地区后成为贵族妇女出游的时尚性装束，在唐初十分流行。朝廷曾禁止这种风尚，却越禁止越风行，以至“则天之后，帗帽大行”。唐朝两京的风尚尤其注重效仿突厥和东伊朗人的服饰。在唐代，当男人及女人出行时，特别是在骑马的时候，都戴着“胡帽”。七世纪上半叶时，贵族妇女喜欢一种带着包头巾的外衣，这种将帽子与面纱连接在一起的衣饰当时称做“幕离”。其实这是一种类似披风的衣服，它将面部和身体的大部分都遮盖了起来，这样既有助于傲慢的贵妇人隐匿身份，又能够避免粗人闲汉好奇的窥视¹⁹⁶。但是到了七世纪中叶之后，端庄淑静的风气日渐衰退，而长面纱也在这时被“帷帽”取代了¹⁹⁷。帷帽是一种带有垂布的宽边帽，这种帽子的垂布只是下垂到

肩部，甚至可以将脸露出来。帷帽最初是用来在灰尘扑面的长途旅程中保护头部的，它是一种男女都可以戴的帽子。帷帽的流行，尤其是妇女戴帷帽，当时在社会上曾经引起了强烈的物议。咸亨二年(671)，唐朝发布了一道诏令，试图禁断那些“深失礼容”的女骑手，要她们在出行时体面地坐进带顶的马车。但是，对于这种诏令根本就无人理会。到了八世纪上半叶，妇女们头戴胡帽，甚至靓妆露面，穿着男人们骑马时用的衣服靴衫在街市上到处策马驰骋¹⁹⁸。在服饰方面，中唐时期流行的还有另外一些外来风尚。如丈夫戴豹皮帽、妇女穿伊朗风格的窄袖紧身服，并配以百褶裙和一种绕着颈部披下来的长披巾，甚至连妇女的头发式样和化妆也流行“非汉族”的样式。而八世纪的宫女则时兴“回鹘髻”¹⁹⁹。九世纪时，正当凉州(这里以易于向外来风尚妥协而知名)这样的城镇中的居民随意地选择外来服装和生活方式时，处在吐蕃统治下的敦煌人民却在保持祖国纯正风俗的精神鼓励下保留了汉装²⁰⁰。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胡风（3）（图）

西夏王妃供养图 佚名 壁画 尺寸不详 甘肃敦煌莫高窟409窟

西夏时，党项族统治者与回鹘人同信佛教，交往频繁。当时沙州（敦煌）虽在西夏政权统治之下，但回鹘人到莫高窟造奉佛像并绘制他们的供养像，亦是自然的事。这幅壁画中所绘的两个回鹘贵族妇女，头戴桃形金凤冠，四面插花钗，耳戴镶珠宝大耳环，身穿宽松式弧线边大翻领对襟窄袖有曳地连衣红裙，手执供养花，这种衣裙与回鹘女装完全相同。回鹘妇女面貌丰润，衣纹流畅，唇脂浓艳，口唇娇小，一方面有少数民族的特点，另一方面犹有唐朝风韵。画面线条清晰，色彩妍丽，以粉线勾画五官，而头发却以留白绘出。风格独特，装饰意味浓厚。

追求突厥人生活习俗的热情，竟然使一些贵族能够忍受那种很不舒服的帐篷生活，他们甚至在城市里也搭起了帐篷。诗人白居易曾经在自己的庭院里搭了两顶天蓝色的帐篷，他在毡帐中款待宾客，并且还无得意地向他们解释帐篷如何能够对人提供保护，免受冬季寒风之苦²⁰¹。在这些都市里的毡帐居住者当中，最著名的一位是伟大的唐太宗的儿子，不幸的皇太子李承乾。承乾太子在生活起居等所有方面都刻意模仿突厥人，他宁愿说突厥语而不说汉语，并且在皇宫的空地上搭建了一顶地地道道的突厥帐篷，而他本人则穿得像一位真正的突厥可汗，坐在帐篷前的狼头纛下，亲手将煮熟的羊肉用佩刀割成片大嚼大吃。伺候他的奴隶们也都是全身穿着突厥人的装束²⁰²。尽管在当时模仿承乾太子的人肯定大有人在，但是具有这种粗野爱好的人的数目毕竟是

很有限的。唐朝社会上更普遍流行的是从外国传来的食品，这些食品当时广泛地受到人们的喜爱。而在外来食品中，最流行的就是各种类型的小“胡饼”，其中特别是各式各样的带有芝麻籽的蒸饼和油煎饼，尤其备受人们的青睐²⁰³。虽然胡饼深受外来居民和唐朝本地人的欢迎，但是制作胡饼的技术是从西方传来的，所以制作和出售胡饼的通常都是西域人。在唐代颇为流行的一个故事中，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位胡饼商。有一个姓郑的年轻人在黎明前从他的情人的家里回来，这时他所在的里坊的大门还没有开，在等待开启里门的晨鼓声时，这位年轻人光顾了这样的一所胡饼店。据记载：（郑子）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廉下，坐以候鼓²⁰⁴。与大众食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为富豪和体面人的餐桌上准备的精美菜肴。这些菜肴中有些是利用昂贵的进口配料制作的，但是在制作方法上却似乎没有根据外国的烹饪方法。在这类食品中，特别流行的是各种添加了香料的香味食品，例如在一种叫做“千金碎香饼子”²⁰⁵的食物中，就必定添加了香料。而有些食品则显然是根据外国传来的食谱制作的，例如在笼屉中蒸制的“婆罗门轻高面”就属于这一类食品²⁰⁶。与衣、食、住以及日常生活其他方面的外来影响相适应的是，在当时的艺术作品中也表现出了对外来事物的浓厚兴趣。唐朝的诗人以及画家们都在他们的作品中描绘了纷纷涌进唐朝境内的外国人。由于艺术家本人的气质可能会与他所处的时代中广为流行的，而且普遍受到人们信奉的文化潮流不相谐调，所以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些崇尚异国情调的艺术家，这是一点也不足为奇的。但是对外来事物的兴趣最为浓烈的时代，却往往是那些开始或重新开始与异国他邦相互交往的时代。所以一个时代对于外来事物的兴趣是否强烈，尤其与扩大国家势力的征服以及商业扩张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典型的以反映外来事物作为创作主题的艺术家在赞颂自己国家的同时，也暴露了他们内心的愧疚——对外国的压迫和剥削使他们的良心受到谴责，而他们又是通过将被迫者和被剥削者理想化来赞颂自己的国家的。正如德拉克洛瓦和高更的绘画作品中的阿尔及利亚人和塔希提人的形象一样，在戈佐利和贝利尼的画作中的摩尔人和撒拉逊人的形象也同样表现出了一种自大的和傲慢的文明的特征。在唐代，也有一些与此极为相似的艺术作品。甚至在外来题材的宗教作品中，也确实存在着类似的情形。例如集中表现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中的三贤人画像的特点，就与在远东佛教艺术中所见到的，长着印度人面孔的阿罗汉的形象不无相似之处。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胡风（4）（图）

三彩牵马俑 唐代 明器 高45.3厘米 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鲜于庭海墓出土

此俑头带幞头，幞头是唐代男子的一种巾帽，用一块黑色的布帛或纱、罗缠裹，其形可随意变化。唐初顶部较为矮平，以后不断变高、变圆、变尖，巾的两脚下垂。中晚唐时幞头内衬帽胎，摘戴方便。引人瞩目的是此俑身穿浅黄色翻领窄袖袍服，是唐代风行的胡服之一。有些中世纪的评论家并没有将反映外来题材的绘画看做是一个特别的种类。例如著名的郭若虚就是如此。郭若虚是在十一世纪时评论九、十世纪的绘画作品，这样就使他正好处在一种不远不近，十分有利和客观的地位上。郭若虚将古代的绘画分作“观德”、“壮气”、“写景”与“风俗”等几个类目²⁰⁷，但是他并没有将反映外国人的以及内容与外国有关的绘画作品归作一个专类——即便他偶而也曾讨论过以外来事物为主题的绘画，例如，他曾经指出了描绘来源于印度的神像的正确方法，认为在绘制因陀罗²⁰⁸的画像时“须明威福严重之仪”²⁰⁹。相反，十二世纪书画鉴赏家宋徽宗收藏书画的目录书《宣和画谱》的佚名作者，却为我们留下了关于表现外国人的绘画作品的一个简要的叙论²¹⁰。这位作者具列的，描绘外国形象的著名画家中有胡和他的儿子胡虔，他们的许多作品一直保存到了宋代。胡氏父子以擅长描绘边荒绝域的狩猎场面以及外来的马、驼、隼而著称于世²¹¹。这位佚名的目录学家声称，这类绘画的真正价值在于，与汉文化比较而言，这些作品描绘了蛮夷文化的粗俗低劣。类似这种说教式的沙文主义，在宋代肯定要比唐代普遍得多。在唐代，以外国为主题的绘画激发出来的感情，是一种屈尊俯就的自豪感；而在宋代，由这类绘画而产生的则是忧惧交加的妄自尊大。总之，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大多数唐代的艺术爱好者以及大多数宋代的书画收藏家，都从这些绘画的风格和色彩中得到了最大的艺术享受。尽管在艺术批评家的著作中很少对表现外来题材和其他时尚的艺术作品进行归纳总结，但是通过对批评家提到的，艺术家们个人最擅长的题材进行综合概括，我们就可以很轻易地勾勒出唐代艺术潮流和风尚的简单轮廓。如果稍加总结的话，就不难发现，七世纪是唐代绘画中外来题材最流行的时代。这时唐朝皇帝的武功已臻顶峰，畏威臣服的蛮夷充斥朝廷，胜利的自豪使这些化外之民似乎也成了为公众所承认的，适合于绘画的主题了。与绘画中的外来题材相比较而言，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在唐代文学作品中，外来题材最盛行的时代是在九世纪，而九世纪则是一个怀旧的时代。在七世纪时，表现外来题材的画家中名气最大的画家是阎立德。阎立德其人是阎立本的哥哥，阎氏兄弟二人齐名，阎立本曾以图写唐太宗本人的真容而享有盛誉。据说在描绘外来题材方面，与阎立德同时或比他更早的画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他的成就

212。贞观三年(629)，中书侍郎颜师古向朝廷引见了一位居住在今贵州省境内偏远山区的土著人。据记载，这位土著的西南蛮“冠乌熊皮冠以金络额，毛帔，以韦为行膝，著履。中书侍郎颜师古奏言‘昔周武王治致太平，远国归款，周史乃集其事为《王会篇》，今圣德所及，万国来朝，卉服鸟章，俱集蛮邸，实可图写贻于后，以彰怀远之德’。上从之，乃命阎立德等图画之”213。描绘外国山川形胜的图画，同样也是在讯问外国贡使的基础上画出来的。虽然在唐代，实用与审美二者在目的及其效果方面无疑都是判然不同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几乎还是无法将表现外国山川形胜的美术图画与实用的战略地图区别开来。贞观十七年(634)，阎立本曾受命描绘太宗朝万国输诚纳贡的场面。在阎立本的作品中，有两幅《西域图》214。距离阎氏兄弟之后一个多世纪，活跃在唐朝画坛上的是周与张萱两位画家。周、张二人都以擅长画仕女画而著称215。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两人都曾画过《拂林(Prom，或Hrom，或Rome)图》，所谓拂林国是指拜占廷疆域内的某个地区。如果这些作品能够保留下来的话，对我们来说它们将是无可比拟的瑰宝，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无法想像这些画家在画面中表现的那些异域景象的特点了216。甚至伟大的王维也根据某个“异域创作了一幅风景画217，但是王维画的“异域究竟是指哪里，现在也无从考证了218。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胡风（5）（图）

卓歇图（局部） 胡环 长卷 绢本 设色 纵33、横256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该图旧传为五代契丹画家胡作。据画中大多数人物髡顶、脑后垂双辫的发式和方顶黑巾等特点，当属金代女真人的风俗，故极可能出自金代汉族画家的手笔。所谓“卓歇”，是游牧民族的一种习俗，即举行渔猎仪式。前半段为立歇部分，马背上的猎物点缀了人马刚从追逐和喧闹中转入了静态。所画骑士，有的在整理马鞍，有的坐着休息；人物的神态也呈多样，有的打着呵欠，显得困倦，有的在叙话，显得神情舒畅。马群的尽头是走向乐舞场地的捧花女，把歇息和乐舞两段有机地结合起来。此后进入了画卷后半段，贵族宴饮的场面。贵人在帐幕前席地而坐，两个仆人在席间斟酒，席侧还有四人带豹皮弓弯恭敬地站立，席前有舞蹈者在箜篌的伴奏下跳跃，构成全图的高潮。整个画面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既自然，又热闹，极富有游牧民族生活气息。全卷组织结构，有疏有密，以沙坡野草统画面，体现草原风光，十分开阔。唐朝画家描绘的这些远国绝域的居民的形象，通常都是穿着他们本地的服

装，而且这类绘画都尤其突出地表现了异域人奇特的相貌。在所有表现外国人的艺术作品中，能够确认其年代的作品，大多数都是由唐朝工匠创作的赤陶小塑像。在这些塑像中，我们可以发现头戴高顶帽、神态傲慢的回鹘人，浓眉毛、鹰钩鼻的大食人(对他们还不能完全肯定)，此外还有一些头发卷曲、启齿微笑的人物形象，不管这些卷发的形象属于哪个民族，在他们身上都表现出了希腊风格的影响²¹⁹。然而，虽然外国人是唐朝大画家喜欢表现的一个主题，但是他们创作的外国人的形象留存下来的却很少。现在我们已经无法得见阎立本画的，进贡者在唐朝皇帝面前躬身致礼，将兽中之王狮子贡献给朝廷的图画了²²⁰。其他如李渐与他的儿子李仲和画的骑在马上的蕃人弓箭手的形象²²¹，张南本创作的《高丽王行香图》²²²，周画的《天竺女人图》²²³，张萱的《日本女骑图》²²⁴等等，今天也都已经见不到了——但是在敦煌壁画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面貌古怪、帽子奇特，留着外国发式的中亚民族人物的形象²²⁵——然而，当武士、文吏以及疲惫不堪的朝圣者在唐朝驻军的保护下，通过当时西域的绿州城市时，他们就会看到身穿希腊风格衣饰的佛陀形象，具有最纯正的伊朗人特征的供养人形象，还有直接表现热烈的印度史诗场面的裸体女像²²⁶。在唐代这一段激奋人心的岁月里，对于艺术家而言，异域的野生动物(尤其是那些由外国使臣作为贡礼，带来献给唐朝朝廷的野兽)还有家畜(特别是唐朝人羡慕和渴望得到的那些家畜，如鹰隼、猎犬、骏马等)也都差不多具有同样强烈的吸引力²²⁷。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胡风（6）（图）

各国供养人 佚名 唐代 壁画 纵95、横80厘米 甘肃敦煌莫高窟103窟

此图是《维摩诘图》的一部分。描绘维摩诘与文殊师利辩法之时，各国供养人皆往探视、恭敬礼佛的神情。供养人中有“昆仓奴”、“婆罗门”、西域胡人等，他们态度虔诚，神情肃然，手持供奉之物，正缓步向前，似要奉献给佛祖的代表。此图属吴道子一派画风，作者刻意追求线的造型功能，淡墨起稿，黑墨定型，浓墨提神。线条的粗细虚实，运笔的轻重缓急、披离点染，全都浸透在人物的皮肉筋骨之中，所画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动”、“超出缣素”之感。最后，唐朝艺术家喜欢表现的外来题材还有外国的神和圣者，尤其是佛教发源地的神与圣人，更是他们喜欢表现的对象：瘦削憔悴的印度罗汉，璎珞被体、法相庄严的菩萨²²⁸，还有表现为佛法的守护神和中国的殿堂门庭里的保护神的古代因陀罗和梵天²²⁹以及其他一些已经部分地同化于北方游牧民族文化

和汉族文化的守护神——例如北方的保护神俱毗罗就被表现为身上穿着中国式的长袍，但是却长着颌毛和胡髭的形象²³⁰。这种在绘画中将中国的和外国的特点混杂在一起的现象，有时是因为描绘外来题材的画家使用了汉人作为模特的结果，例如当时一所佛寺中的梵天女的形象，就是一位侍奉大贵族的艺妓形象的写真²³¹。这就如同意大利名妓的外貌被借用来描绘文艺复兴时期的圣母形象一样。那些表现佛教极乐世界的精美画像，必定也是由许多这种混杂的形象组合而成的。而在表现虚无缥缈的仙境的图画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形。初唐时期佛像画家中最著名的一位画家本人就是于阗的胡人²³²。这位画家的塞语的名字

叫“Viarasang.”²³³，汉文史料中称之为尉迟乙僧。尉迟乙僧大概是在七世纪中叶时被于阗王推荐到唐朝宫廷中来的，他带来了一种来源于伊朗的，新的绘画风格。尉迟乙僧用这种绘画技法创作的形象带有强烈的立体感和明暗色彩，人物形象凸现于画面之外，几至飘然欲出。这位大师创作的一幅“天王像”，一直流传到了现在²³⁴。据说，他的画风影响了画坛巨擘吴道玄，而且为敦煌地区的石窟壁画所效法²³⁵。尉迟乙僧还因为帮助将“铁线描(即用粗细不变的线条勾画人物的西方技法)带入了唐朝的大城市中而享有盛誉²³⁶。尉迟乙僧不仅用外国技法作画，而且他也并不鄙视表现外来题材，比如，他曾经创作过一幅“龟兹舞女”的画像²³⁷。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外来事物在文学中的反映

（1）（图）

榜葛刺进麒麟图 清代 陈璋 临摹 纵118.3、横46.5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原图为明沈度绘，描绘“永乐六年榜葛刺国王霭牙思遣使来贡”。榜葛刺即今孟加拉。郑和下西洋使团曾数次访问榜葛刺，受到隆重接待。该国也曾于永乐、宣德年间数次访问中国，并赠名马、麒麟等物。麒麟本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祥瑞灵物，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后来有人将热带地区的长颈鹿也称为麒麟，明人沈度所绘《瑞应麒麟颂并序》流传至今。榜葛刺贡麒麟，在当时轰动了朝野，杨士奇还写有应制诗赞颂，明内阁藏书目录中有群臣祝贺的“瑞应麒麟诗”16册，可以反映当时的盛况。这幅榜葛刺进麒麟图，是中国和孟加拉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文学作品中反映外来事物的高峰时期比造型艺术中大量反映外来事物的时期几乎晚了整整两个世纪。文学作品中的这种转变开始于八世纪末期，它的出现也与反对“新的”骈体文(这种骈体文的出现只有几

个世纪)的古文运动有关。但是文学作品对异域的风貌的兴趣不仅表现在这一时代的散文中，而且也体现在这一时期的诗歌的内容中。绚烂的色彩、奇丽的想像、浪漫的意境等等，吸引了九世纪许多优秀的诗人的注意力。这一时代的典型人物是李贺。李贺是一位想像丰富、奇诡险怪、色彩鲜明的诗人。他在诗歌创作中总是喜欢使用夸张和举隅的手法，例如以“琥珀”代表“酒”，用“冷红”借指“秋花”²³⁸等等。这位年轻的文人热衷于阅读丰富的古代典籍“诸子”和禅宗的《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李贺英年早逝²³⁹，宋代批评家称他为“鬼才”²⁴⁰，而所有这些在我们看来则是毫不足怪的。在李贺的诗歌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奇妙的异域风情，正如在《昆仑使者》一诗，或在他对一名卷发、绿眼的胡人儿童的描写中反映出来的那样²⁴¹。另外一位与李贺风格相似的诗人是杜牧。杜牧是一位官僚，而且还因为写了一篇《论兵事书》在当时享有盛誉。他在文章中主张“胡戎入寇，在秋冬之际，盛夏无备，宜五、六月击胡为便”²⁴²。然而，无论杜牧的经世才能如何，他也不失为一名浪漫派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常常流露出对往昔的追忆：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首诗通过对长安附近温泉地方的废弃的宫殿²⁴⁴景物的描写，抒发了作者的胸臆。在很久以前，这里的宫殿曾经是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过冬的寓所²⁴⁵。诗中谈到了一种奇怪的驿骑，这些驿骑专门负责将荔枝由广州运到华清宫，以满足杨贵妃任性的要求。九世纪时，第三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诗人是元稹。这位伟大的作家热切地向往传说时代的古朴、典雅的准则规范。例如泗水河边有一种石头，在最古老的文学作品中，这种石头是以制作磬的原料而闻名的。八世纪时，人们放弃了泗滨石，转而选用一种新的石料作为制作磬的原料²⁴⁶。元稹对此痛惜不已；他也悲叹当时几乎已经无人欣赏古乐。元稹曾经不无感慨地写下了“玄宗爱乐爱新乐”(即唐玄宗虽然喜爱音乐，但他喜欢的是“新”的音乐)的诗句。甚至在他以当时流行的形式创作的歌诗中²⁴⁷，元稹也在哀惋新事物和外来事物的侵入。尽管元稹的诗歌力求归朴返真，但正是因为诗人在诗歌中讨论了与外来事物有关的主题——进口的犀牛、大象以及突厥骑手、骠国乐等等——这些诗歌才得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简而言之，元稹是一位奇特的，反对外来事物的诗人。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外来事物在文学中的反映 （2）（图）

职贡图 唐代 阎立本 卷 绢本 设色 纵61.5、横191.5厘米

画中所见，显然是“异方献宝，万方来朝”。所绘为唐太宗时，爪哇国东南有婆利国、罗刹二国，前来朝贡，途中又与林邑国结队，于贞观五年（631）抵达长安。全幅共27人，画中人马各自成组，由右往左前行。一脸虬须骑白马，后有仆人持伞盖掌羽扇随从，后随抬一笼子的鹦鹉，这可能是林邑国的使者。画左端也有伞盖随侍者，手捧怪石，旁有黑肤卷发昆仑奴，可能是婆和国使者。画中人物穿附、持象牙，着古贝布、有孔雀扇、耶叶、琉璃器（双重罐）、臂钏、敬浮屠、假山石（蚶贝罗）、香料、革屣、珊瑚、花斑羊等，画之时代虽未必是唐，但存唐之历史则弥足珍贵。但是，外来事物传入的历史在唐代诗歌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关于外国题材的传奇文学比反映外来事物的诗歌要有名气得多，反映外来事物的传奇故事构成了唐代传奇的一个重要流派。八世纪末的二十年和九世纪初的二十年，即八、九世纪之交的四十年间，是反映外来事物的传奇最兴盛的时期。特别是在九世纪初年，各种各样的奇妙的想像以及新奇的内容，形成了传奇文学的流行模式。幸运的是，许多反映外来事物的传奇作品一直流传到了二十世纪。通常有这么一类关于神奇宝石的故事，它或者由诡密的异域人带入唐朝，或者是他们在唐朝境内寻找。这些宝石具有澄清污水的妙用，还有揭示埋藏的宝藏的功能，它能够为航海者带来顺风，或者天生就具备了其他一些同样能够满足人们的欲望的属性²⁴⁸。追求怪诞离奇的风气²⁴⁹，在晚唐那种令人惊叹不置的，嵯峨险劲、凜然肃穆的风景画中也表现了出来²⁵⁰。当然，这种风气也包括艺术品中表现的那些充满浪漫情调的外来之物。从种种荒诞不经的故事里和那些由国外传来的，深受人们喜爱的物品身上，我们可以列举出最典型的例证来证明这些风气。尤其是那些据说在唐代以前就已经进献给了中原王朝的，最奢华的奇珍异宝，是最能说明这些风气的例证。因此，我们将要讨论的并不是真的进口货的魅力，而是在陆地和大海上无处不在的那些商货的魅力；不是真正的黄金制作的礼物，而是以这些贡物为原型而虚构的，传说中的贡品—向往的珠宝和想像的金银织品。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外来事物在文学中的反映 （3）（图）

三彩女骑马俑 唐代 高35.5、长28厘米 1972年咸阳市礼泉县李贞墓出土
昭陵博物馆藏

女俑面庞圆润，细眉朱唇，额上画有四个黑色圆点细花钿。内穿淡黄色窄袖衣，外套圆领半臂，系绿色长裙，足着圆头鞋，一手下垂，一

手置于胸前，为初唐妇女骑马出行的写真。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女俑头戴“山”字形宝相花纹翻沿胡帽，由此可见唐代崇慕胡风，以及仿效胡风的盛行。想像的贡品一开始并不是在唐代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但是这些经过想像加工的贡物反过来确实刺激了人们的想像力。其实从古代时起，就已经有了向穆天子贡献奇妙贡礼的故事。自那时以后，每个时代都有种种由外国贡献的神奇的贡礼的传说。据记载，古代的“赤乌之人”曾经向周穆王敬献过两位美女，周穆王将她们纳为嫔妃²⁵¹。这两个女孩子的原型，就是作为贡礼从科罗曼德尔海岸送来的两位黑人少女。据十三世纪的一部精详的史料书中记载，这种黑人少女“黑如昆仑，其阴中如火，或有元气不足者，与之一接，则大有益于人”²⁵²。古人相信，国外的旅途充满着自然界的险阻和精灵鬼怪的危害，在中国范围以外的任何地方，随时随地都会有大难奇险降临头顶，这种看法进一步增加了种种神奇传说的魅力。古人总是相信，精灵鬼怪等候在山间小径的每一处拐弯的地方，潜伏在每一次热带风浪的后面²⁵³。来自外国的人和物都自然地带有这种危险而又使人心醉神迷的魅力。即使晚至唐代时，外国传来的神可能还带有某种不确定的魔法和危险的妖术的味道。然而在每个时代，只要一件事与某个遥远的地区有关，人们就乐意相信各种离奇古怪的迷信说法，在我们这个时代也不能例外。简而言之，这种幻想的贡物的概念，在九世纪并不是新鲜玩艺。当时记载这种贡物的书籍仅仅是给那些古老的，未加修饰的传说赋予了新的活力。但是九世纪的这些著作，也从唐代前半期的历史事件中去寻找原始素材，因为这在九世纪的唐朝所能见到的外来事物中已经成为了稀罕之物了。在七、八世纪，尚慕胡风的倾向在物质以及精神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域外之人以及他们新奇的服饰随处可见，仿效外国人的风气到处盛行。在这活跃而开放的时代中，天子甚至必须要一次次地发布禁令，禁止灾祥符瑞、异兽奇禽以及各种奇形怪状的物品的贡献，以便为他的那些奢糜而轻信的群臣做出榜样。唐朝的创建者在他登基的第一年里发布的一道诏令，就是这种示范简朴的一个显著的例证²⁵⁴。当然我们首先应该指出，这道诏令的颁布还有另外的意图，这就是特意强调在唐朝之前的隋朝政权的奢糜无度。在这道诏令中规定“……其侏儒短节、异兽奇禽，皆非实用，诸有此献，悉宜停断，宣布远迩，咸使闻知”。其实这道诏令并没有实施很长的时间，此后，唐朝皇帝又一次次地发布了类似的禁令²⁵⁵。在这些诏令中不是将矛头指向类似来自诃陵的五色鹦鹉这样的奇禽，就是直接将东北地区的白如霜雪的猎隼那样的没有实用价值的禽鸟作为被禁断的对象。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外来事物在文学中的反映

（4）（图）

张果见明皇图 任仁发 元代 卷 绢本 设色 纵41.5、横107.3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张果为传说中的“八仙”之一，相传为唐时人，自称生于尧时，故称张果老。唐玄宗派人迎入长安，此图即表现张果老在唐玄宗面前施展种种法术的情景。身穿龙袍的唐玄宗李隆基（明皇）高坐圈椅之中，右边的第一人即张果老，白髯高冠，紫衣对坐；地下有一筐，启盖斜置，一头小白驴正从筐中飞奔而出，一童蹲地驱之。人物气韵生动，用笔轻净利落，衣纹作游丝描，线条简练刚劲，设色古雅明丽，极为工整。任仁发（1255—1327），元代画家、水利家，字子明，号月山道人，松江（今属上海）人。工书法，擅画人物、花鸟，尤长于画马，识者谓可与赵孟相匹敌，“用笔逼龙眠”，“法备而神完”，在当时享有盛誉。但是，在经历了八世纪后半叶的动乱之后，在唐朝这块饱经蹂躏的土地上，人们能够见到的，从海外和陆路传来的珍奇物品越来越少了。而且经过黄巢的劫掠（例如掠夺广州期间对外国商人的大屠杀）之后，外来的奇珍异巧就更为罕见了。也就是在这同一个世纪里，唐朝政府开始了对外来宗教的大规模的迫害运动。从一般唐朝人的眼光来看，这次迫害运动不仅是要铲除外国宗教、外国僧侣以及外来宗教的信仰者，而且也要铲除外国书籍和外国神像。从九世纪初期开始，唐朝的国际时代、进口时代、融合时代和黄金时代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于跨越大海，翻过大山而来的珍奇物品的渴求——不管是佛教手稿还是医书，也不管是昂贵的锦缎还是珍奇的美酒，甚至哪怕是想要一睹来自突厥斯坦的杂耍艺人的风采——都已经不可能轻易地得到满足了。于是古代传奇得到了新的，旺盛的生命力，它为怀旧的想像提供了感官所不能给予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些情形的发生是一点也不足为怪的。有关虚构杜撰的进口物品和怪异荒诞的贡物的唐代传奇，绝大部分创作于九世纪时，而在这时期，真实的新奇物品已经无法到达唐朝境内了²⁵⁶。在贸易品方面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在九世纪时被文学作品中对外来物品的夸张描写取代了。一位现代学者是这样说的：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再是一个现实的世界。我们已置身于梦境之中，灵魂像蜡烛之光，在梦境中微微闪烁。自然景致变成了一种“内在的特征”。世界淹没在了无边无际、朦朦胧胧的海洋之中，留下来的只有“一缕香魂”²⁵⁷。在传奇故事中，有许多都是假托叙说唐玄宗统治时期的故事。在唐朝历史上，玄宗是一位神话般的国王，是唐朝处在世界主义时代时的一位最荣耀的君主，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个内行的外来物品的鉴赏家，甚至在他去世之

前，玄宗就已经成了一切具有浪漫色彩的事物的象征²⁵⁸。在玄宗时代，人们可以随处听到龟兹的琵琶！而到了九世纪时，这一切就已经成了梦想。下文列举的几个故事，就属于九世纪的这种创作性回忆的典型范例：据一则故事中记述，在唐朝一位大臣献给唐朝皇帝的“定国宝”²⁵⁹中，有两枚“西王母”的白环——西王母是一位模糊而久远的人物，她与居住在世界之巅的山里的神仙的梦想有密切的关系——这种白玉环与其他那些民间传说中非常有名的，具有魔力的玉环很相似。据信，谁要是有了这种玉环，他就能使所有周边的国家臣服²⁶⁰。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外来事物在文学中的反映 （5）（图）

独角兽 魏晋 彩绘 砖长17.5、宽36.5厘米 甘肃嘉峪关魏晋13号墓

关于独角兽的记载，西方在公元前398年，希腊历史学家Ctesias就写道：“独角兽生活在印度、南亚次大陆，是一种野驴，身材与马差不多大小，甚至更大。它们的身体雪白，头部呈深红色，有一双深蓝的眼睛，前额正中长出一只角，约有半米长。”这些描述他是从一些旅行者那里听来的。有人推测，独角兽可能是由印度犀牛、喜马拉雅山羚羊和驴子混杂而成。整个中世纪传统使欧洲人相信存在着叫作独角兽的动物。但经过多次周游欧洲之后，人们认为独角兽不大可能生活在欧洲。于是，人们认定它应该生活在东方。马可·波罗游历中国时也曾寻找独角兽。他的游记中提到，在爪哇，他见到一种有些地方看上去像独角兽的动物，它们的嘴上长着独角。他认定这些奇特的动物就是独角兽。事实上，他看到的是犀牛。在中国的笔记小说中有些神奇的犀牛的角，比如通天犀，具有和独角兽的角同样的功能，现在无法考证是谁受了谁的影响。另一个故事讲的是由交趾国进贡的一枚犀牛角²⁶¹，这枚犀牛角“色黄如金”，放置在皇宫的金盘里。据带来犀角的使臣解释，这种犀牛角具有驱寒的功能——在犀牛角周围也确实“温温然有暖气袭人”²⁶²。与辟寒犀功能类似的，是被称做“瑞炭”的一百根炭条。据说，这种炭是由甘肃境内的一个古代国家，即西凉国贡献的。瑞炭坚硬如铁，“烧于炉中，无焰而有光。每条可烧十日，其热气迫人而不可近也”²⁶³。来自龟兹的一件贡礼是由一块酷似玛瑙的光滑的石头制作的，做工“甚朴素”的枕头。有幸能够枕在这个枕头上睡觉的人，就可以在梦中四处漫游，海洋陆地，无所不至，甚至还能到俗世凡人闻所未闻的仙境中游历。故事中告诉我们，这个幸运的人是新贵官僚杨国忠。由于杨国忠是唐玄宗所宠爱的杨贵妃的表兄，所以他真可以说是幸而又幸。

了264。下面要讲的这个故事反映了唐朝对美玉以及最华贵的矿石的长期不懈的追求：在玄宗朝中期，唐玄宗对于近年的贡物中没有用五色玉制成的贡品感到惊奇——五色玉是一种近乎传说的玉石——虽然玄宗的库藏中有一条用美丽的五色玉作为饰物装饰成的腰带和一个用五色玉雕成的玉杯，但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由西方贡献的。于是唐玄宗命令其主管“安西的军将谴责进贡的诸蕃玩忽职守。虽然文献中没有记载所谓“诸蕃的具体名称，但是这里提到的失职的诸蕃，可能就是指于阗人。因为于阗国有着无穷无尽的玉石资源，而且，于阗的音乐尽管优雅动听，于阗的妇女虽然美丽动人，但是对于汉人来说，当时的于阗似乎还是属于诸蕃之例。不管故事中提到的“诸蕃”究竟是指哪个国家，实际上它们并没有忘记将这种美丽的五彩宝石运往长安，不幸的是，他们派出的商队遭到了小勃律的袭击，货物也被抢劫一空。袭击商队者来自帕米尔雪原265边缘的寒冷而狭窄的山谷之中，他们是一群“缠巾、食虱”的强盗。当这坏消息传到宫禁之时，天子大怒，命令四万汉军和无数附属的蕃军包围抢劫者的首都，重新夺回珠宝。小勃律王很快就献出了他抢夺的珠宝，并且谦恭地请求得到每年向唐朝进贡的殊荣。他的请求遭到了拒绝，不幸的吉尔吉特城也惨遭劫掠。得胜的唐朝将军带着掠夺来的三千名幸存者班师还朝。勃律的一位蕃人术者宣称，唐朝将军会遭到毁灭的厄运。这位术者不幸而言中了。后来这批唐朝的士兵全都在一场暴风雪中丧生，只有一位汉人和一位蕃人幸免于难。于是倒霉的玄宗最终失去了已经到手的财宝，“即令中使随二人验之。至小海侧，冰犹峥嵘如山，隔冰见兵士尸，立者、坐者，莹彻可数，中使将返，冰忽消释，众尸亦不复见”266。八世纪是一个神奇魔幻、无所不能的时代。那些在其作品中虚构外来物品的作家们力图发挥想像重新创作的，正是这一去不复返的八世纪的世界。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外来事物在文学中的反映 （6）（图）

商人遇盗图壁画唐代敦煌莫高窟第45窟

这幅壁画表现了一群商人在山中遭遇抢劫的情景。画面中心，一名手持长剑的盗贼，气势汹汹地挡住去路，后有同伙支援；而受惊的商人则挤成一团，这些商人们相貌不同、服饰有别、神态各殊。商队中为首的人高鼻深目、翘胡卷发、白毡高帽、圆领长袍、脚登长靴，典型的波斯商人形象。他们赶着毛驴、驮着丝绸，神色紧张地注视着盗贼，并将钱袋等物丢在地上，驴也因受惊而张口瞪眼，双耳前竖，神态刻画得极

为逼真。写作于九世纪末叶稍前的一部著作，就是这种类型的小说的一个重要的范例。这本书与大多数备采各类灵异志怪的传奇著作不同，它的内容几乎全部都是反映与外来物品传奇有关的主题。这本著作取名为《杜阳杂编》²⁶⁷，是由一位叫苏鹗的文人在僖宗乾符六年(876)撰写的²⁶⁸。下文列举的就是他所描写的一些珍奇物品：“灵光豆”²⁶⁹是由一个叫做“日林”的国家进献的，“日林”或许可以解释为“日之源”，也就是指“日本”²⁷⁰。日林国在隔海东北方向遥远的地方，这里出产一种巨大的光石，并因此而享有盛名。据称这种石头就如同现代的X光机一样，“可鉴人五脏六腑”，所以医生可以利用它来检查患者内脏器官的状况，以便更快地治愈疾病。灵光豆自身颜色殷红，光芒可长数尺，“和石上菖蒲叶煮之，则大如鹅卵”。皇帝本人曾试尝了一枚这种奇异的灵光豆，结果发现味道“香美无比”，而且吃了以后“数日不复言饥渴”²⁷¹。另一种神奇的食物，是神秘的南海某国进献的一种芬香的小麦²⁷²，吃了这种小麦，可以使人身轻御风。此外还有一种紫色的稻米²⁷³，具有返老还童，延年益寿的功能。南海还贡献了一个水晶枕²⁷⁴，在这种枕头里可以看到由建筑物和人物构成的奇妙景观，与水晶枕一起进献来的是一床由“水蚕丝”织成的“神锦衾”²⁷⁵，这种织物在濡湿之后即可扩展，而当受热时又能收缩。龙是水之神，由神龙显化，精气凝结而成的细微精妙之物，是另一种深受欢迎的贡礼。“龙角钗”和“履水珠”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神奇的龙角钗是与灵光豆一起贡献给唐朝的一件贡礼。它是用一种深酱紫色，类似于翡翠的玉石制作的，“上刻蛟龙之形，精巧奇丽，非人工所制”。代宗皇帝将它赐给了美丽的宠妃独孤氏²⁷⁶。有一天，当代宗与独孤氏在龙舟池泛舟时，一团紫云从龙角钗上生成，皇帝将钗放在手掌中，在它上面喷上了水，于是雾霭凝成两条龙，腾身跃入空中，在东方冉冉消失。履水珠“色黑类铁，大于鸡卵，其上鳞皱，其中有窍”。携珠的人可以自在无虞地来往于波涛之中。唐代宗曾试着用五色丝(毒龙害怕五色丝)将履水珠捆在一个擅长游泳的人的胳膊上。于是这个人就能行走于水面，跃入水底，而出来时身上竟没有濡湿。后来，当一位宫女拿着履水珠在海池中嬉戏时，履水珠变成了一条黑龙。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外来事物在文学中的反映 （7）（图）

盘龙铜镜 唐代 照面用具 直径19.5厘米

隋唐时代使用龙纹已非常普遍，不只是出现在石刻、壁画上，实用

器皿也多用其作装饰图案，唐代盘龙镜是其典型代表。这件盘龙镜为单龙图纹，一龙蟠屈飞腾，跃入苍穹，张口舞爪，回首向钮作吞珠形态，云纹缭绕，灵活飞动，把人们想像中的神物刻画得雄奇莫测。龙纹镜在唐代诗文中不乏记载，最著名的是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扬州进贡的龙纹镜，它青莹耀目、势如生动，唐玄宗看后十分惊异。李白、孟浩然等诗人的诗作中都出现过“盘龙镜”的名称，可知盘龙是唐镜最喜爱的题材之一。奇异的鸟以及鸟之精灵，也是唐朝人盼望得到的理想贡物。“却火雀”就是这样一种鸟。却火雀是在顺宗继位时进献来的一种黑色的雀形目鸟。它是一种象征性的贡物。却火雀的特点是不怕火的侵害。简单地说，与西方通常误称为“phoenix”的中国传说中的“凤凰”不同，却火雀才是真正的“phoenix”。这种鸟就是印度的“samandal”（据阿拉伯人讲，在沃格沃克也发现过这种鸟），正是这种鸟的皮，才不会被火焚毁²⁷⁷。唐顺宗在寝宫中用了一个水晶鸟笼来盛放这只神奇的鸟。宫里的侍女用蜡烛烧鸟来取乐，但是却火雀的羽毛却丝毫没有受到损伤。另外一个国家²⁷⁸曾贡献过两名舞女，一名“轻凤”，一名“飞鸾”²⁷⁹，所谓飞鸾、轻凤是人们所能想到的最为轻盈飘渺的飞禽形象。这两位舞女头戴金冠，金冠上饰有想像中的鸟的形象，她们的得名可能就是因为头上戴的这种想像的鸟，或者是因为她们自身具有这种想像的鸟的神韵。她们进餐的食物大都是荔枝、金屑和“龙脑”。离奇的供暖器具是《杜阳杂编》记载的外来异物的一个特殊的类别。“常燃鼎”是一种不用生火即可做饭的器物。这种非常有实用价值的器物是由一个神秘的王国²⁸⁰贡献的。书中用充满幻想的笔调描述了常燃鼎，其中有许多内容都涉及到一千多年以前的，汉朝历史上提到的国家。与常燃鼎性质相近的一种贡物是“火玉”，火玉是一种红色的玉石，它的作用与煤炭的余烬相同，“积之可以燃鼎，置之室内则不复挟纩”。与供暖器具作用相反，但却具有同样重要的实用价值的是冰凉器具，在这本书中，有关冰凉器物的记载也非常之奇妙。“常坚冰”发现于一座大山之中，山里的冰川已经历时千年之久。即使是放在最炎热的阳光之下，这种冰也不会融化。“松风石”是一种呈半透明状的石头，“其中有树，形若古松”，松风石中的古松的枝条能够生出一阵阵凉爽的微风。每逢盛夏酷暑，皇帝就将松风石放在靠近自己的地方消暑。“变昼草”虽然没有上面说的器物那样合意、适用，但也足以使人惊叹不置。这种草似乎属于芭蕉属植物，“树之，则百步内昏黑如夜”。变昼草的这种不可思议的特征，使皇帝很不高兴，认为这种草“背明向暗”，不足为贵。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外来事物在文学中的反映

（8）（图）

朱雀图 佚名 西汉 卜千秋墓壁画 河南省洛阳邙山南麓卜千秋墓

此幅朱雀图见于西汉昭帝、宣帝时期的卜千秋墓的壁画。这只朱雀鹰头凤尾，挺胸拍翅，神形毕肖，惟妙惟肖。色彩以朱红为基调，有主有从，明快和谐，其用线及敷色手段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令人惊叹。

《杜阳杂编》记载的这些带有浓厚的想像色彩的奇珍异宝中，有些无疑是真实的东西，或者至少是根据真实的东西加工改写而成的。如同苏鹗描写的其他许多贡品一样，由新罗的高丽王贡献给唐代宗的“五彩毼毼”²⁸¹就是属于这个类型。五彩毼毼制度巧丽，冠绝一时，“每方寸之内，即有歌舞伎乐，列国山川之像。忽微风入室，其上复有蜂蝶动摇，燕雀飞舞，俯而视之，莫辨真假”。“万佛山”也是新罗国进献的贡礼。万佛山高约十尺，是用印度尼西亚的伽罗木雕刻而成的，并且还镶嵌了宝石作为饰物。山上以建筑和树木作为衬景，雕刻了各式各样的精细微妙的佛像，“其佛之形，大者或逾寸，小者七、八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半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无不悉具。而更镂金玉水晶为幡盖、流苏，庵罗、葡等树。构百宝为楼阁台殿，其状虽微而势若飞动。又前有行道僧徒，不啻千数，下有紫金钟，径阔三寸，上以龟口衔之，每击其钟，则行道之僧礼首至地。其中隐隐谓之梵音，盖关戾在乎钟也。其山虽以万佛为名，其数则不可胜纪”。唐代宗本人就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将这件象征天堂的雕刻品放在了一座圣殿中，并将五彩毼毼铺在了地板上。像万佛山这样奇妙的贡礼，很可能并不是完全出自想像²⁸²。唐德宗皇帝常常得到一些受过训练的野兽和珍奇飞禽，但是他总是按照佛教的戒律将这些生物放生。可是惟独对于一只建中二年(781)由南方某国贡献的美丽的“朱来鸟”，他却按照以往的作法将它放生。就文献记载的某些体形特征而言，唐朝可能确实有过“朱来鸟”这种珍贵的禽鸟。朱来鸟的喙部是红色的，紫蓝色的尾巴甚至比身体还长。这种鸟非常的聪明伶俐，“巧解人语，善别人意”。它的嗓音高亢而尖利。显然这是一只热带鹛²⁸³。这只鸟中的花花公子备受宫女的喜爱，她们用最昂贵、最精美的食物来喂它，“夜则栖以金笼，昼则翔于庭庑，而俊鹰大鹞不敢近。不幸的是，有一天它被一只巨雕抓住杀害了。宫里的人们真诚地举行了哀悼活动，并由一位擅长书法的朝臣书写了一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²⁸⁴，为这只可爱的小鸟超度亡灵²⁸⁵。此外，南海某个不知名的国家曾贡献过一位十四岁的少女。这位少女名叫“卢眉娘”，她“幼而慧悟，工巧无比，能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米，而点划分明，细于毛发。卢眉娘可能也实有其人。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外来事物在文学中的反映 （9）（图）

花鸟图 佚名 夹缬屏风 绢本 设色 纵141.3、横48.2厘米（日）正仓院藏

这批夹缬屏共六扇，为日本天平胜宝八年（756）圣武天皇忌辰，光明皇后赠与东大寺的部分宝物。此图为明治时所编目录中的屏风六扇中的第一扇。画面背景为高大的花树，一羽毛绚丽的禽首站在岩石上回首顾盼，下面有草花。鸟、树干、枝叶及草花，皆钩勒填色，表现了盛唐花鸟画的形式特点。上文列举的这些奇珍异物，只是苏鹗著作中描述的洋洋大观的外来异物中的一些典型的例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这些异物中，有些是由现实存在国家贡献的，例如日本、新罗等；有些是那些年代久远、闻所未闻的国家的贡物；而有些贡物的产地则全都属于神话传说中记载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将唐代的可靠文献中的朝贡记录加以考查的话，就会发现在这些文献中并没有记载《杜阳杂编》中描述的任何一种贡物，甚至连那些“现实中存在的国家”的贡物也不见于正史记载。苏鹗在《杜阳杂编》中叙述的时代包括了八世纪后半叶和九世纪上半叶，相当于苏鹗自身所处的时代之前的一个世纪。这时正是大唐盛世的薄暮和日落时分。而苏鹗亲身经历的萧瑟衰败的时代在这时还没有到来。在苏鹗本人声称要描述的年代中，在唐朝境内实际上还有来自回鹘的骏马，来自渤海的舞女，来自骠国的乐师，来自林邑的犀牛以及被世人遗忘的波斯帝国的某些残余势力贡献的珍珠和琥珀。苏鹗本人的作用仅仅是用一些诡怪灵异、赏心悦目的物品填充了这个没落时代在实际进口物品方面的空白。简而言之，他的著作描述了关于商业贸易的仙地奇境和古代外交现实的传奇。这部著作的魅力在于它收录了古代的外来之物，其中既有荒诞不经的珍宝，也有被人忽略的奇物。虽然我们也许可以相信其中有些传说来自八世纪末年，唐朝日薄西山时期对于实际存在的贡使的记载——只是通过苏鹗的想像进行了加工润色——但是这些记载只能用作怀古感今的好素材，不能作为经济学家研究工作的依据²⁸⁶。

第二章 人战俘（1）（图）

突厥石人 唐代 通高285厘米1961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阿尔卡特墓地发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新疆石人主要分布在阿尔泰山、天山、准噶尔西部山地的草原上。

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直到公元11世纪，生活在天山以北草原地带的许多游牧民族都有在墓前立石人以作纪念的葬俗，其中族属最为明确的是突厥石人。这件圆雕是典型的突厥武士石人中的精品，由花岗岩石精刻而成，身材魁梧，相貌威严，大眼，阔脸，八字胡须，颈饰项圈，身着窄袖翻领长衣，右手托杯于胸前，左手在腰间握长刀，腰系宽带，腰间左侧另佩有小刀，脚蹬皮靴，呈八字形面东而立。石人生动地反映了自公元6世纪活跃在北疆草原尚武好战的突厥贵族或武士的形象。金、银、宝石、珍珠、亚麻布、紫布、丝绸、朱红布等载货，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具，极宝贵木制的，铜、铁、白石制的各样器具；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牲畜，羊，马，和车，以及奴仆(或译人底生命)和人底性命(或译人底灵魂)1。——《启示录》，第二章，第18行。

中世纪带入唐朝的物品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就是“人底性命”。异域(包括唐朝人已知的和未知的地方)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大量进入唐朝境内，在唐朝社会中扮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其实他们并不是生来命中注定就要扮演这种角色的，只是由于命乖运蹇，或是由于唐朝皇室成员一时的古怪念头，才使他们承担了他们在大唐的天空之下扮演的角色。

在七世纪期间，当胜利的唐朝军队横扫他们面前各个角落的野蛮人部族时，大批战俘在唐朝境内被迫陷入了遭受奴役的境地。突厥人在战俘中所占的数量最大，当时从蒙古草原和西域的荒漠中带来了大批的突厥战俘。东北地区和高丽诸民族中也有许多人落入了唐朝军队的手中，这些战俘被送给唐朝的天子和他的宠臣，为他们作苦工。甚至连唐朝境内的居民也有可能交上厄运，成为战俘。贞观十九年(645)，在唐朝征伐高丽的战役中，有一万四千名辽东城的居民被宣布没为奴婢，他们是因为胆敢抗拒王师，在战争中被唐朝军队俘获的。只是因为后来唐太宗格外降恩，才将他们放免，“赦为百姓”2。

但是，上千名不幸的俘虏却被送回了长安都城。在凯旋仪式上，先以这些俘虏向城里的居民耀功，然后由得胜的将军献给天子和太庙中天子祖先的神灵。

在举行凯旋庆功仪式时，得胜的将军身上穿着游牧骑士的服装，他的部队全身甲胄，停在都城的东门之外。东门外排列着身穿盛装的神策军，他们是来欢迎凯旋者的。当典礼官发出信号时，凯旋仪式就开始了。走在前面的是两列骑马的军乐队，演奏着箫、笛、篳篥、箛3、鼓、铙等乐器，凯旋行列中还有一支合唱队，演唱专门为这种盛大的场合而准备的四首颂歌。他们唱的凯歌叫《贺朝欢》，歌词如下：

四海皇风被，千年德水清。戎衣更不著，今日告成功

4。

在这些颂歌中，至少有一首专门设计了舞蹈动作：最先进行演奏的凯歌和舞蹈是“破阵乐”，这首乐曲是在贞观六年(632)为纪念唐太宗的武功而创作的，有一百二十八名身穿银铠的童子参加舞蹈5。跟在乐

队后面的是兴高采烈的得胜的军队。军队后面是使市民们凝神屏息，钦羨异常的活战利品和战俘的行列。他们渐次通过城区，到达皇宫，停在太庙门前。这时，乐工下马，在神殿外面列队等待皇帝完成向已经去世的诸王的神灵的奉献、谢恩的神圣仪式。然后，乐队再次开始演奏，得胜的将军及其僚属来到皇帝等待他们的大殿前。在这里，他们将重新正式接受颂歌的赞美。最后被带进来的是那些垂头丧气的俘虏，他们是作为对于造反者、冥顽不化者以及胡人的儆戒而被展示出来的。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人们知道，如果效法这些俘虏，将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⁶。当这些不幸的俘虏拖着脚步从御前走过之后，就开始对立功军队的主要将领论功行赏，而且立功者还可能会受到盛大的宴会招待⁷。

第二章 人战俘（2）（图）

张议潮出行图（局部） 佚名 晚唐 甘肃敦煌莫高窟156窟南壁

唐朝中期，河西地区一度被吐蕃奴隶主所占据，后张议潮率众起义，推翻了吐蕃统治，唐王朝因此敕封张议潮为河西十一州归义军节度使。出行图长达8米，人马百余，场面宏大，手法写实，是歌颂现实人物的历史长卷。这是出行队伍的前导部分，开路者敲大鼓、吹长角，军校侍从乘马列对随于后，旌旗飘扬，长矛高竖。随军乐舞载歌载舞，舞姿优美并富有行进的节奏和旋律。这是一幅敦煌壁画中前所未有的历史人物画卷，具有珍贵的资料价值。当伟大的唐太宗去世之后，他的继承人唐高宗为了庆祝俘获西突厥叶护阿史那贺鲁的胜利，在凯旋盛典中采用了一种新的仪式。他首先将西突厥王室的俘虏敬献给昭陵(位于长安东北的太宗的陵墓)的太宗之灵，然后再根据惯常的礼仪，在太庙举行献俘仪式，并在太庙前大会文武百僚、夷狄君长⁸。这种新奇的做法也许是对古代习俗的恢复，但是当时对恢复这种习俗的认识却是很模糊的。这种古代习俗就是将被击败的国王作为祭品杀戮，以用来祭祀皇室的亡灵。高宗献俘昭陵的举动，为将来开创了先河⁹。但是在首开先例的昭陵献俘仪式中，阿史那贺鲁却被高宗宽宏大量地赦免一死。将贵族俘囚献给祖先的做法出于一种虔敬的动机，而传统的政治信念又促使这种动机进一步得到了加强。我们说的政治信念，是指那种认为异族酋领理所当然地应该是唐朝的封臣的信念。在进行反对唐朝皇帝的战争中，这些异族酋领实际上就是在领导叛乱，反对他们的合法的君主，所以这种异族酋领完全应该受到死刑的惩罚。塔什干¹⁰王的罪行和他的命运就是如此。他是在天宝十载(750)被为唐朝效力的高仙芝将军俘虏的¹¹。但是这种凄惨的结局似乎并不是被唐朝将领俘虏的大多数异族首领

命中注定的选择。最明显的例子是西突厥首领都曼。显庆五年(660)，大将军苏定方俘虏了都曼，并将他带回了东都。但是由于苏定方本人为都曼进行了申辩，结果都曼得了赦宥¹²。有时，贵族囚徒还有幸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殊荣。例如龟兹王的遭际就是如此。贞观三年(649)，龟兹王被唐朝军队俘虏，送回了京城。在将他献给已死的诸皇帝的亡灵之后，他就得以获释，而且被授予了左武卫大将军的官衔¹³。对于有些被俘的王室俘囚，唐朝政府甚至在他们死后还赠予他们谥号——即使这种谥号的含义是模糊不清的——我们说它模糊不清，是与那些有名的战马得到的荣耀比较而言的，而这些战马的名气则是由作为马主的皇帝本人的经历决定的。例如，王玄策(他是一位雄心勃勃，精明强干的使臣)出使天竺时，为了对中天竺国冒犯唐朝声威的行为进行报复，召集了一支混杂着吐蕃人和泥婆罗人的军队，掠夺了壮美的摩揭陀城，并且俘虏了两千名男女战俘和大批牛马¹⁴。在这批俘虏中，就有摩揭陀的“反”王，他在贞观廿二年(688)被解送到了唐朝。两年以后，当唐太宗(王玄策就是他派出的使臣)去世时，这位反抗过唐朝的天竺人的形象被刻在了石头上，列于太宗昭陵之前¹⁵。这样一来，这位天竺国王就得到了永恒的名声——但只是作为战利品和唐朝征服的象征。

第二章 人战俘（3）（图）

三彩天王俑 唐代 明器 高52、53.5厘米 1955年陕西省西安市韩森寨出土

天王俑亦称镇墓俑，所谓镇墓俑，包括镇墓兽、天王俑和武士俑，是唐代陶质明器中的重要门类。天王俑一般成对随葬，多置于墓门两侧，有镇恶驱邪的作用。这种葬俗始于公元6世纪，最初是一对武士俑，到唐代，受佛教护法神形象的影响，武士俑为天王俑所替代。佛塑天王像趋于写实，而随葬天王俑则夸张可怖。这两件天王俑脚下的小鬼面目狰狞，呻吟挣扎，表现了天王俑的威慑力量。然而就一般俘虏而言，等待他们的通常只有死亡或者是当奴隶这两条道路¹⁶。白居易在宪宗元和四年(809)写的《缚戎人》诗中，描写了这些俘虏的遭遇。阿瑟·韦利的译文如下¹⁷： 缚戎人，缚戎人，耳穿面破驱入秦。天子矜怜不肯杀，诏徙东南吴与越。 黄衣小吏录姓名.....¹⁸ 在战俘中，有些人被分配给了文武官吏，成了个人的奴隶，而大多数战俘则成了“国家奴隶”，被迫从事国家统治者给他们分配的任何工作¹⁹。在一定的条件下，俘囚也有可能通过特赦法令而获得自由，如内战时俘获的汉人俘虏就有获得这种机会的可能。魏武定三年(545)“齐献武王请邳山之俘，释其桎梏，配以人间寡妇”²⁰(这件事虽然不是发生在唐代，但

是距离唐代并不远)。可是并不是所有的战俘都有资格获得这种自由，比如像蛮夷俘虏就不可能指望得到这种幸运的结果。不管俘囚从事的劳役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种族出身可能会决定落难囚徒一生的工作种类。来自蒙古草原和中亚的俘虏，通常都从事牧马人、马夫以及贵族车仗的骑马侍从等职业。智慧和教育会使国家奴隶在重要的工业部门得到一个职务，这些职务可能是在纺织行业，也可能在陶瓷业；如果更好些的话，也可能在皇宫中获得一个受到信任的职务²¹，这类职务可能是侍卫²²、译师、或者是舞师。对于没为奴婢的俘囚而言，最倒霉的就是被送往南方的边疆地区去服役。这些地区不仅有暑热瘴气，而且有鳄鱼出没，更有甚者，这里的居民还将敌人的头颅割下来作为战利品。白居易笔下描述的突厥战俘的遭遇就是如此，大中五年(851)被解送到岭南的吐蕃和回鹘战俘的境况也同样如此²³。

第二章 人战俘（4）（图）

女侍 唐景云元年 壁画 高213厘米 陕西省咸阳市万泉县主薛氏墓甬道西壁

女侍手捧一物，作进献状，但脸部表情的冷峻却表露出内心的抑郁，线条简洁流畅，意蕴颇为独特。九世纪时，唐朝政府一反常态，对间谍活动感到惊恐不安，他们深信，这些湿热瘴疠的边疆地区是最适合安置那些被俘的高山地区居民和北方土著人的地方。而在七世纪时，唐朝政权对于其自身的权势和武力的自信程度是很强的，这时的俘囚要获得自由也就容易得多。然而就异族奴隶而言，不管是士大夫的私人奴隶，还是属于政府的国家奴隶，他们所能期待的最好的出路，就是依靠才能和计谋获得权力和财富。有些具备军事才能的家内奴隶也确实成了朝廷里的重要人物。王毛仲就是这样一位人物。王毛仲其人本来是一个因事没为官奴的高丽人的儿子，他曾经在唐朝政权中被提拔到了很高的位置，只是由于野心太大，最后才使他一败涂地²⁴。但是，除了幸运地被分配到出身高贵、功勋卓著的大臣之家之外，战俘们通常只能成为与个人无关的国家奴隶。在集权统治下，这也是那些被宣布犯有叛逆罪者的家庭的命运。俘囚与叛逆者的亲属的遭遇是相同的，他们被迫从事收集石料的工作，这些石料是为了修建保卫国家的城墙和保护农田的堤防使用的。这种劳役一直要持续到他们获得自由为止。朝廷的特殊恩典，或者是一般的大赦，都可能会使他们得到自由²⁵。

第二章 人奴隶（1）（图）

劳作女泥俑群 唐代 高97—16厘米 1972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地201号墓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这组劳动女俑，即家庭奴隶，共四人，梳高髻，涂腮红，身着朴素的襦衫长裙。她们正低首进行辛勤的劳作，分别在簸粮、舂捣、推磨和擀面烙饼。擀面女子身旁还放着一饼鏊，上烙大饼，极富生活气息。随葬俑以劳动为题材的比较少见，这组作品因此尤显珍贵。汉奴主知仓库，胡奴检校牛羊。斤脚奴装鞍接蹬，强壮奴使力耕荒。孝顺[奴]盘鸡炙旌，谄韶奴点醋行姜；端正奴拍箜篌送酒，丑掘奴添酥酪浆；细腰奴唱歌作舞，矬短擎炬子食床。这首诗歌反映了一位野心勃勃的新郎的梦想，他渴望富家之主的显赫与奢华的生活。这首诗的英文译文是阿瑟·韦利根据敦煌写本翻译的²⁶。家庭奴隶从事各种各样的家务劳动，从夫人的婢女干的活计，到猎场看守人的工作都属于家庭奴隶的劳动范围²⁷。在唐朝后期，无力还债的债务人和佃户成了家内奴隶的一个新的、重要的来源。这些人在规定的时间内，甚至是终其一生，将他们本人或者是子女出卖给地主或其他债权人²⁸。但是典型的唐朝奴隶是异族奴隶，商人们通过出卖异族奴隶，将钱全部装进了自己的钱袋。元稹是一位在道德方面正统而严谨的人，外来物品在他的眼中永远都是稀奇古怪的东西。元稹在一首长诗中描写了一位商人的形象。他笔下的这位商人是个行商，他精疲力竭地追逐利润，逐利的欲望使他的心境无法得到安宁，贪婪驱使他在世上到处游荡，如果有利可图的话，他会随时准备出卖任何东西——无论是活的还是死的：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鹰。炎州布火炕，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奚童眉眼明²⁹。狡黠的奴隶贸易者尽量不去买卖唐朝境内土生土长的汉人。法律保护古代习俗，使贩卖汉人变成了一件非常担风险的事情。如果商人诱拐了奴隶，则犯罪的商人多半会被处死。但是当被生活所迫时，一家之长却可以出卖自己家中的妻小，在当时的社会里，家长的意志就是被出卖的家庭成员的意志³⁰。可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经营异族奴隶的买卖却是相当保险的，而且买卖异族奴隶还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异族奴隶并不完全是人³¹。所以，只要当时没有赦免异族奴隶的法令的话，不管他属于哪个种族，异族奴隶都是很畅销的。奴隶商人的货物可以是波斯人——例如被大海盗冯若芳连同其他战利品一起掳掠来的，安置在海南岛万安州附近的波斯人³²；他们也可能是突厥人——这些突厥人不是战俘，而是由萨曼王朝作为商品从河中地区出口的突厥奴隶³³；奴隶商人的经营对象，可能还有那些性情平和的牧人和他们的子女，这些人是被诱拐来，送入唐朝境内的——在盛唐时期，唐朝与难以管制的游牧人和睦

相处，所以这种做法在当时是被禁止的³⁴；他们甚至有可能是由发现了远东的道路的花刺子模人输出的斯拉夫奴隶³⁵；这些奴隶也可能是高丽奴隶，尤其可能是高丽女奴——在唐朝的富豪之家，大多都非常希望能够得到高丽、新罗国的少女作为贴身女婢、姬妾和演艺者³⁶。高丽、新罗的奴隶贸易养活了一大批黄海水域的海盗，同时也引起了朝鲜半岛政权的反对。武后长寿元年(692)，山东地区的唐朝地方官员奏请朝廷，指出这种违法的贸易妨碍了唐朝与新罗国的友好关系(山东是新罗奴隶船靠岸的地方)，“伏乞特降明敕起今以后，缘海诸道应有上件贼炫卖新罗良人等，一切禁断。敕旨宜依”³⁷。但是在有些地方，肯定还有买卖新罗奴隶的迹象。虽然畜买新罗女奴有时也会受到一些思想保守的人的猛烈抨击，但是新罗、高丽少女的娇艳美丽在当时确实是非常有名的。例如在贞观廿年(646)，高丽派遣使臣前来唐朝致谢，感谢唐太宗在前一年赦免了被包围的辽东城里的居民。这位使臣带来了两名美女作为谢礼。但是唐太宗对高丽使臣说：归谓尔主，美色者，人之所重。尔之所献，信为美丽。悯其离父母兄弟于本国，留其身而忘其亲，爱其色而伤其心，朕不取也。就这样，唐太宗又将她们送回了故土³⁸。

第二章 人奴隶（2）（图）

面具（日）正仓院藏

这个斜眼的面具是在一种名为假面音乐舞蹈剧的表演中由演出者佩戴的，代表一个从热带地区来到中国南方的奴隶，这种遍布中国乃至朝鲜的传统也在8世纪时出现在日本。在唐朝宫廷举行的戴有此面具的演出，表现的是一个奴隶对一位贵族妇女的热爱。其他假面音乐舞蹈剧的面具绘有怒吼的雄狮与火鸟、自负的印度僧人与醉酒的波斯国王。但是非汉族奴隶的最重要的来源是唐朝南方的各部族——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僚人和那些新近归附唐朝的，福建、广东、广西、贵州等地的其他一些土著居民。奴隶贸易者毫不怜悯地对这些不幸的“蛮人大加掠卖，与此同时，皇帝也一道道地发布诏令，对这种罪行加以谴责和禁止，但是这些诏令显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³⁹。最典型的是在八世纪末年唐德宗发布的一道诏令。这道诏令表明，一直到了这时，仍然在从遥远的邕府(位于现在的安南边界附近)将年轻的奴隶作为年贡送往朝廷，诏令中指出：“……使其离父母之乡，绝骨肉之恋，非仁也，罢之。”⁴⁰这道诏令的颁布可能结束了由官府主持的进贡土著人奴隶的活动，但是私人买卖奴隶的活动却并没有终止。九世纪中叶，唐宣宗发布了一道禁止岭南货卖男女的诏令，宣宗称“如闻岭外诸州居人，与夷僚同俗，火耕水耨，

昼乏暮饥。迫于征税，则货卖男女，奸人乘之，倍讨其利”，这道诏令中还指出，买卖奴隶的结果“.....遂使居人男女与犀象杂物，俱为货财”⁴¹。有许多迹象表明，正如同在高丽人中一样，在南方土著居民中，奴隶贩子寻求的主要猎物也是年轻的女奴。元和十三年(817)，当著名的广州都督孔癸戈在任时，他最先发布的法令之一，就是禁绝从本地村庄里买来的女口⁴²。当时的诗人张籍曾经用这样的词句描写了一位女奴：铜柱南边毒草春，行人几时到金麟？玉环穿耳谁家女，自抱琵琶迎海神⁴³。唐朝奴隶的另外一个重要来源是恒河流域印度以外的地区的奴隶。从印度群岛输入的奴隶被称做“昆仑奴”，所谓昆仑奴就是来自“KurungBnam(山帝)⁴⁴地面的奴隶，而“KurungBnam则是使用了柬埔寨国家的古名。这个字实际上相当于梵文的“ailarja”，它表示吉蔑人对神山的象征性的霸权，这与爪哇和苏门答腊的“ailendra”王表示的含义不无相似之处⁴⁵。

第二章 人奴隶（3）（图）

彩绘黑人舞俑 唐代 高25、宽7.5厘米 1985年咸阳市长武县郭村唐墓出土
长武县博物馆藏

俑为昆仑形象，卷发、黑肤、赤足、高鼻，双目圆睁，面带微笑。颈饰璎珞，手腕、脚踝戴舞环。桔红丝帛绕双肩缠至下腹及膝盖上部。据《旧唐书》记载“自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为昆仑”⁴⁶。其实这些奴隶就是最广义的“马来人”。就其“卷发”的特点而言，他们一般是指“维达人类型”的种族，但是也可以指吉蔑人和其他一些波状头发的种族，甚至还有可能是指达罗毗荼人以及其他一些印度洋民族。昆仑奴最使人称道的是他们的游泳技能，他们能够睁着眼睛潜入水下，从水底找回失物。有许多昆仑奴肯定是受过专门训练的潜水采珠人。八世纪和九世纪初年，伟大的佛教词典编纂者慧琳是这样描述昆仑奴的：时俗语便，亦称骨论(Kurung)，南海洲岛中人也。其黑裸形，能驯伏猛兽、犀象等。种类数般，即有僧(Znjī)、突弥(Turmi?)、骨堂(Kurdang?)、阁蔑(Khmer)等，皆鄙贱人也。国无礼仪，抄劫为活，爱啖食人，如罗刹、恶鬼之类也。言语不正，异于诸蕃。善入水，竟日不死⁴⁷。从这段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汉人——尤其是那些对黑皮肤(他们将波斯人也称做“黑人”!)和相对裸体(从汉代以来，就认为这是有伤风化的)持反对态度的汉人——的种族偏见的典型例证。在其他一些史料中，则将中国以南的所有国家都划归为“昆仑”，或者是将“昆仑”等同于梵文著作中的“Dvīp48ntara”。但是慧琳的意见似乎是将“昆

仑”这个字眼局限于那些尚未接受印度文化移入的“恩惠”的印度尼西亚人，也就是指还没有接受印度宗教的海岛居民。当唐朝大臣李德裕被流放到潮州时，在一次船只失事的故事中，他失去了自己珍贵的艺术收藏品，于是李德裕派遣“昆仑奴”潜水去寻找。这位潜水的蛮人最后没有能够找回失物。他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他不可信任，而是因为水中有许多鳄鱼出没⁴⁹。生长在沿海地区的印度人和生活在水上的马来人，都是唐代传奇故事中喜欢表现的主题。其中一则反映昆仑奴的故事是这样记载的⁵⁰：有一位足智多谋，四处漂泊的昆仑奴，他为自己的主人解释清楚了一个歌妓作出的含糊不清的手势，从而促成了年轻的男主人公与这位美貌的歌妓的一次幽会。这位奴隶后来从复仇心切的歌妓主人手中逃脱，以后人们发现他在洛阳市中卖药⁵¹。这段故事虽然在外表上蒙上了一层中国的色彩，但是听起来却非常象是一个印度或阿拉伯的故事。在唐朝后期以反映外来事物为主题的文学潮流中，这种特点是极有典型性的⁵²。非洲黑人奴隶只是在唐代的一个短暂的时期内，而且只是在少数显贵集团中知名。在马来群岛，相当普遍地将非洲黑人称做ng“Zī”，而汉人正是沿用了这个名字，将他们称做“僧耆”(Zenj)或“僧”(Janggi)⁵³。僧(或僧耆)是指最古代和最广义的“Zanzibar”(桑给巴尔)的土著人，这个名称的内涵并不限于现代的桑给巴尔，而是指相当于东非的广大地区，而东非地区则是趁着东北季风从波斯湾出发的船只可以到达的自然终点。广而言之，凡是非洲黑人都可以称做僧人。诃陵国是一个爪哇人的国家，据唐朝传说记载，诃陵国有“毒女”⁵⁴，凡与毒女交合者，都会致死。据记载，从元和八年(813)到元和十三年(818)，诃陵国三次遣使向宪宗朝贡献了少量的僧童、僧女以及生犀、五色鹦鹉等珍稀之物⁵⁵。史料中仅见的另外一次记载是尸利佛誓国——就梵文学问和佛教信仰而言，当时尸利佛誓是一个世界性的中心——在开元十二年(724)向唐朝“Deva-putra”⁵⁶贡献的一名僧耆女⁵⁷。这些体貌黝黑的僮、婢，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没有任何踪迹可寻，只是在史书中留下了一些简短的记载。对于八、九世纪时具有高度文化教养的唐朝宫廷而言，这些非洲黑奴仅仅是昙花一现的新奇之物。在欧洲人罗可可式艺术中，长久地保存着头戴缠头巾的矮小黑种人的生动、逼真的形象，但是却没有留下任何有关僧人的类似的形象资料⁵⁸。虽然一般都假定僧人来自非洲，可是他们最初究竟是从什么地方落入了诃陵国王的手中，现在还无法断定。据说在玄宗先天元年(712)，印度海盗曾经掠夺了一艘由锡兰统治者派往哈利夫的海船，从这艘船上得到了一批“阿比西尼亚奴隶”⁵⁹。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献给唐朝的黑奴最初很可能就是在印度洋沿岸买进的，然后他们又被带到了远至爪哇⁶⁰的地方⁶¹。在桑给巴尔和索马里沿海发现的唐朝钱币，或许就是由唐朝商人带去经营人口贸易

的⁶²。但是从爪哇和苏门答腊⁶³转输到唐朝的所有非洲黑人，可能同样都是在东南亚地区沦为奴隶的。甚至现在，在东南亚还有矮小黑人。在唐代，唐朝人知道有一个“葛葛僧国”的国家，这个国家是在苏门答腊西北角的一个岛上，这里的居民凶悍残暴，所以水手都非常害怕他们⁶⁴。靠近诃陵和尸利佛誓的这样一个地方，很可能就是被送往长安的黑人的故乡。

第二章 人侏儒（1）（图）

瓷侏儒俑 唐代 高18.2厘米 咸阳市渭城区底张镇龙枣村出土 咸阳市文物保护中心藏

如同对中世纪的其他民族曾有过强烈的吸引力一样，矮人也使唐朝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这里说的矮人，是指唐朝本土的侏儒和外来的俾格米人。但是，唐代追求侏儒的风气似乎并不比唐代之前中国诸朝代统治时期更明显。孔子本人在谈到一个叫做“焦侥”⁶⁵的矮小民族时，曾经将矮人的标准尺寸定为三尺，“焦侥这个名字也有“鸛鷖”的意思。虽然有人说矮人是在东南方海上的一座岛上发现的，但是根据传说，小矮人生活在位于中国西南的遥远的地方。古代的焦侥国曾经向中国贡献过象牙、水牛和封牛⁶⁶。据记载，焦侥国的矮人“穴居善游”⁶⁷。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断定在周、汉时代曾经见到过热带的俾格米人，但是，无论古代记载的矮人是矮小黑人，还是像现代的塞诺伊人那样的，长着波浪形头发的矮人，总之在周汉时代就已经有了侏儒，他们是演艺者、舞师和乐师。在唐朝皇帝的宫廷里，侏儒扮演的角色与前代相比并无不同。现代湖南省南部的道州城，在唐代就以大量出产土生的侏儒而著称。道州的侏儒每年都要作为土贡贡献给朝廷。九世纪时，白居易曾在诗中描写过道州的侏儒。阿瑟·韦利的译文如下⁶⁸：道州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余。市作矮奴年送进，号为道州任土贡。任土贡，宁若斯，不闻使人生别离……⁶⁹ 八世纪末年，道州刺史阳城哀怜道州人民生离之苦，自作主张停止了这种稀有的土贡。不久之后，就从京城来了一位使者，责问为什么规定的岁贡没有按时送到朝廷。阳城写了一份正式的奏折，宣称“州民尽短，若以贡，不知何者可贡。这种机智的答复可能比据实回答要高明得多。不管怎么说，道州岁贡侏儒就这样被正式废除了。于是“州民感之，以‘阳’名子”⁷⁰。

第二章 人侏儒（2）（图）

谱双 版画 明代 纵17、横13.5厘米 出自《欣赏编》本 辽宁省图书馆藏

《谱双》为游艺之作，此图为其中的“大食双陆毯”，写大食国人对弈的情景，古趣喜人。大食、真腊、于阗之人物写真，始见于此，弥足珍贵。对于过分讲究排场的唐朝人来说，从外国进口的侏儒，较之于唐朝本土出产的侏儒更使他们感到惊异，当然也就更能使他们感到满意。外国贡献的侏儒，使他们回想起了古代的“僬侥人。开元十二年(724)，占据着苏门答腊制海权的尸利佛誓国(即“bhoja”又称“rivijaya”在唐朝人和大食人中，它以“bhoja”知名)派遣某个俱摩罗——即Kumra，意思是“皇太子”，或许此人果真是一位皇太子⁷¹——来到长安，他为唐朝天子带来了许多珍奇的贡礼，这些贡礼主要是人，例如贡礼中有杂乐人一部、僧女一人(在上文中已经提到过)，此外还有侏儒二人⁷²。同一年，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的康国⁷³也向唐朝贡献了一位侏儒。距离康居很远的地方，有一个被称为“短人国”的侏儒种族，中国人从很早起就已经听说了这个国家⁷⁴。据说短人国地面盛产真珠和夜光明月珠。根据另一种传说记载，短人国的居住地在突厥以北的西伯利亚地区，那是一个“俗无寇盗”的地方，只有一种大鸟是短人的天敌，这种鸟“常伺短人而啄之，短人皆持弓矢，以为之备”⁷⁵。这些短人显然就是古代希腊人记载的侏儒，只是在这个故事的东方译本中，将短人国的位置说成了东欧或西伯利亚地区，而不是在非洲的腹地。在原始的西方传说中，往往都说侏儒国在非洲，而这一类的传说也流传到了中国人的耳中。史书中这样说：小人国在大秦(即罗马)之南，躯才三尺，其耕稼之时，惧鹤所食，大秦每卫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之⁷⁶。可是康国王贡献的侏儒并不是传说中虚构的短人国的人，而是有根有据，真实可信的侏儒。那么，这些侏儒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第二章 人人质（图）

仪卫图 唐代 壁画 人物高180—196厘米 1990年咸阳市礼泉县韦贵妃墓出土 昭陵博物馆藏

《仪卫图》反映了唐代社会宫廷及贵府院宅护卫队的生活实情，通过此图人们看到了盛唐时期的宫廷生活、府员阵容及服饰发型等。除了上文提到的奴隶之外，唐朝境内的异族人中有许多种族的人也是在违背个人意愿的情况下臣服唐朝的主人的。八世纪时被派遣来帮助郭子仪将军镇压安禄山叛乱的大食兵，就是这样一群身不由己的傀儡。他们与其他国家的那些完全只能听命于他人，被唐朝平民百姓当作稀罕物品

来观赏的人质们遭遇的情况是一样的。人质被留在唐朝京城之内，目的在于确保他们在境外的贵族和王室宗亲对待唐朝政权的友好态度。或许除了在社会地位方面的差异之外，人质的处境与那些留在唐朝境内的外国军人并无多少区别。虽然就中国人的传统而言，他们是反对人质制度的，但是国际政治的实际情况常常总是要求他们对这种传统弃置不顾。确实，促使唐朝人放弃人质制度的理由经常是出于对自身实际情况的考虑，而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动机。这些理由根源于畏惧异族的守旧思想：持有这种思想的人认为，留居在唐朝境内的异族人不是惹事生非者就是间谍⁷⁷。而在七世纪时，只要唐朝政府认为将外族王子留下来不失审慎的话，那么要求一位突厥王子或者是高丽王子留在长安的皇宫里完全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甚至连萨珊朝的王王子Narsē(泥涅师)⁷⁸也被当成了一名受到尊敬的人质。当然就泥涅师而言，他很可能是一位自愿归顺的质子，因为他是在父亲卑路斯死于逃亡途中以后来到唐朝的⁷⁹。尽管唐朝政府为人质颁赐了只有名义，却毫无实际价值的官服，还为他们提供了诱人的奢侈生活，但是事实表明，这种强制性居留的时间漫长得简直使人质无法忍受。为了抚慰那些出身高贵的男性人质，唐朝政府在宫廷里授予他们一些名义上的职务——一般来说都是委任为宫廷侍卫——而这些人质就这样舒服地消磨着背井离乡的生活。毫无疑问，这些穿着色彩鲜艳的唐朝服装的外国王室后裔，看上去一定丰神俊伟，仪表堂堂⁸⁰。一直到唐玄宗在位的和平时期，唐朝政权才下令将那些在皇宫里居住了几十年之久，领取国家俸禄的质子送回其本国⁸¹。就表面而言，这些留居在唐朝境内的人质的境况是相当风光体面的，但是在这些人质所在的国家里，对人质的看法却大相径庭。根据他们国内的看法，充当人质是一种屈辱和奴役，“高贵的突厥男儿成了唐人的奴隶，清白的少女成了奴婢”⁸²。

第二章 人贡人

所谓“贡人”，就是作为贡品献给唐朝皇室的礼物，或者是如唐人解释的，是作为“土贡”送往唐朝宫廷的男子和妇女。因为这些人是要提供特别服务的，所以就人身自由而言，他们甚至比不上人质。而且我们也几乎无法将他们与奴隶区别开来。据认为，任何不同寻常的人都适合于充当“土贡”的角色，自古以来，中国各地的城邑就已经习惯于将各种各样古怪的或者是畸形的物品送往朝廷，而这些畸形的怪物很可能就是人。在这方面，相当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八世纪初期，由西北一座城镇中送来的一位妇女，非常奇怪的是，她的“身上隐起浮图塔庙，诸佛形象”⁸³。同样使人惊异的是扶南贡献的两位肤理如脂，岩居穴处，患

有白化病的“白头人”⁸⁴。漫长的距离和罕见的外貌，给这些来自边荒绝域的人赋予了神秘的色彩，而他们自身也就完全成了奇珍异物。长庆二年(822)由一位回鹘人从巴尔喀什湖地区送来的“葛禄口四人”⁸⁵，咸亨元年(669)由一位日本使臣带来的长胡须的虾夷人⁸⁶，作为贡礼的突厥女人⁸⁷，或者是作为庆贺延庆节的特定纪念品而送来的两位吐蕃女⁸⁸，所有这些见于记载的“贡人”都属于此例。在所有作为土贡进献的人当中，最珍贵的贡礼是来自远国绝域的博学多艺的人，惟其来自外国，他们那超凡入圣的洞察力也就更为可信。开元七年(719)由吐火罗国王推荐并贡献给唐朝的“大慕”就是这样一个例证。大慕是一位摩尼教徒，据记载，他“智慧幽深”，善解“天文”⁸⁹。另外一个例子是“和药方士”那罗迺娑婆寐⁹⁰，这位方士是在贞观廿三年(648)由王玄策从摩揭陀带来的⁹⁰。他自称已经活了二百多岁，能够配制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这位智者向唐朝的朝臣讲了一通诡谲的谎话。据他说，只有在印度深山里的一种石臼内，才能够找到一种药性十分强烈的神奇药水，能够融化肌肉、草木和金铁等物。这种药水只能盛放在骆驼的骷髅之内，然后再转而注入葫芦里。凡是有这种药水的地方，都有石像人守护，如果住在山里人将药水的事泄露给了陌生人的话，泄密的人就会死去。这位信口开河的老人得到了唐朝皇帝的隆重礼遇，“太宗深加礼敬，馆之于金甍门内，造延年之药。使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不可称数”⁹¹。似乎是由于他的努力遭到了失败，那罗迺娑婆寐的权势逐渐下降，最终被解除了为宫廷服务的工作。那罗迺娑婆寐在长安度过了他的余生，他无疑得到了大批追随者的支持⁹²。另一位与他类似的奇迹创造者是来自西国的胡僧。据称这位胡僧能够利用咒术起死回生。唐太宗在飞骑中挑选了“志愿者”来试验他自称的这种法力。胡僧果真用咒语使他们死去，然后又使用同样的方法使他们复活过来。故事中告诉我们，有一位德行出众的大臣告诉皇帝，这是一种邪法，而“邪”终究是不能犯“正”(当然是指这位大臣本人)的。结果当胡僧对这位大臣施行咒术时，自己却倒在了地上，呜呼哀哉，“不复苏矣”⁹³。这位不幸的炫奇耀能的胡僧显然是一位技艺娴熟的催眠大师，而他的死因则肯定是在流传过程中被歪曲(和加工过)了。

第二章 人乐人和舞伎（1）（图）

宫乐图 佚名 绢本 设色 纵48.7、横69.5厘米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中绘体态丰肥、着华丽衣饰的十名仕女围长案而坐，或作乐，或谛听，或啜饮，或顾盼，气氛闲适。中央四人，则负责吹乐助兴。所持

用的乐器，自右而左，分别为箏、琵琶、古筝与笙。旁立的二名侍女中，还有一人轻敲牙板，为她们打着节拍。从每个人脸上陶醉的表情来推想，席间的乐声应十分优美，因为连蜷在桌底下的小狗都未被惊扰到。这件作品并没有画家的款印，原本的签题标为《元人宫乐图》。仔细观察画中人物的发式，有的发髻梳向一侧，是为“坠马髻”，有的把发髻向两边梳开，在耳朵旁束成球形的“垂髻”，有的则头戴“花冠”，凡此，都符合唐代女性的装束。另外，绷竹席的长方案、腰子状的月牙几子、饮酒用的羽觞，还有琵琶横持，并以手持拨子的方式来弹奏等，亦在在与晚唐的时尚相侔。所以，现在画名已改定成《唐人宫乐图》。

我们已经讲了各种各样的流落到唐朝的异族人，但是在所有那些由异族政权贡献给唐朝的，社会地位不易确定而又具有专门技能的人当中，最常见和最有影响的是乐人(包括器乐演奏者、歌唱者和舞蹈者)以及由他们带来的乐器与乐调。当我们看到历史文献中记载大中七年(853)日本国来朝贡献“音乐”时⁹⁴，我们就应该认识到，“音乐”这个词在这里必定包括了曲式、乐曲以及演奏者和他们使用的乐器等内容在内。曲式和乐曲在当时被看作是一种与真正的财产一样，可以转让的东西。许多世纪以来，欣赏西域音乐的人在中国各朝代都大有人在。在隋代，欣赏西域音乐的社会风气尤其盛行一时，而这种风气也一直延续到了唐代。在唐代，西域诸国处于唐朝政权的控制之下，所以西域音乐也可以说是被唐朝“俘获”来的，而到了后来，唐朝政府便要求西域诸国将音乐作为“土贡”贡献给朝廷。在唐朝的宫廷演奏者当中，大量地吸收了异族的管弦乐队，在“非正式的”宫廷燕乐演奏的场合，往往都有异族管弦乐队为唐朝的大臣和藩属演奏。相比较而言，在“正式的”仪式上，则要求用中国古代传统的乐器，特别是要求用钟、磬、琴等古典乐器来演奏传统的曲调⁹⁵。

第二章 人乐人和舞伎（2）（图）

舞乐图（之一）佚名 唐代 屏 绢本 设色 纵51.5、横25厘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1972年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张礼臣（655—702）墓。随葬屏风画共六幅，分别绘四乐伎、二舞伎，这是其中的一幅。图中舞伎发挽高髻，额描雉形花钿，红裙曳地，足穿重台履。左手上屈轻拈披帛，可看出挥帛而舞的姿态。右手残损。人物形象清俊，身材修长。线条流畅，笔法细腻，设色鲜丽浓艳。人物面部运用了晕染技法，表现出娇嫩的肤色。这是目前我国最早有确切年代、在绢上描绘妇女生活的作

品。欣赏外来音乐的习惯以及在当时的社会时尚中表现出来的对外来音乐的热情，从宫廷传到了贵族之中，接着又蔓延到了城市居民的各个阶层之中：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⁹⁶。诗人讽刺性的比喻描述，并没有能够逆转社会上的摩登潮流。设在长安的两个官方的“教坊”，是在普通人民中间传播这种“上流社会”音乐风气的主要机构。唐朝的教坊类似于现代京都的“Gion”和“Pantochō”坊。一个教坊专门从事歌唱，而另一个教坊则从事舞蹈⁹⁷。教坊里的那些天才的乐工、歌伎以及舞伎的社会地位与“官伎”⁹⁸——即最高贵的一种艺伎——的社会地位很相似，她们被训练来演唱非正式的音乐，而这种音乐只是供那些得到“天子”宠信的人享乐的。新音乐首先从教坊的乐人那里传播到那些具有独立人格的高级妓女当中，再由此传入下层娼妓中，最后通过市井放荡浮华少年的途径，融进唐朝文化的伟大洪流之中。这些从事演唱流行音乐的美女们潜心钻研最新的曲调，为原来受到欢迎的曲调填写轻快明艳的歌词。像“放鹰乐”、“泛龙舟”、“破南蛮”、“绿头鸭”以及其他一些流行的曲调，都是属于她们演唱的乐曲。她们演唱的乐曲在朝野上下备受赞赏——除了朝廷提倡谨言慎行、克勤克俭的时期之外。例如当皇帝表示他决心要限制宫廷范围内的奢侈行为，发布诏令禁止聚敛珍宝，限制穿着华丽的饰带，反对上演女乐时⁹⁹，她们就成了被轻蔑的对象。不过这种时期何时到来虽然无法逆料，但它持续的时间一般都很短暂。可是当唐朝政权不是过分拘谨的时候，就会鼓励这些歌伎演唱诸如“突厥三台”、“南天竺”、“龟兹乐”以及“望月婆罗门”这样的曲调¹⁰⁰。这些歌曲大多数都是在异族人的影响之下，特别是在那些充当“土贡”的异族乐人演奏的乐曲的启迪下创作出来的。为了不致过分地违逆大众的观赏情绪，创作者对这些曲调进行了适当的修改。我们完全可以想见，正如现代的“印度之歌”、“恒河流过的地方”、“异教徒恋歌”一样，唐朝类似的这种歌曲，也是一些假冒的外来歌曲。

第二章 人乐人和舞伎（3）（图）

乐舞 佚名 初唐 甘肃敦煌莫高窟220窟北壁

图中乐队之庞大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乐队由13人组成，其中一人耍盘唱，其余则演奏箏、箫、竖笛、篳篥、阮咸、横笛、腰鼓、都云鼓、毛圆鼓等。这些丰富精湛的乐舞正是唐乐唐舞高度发达的生动写照。这种带有外来的“内容”和“风格”的音乐，对于唐朝人来说并不是非常熟悉，也正是这种音乐，构成了七世纪音乐的一个显著的特点¹⁰¹。到了八世纪时，这种冒牌的音乐就被货真价实的外来音乐取代

了。从八世纪开始，唐朝的流行音乐听起来与中亚城廓国家的音乐简直就没有多少区别了。著名的“霓裳羽衣曲”总是使我们联想起唐玄宗——玄宗是一位音乐爱好者，据说在他的宫廷里有三万名乐工——但是实际上这首曲子不过是西域的“婆罗门曲”的改写本。龟兹、高昌、疏勒、安国¹⁰²、康国、天竺以及高丽等地的音乐风格，就这样在唐朝官方的保护之下，与传统音乐融合成了一体。九世纪时，在宫廷之内又开始再度强调庄重肃穆的古典音乐¹⁰³，这样一来就割断了外来影响的潮流。虽然一些印度支那的音乐，特别是骠国和南诏的音乐被带进了唐朝，但是它们似乎并没有对唐朝音乐产生多少影响¹⁰⁴。

第二章 人乐人和舞伎（4）（图）

日本宫廷舞蹈

在一次宫廷庆典中，舞者在靠近天皇房间（右侧）的台子上，和着两群伴奏者的音乐翩翩起舞。左下角是一些弹琵琶、吹笛子、打击着鼓磬的男人们，还有一群被隔断在屏帷后面一间独立房间中在弹奏琵琶、弦琴和编钟等乐器的女人们（上左），而两个舞女在一旁休息。在所有西域音乐文化中，龟兹音乐对唐朝音乐的影响最大，远远超出了其他音乐。尤其是龟兹乐中的“鼓舞曲”，更是唐朝雅俗共赏的一种乐曲¹⁰⁵。龟兹乐工演奏的乐器也备受唐朝人的赞赏。龟兹乐器中最重要的一种是龟兹四弦曲项琵琶，唐代流行音乐的二十八调就是建立在四弦曲项琵琶的技法和曲式的基础上的，而且二十八调的旋律也是由此而发展起来¹⁰⁶。箏篥与横笛在龟兹乐器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所以这两种乐器在唐朝也很流行¹⁰⁷。但是在所有的龟兹乐器中，唐朝人最喜欢的是一种形制很小，涂了漆的“羯鼓”¹⁰⁸。当演奏羯鼓时，不仅可以听到羯鼓敲击出的铿锵激奋的音乐，而且能够欣赏到伴着羯鼓的乐声歌唱的外国歌曲——可是这些梵文歌曲的发音大多数都是错误的¹⁰⁹。就像其他的达官显贵一样，伟大的唐玄宗本人就是一位演奏羯鼓的大行家¹¹⁰。在唐代音乐中，最有名的是混杂了各种成分的“西凉乐”。西凉是一座边疆城镇的名称，在唐代，这里其实是叫“凉州”。西凉乐是龟兹乐与传统中国音乐的奇妙的混合物。它是用龟兹琵琶和古典的石磬这样一些极不谐调的乐器来进行演奏的。八世纪和九世纪之后的诗人们都对西凉乐赞叹不已¹¹¹。唐朝北方邻人的音乐听起来使人感到“苍凉”而“粗旷”，北方音乐对唐朝音乐的影响几乎全都局限在军乐方面。北方的这些“鼓吹”乐¹¹²是用大角、鼓、钹等乐器来演奏的，用鼓演奏的音乐激越动人，这种音乐最适合在宫廷庆典、正式的凯旋仪式以及其

他一些具有爱国主义气氛的场合演奏¹¹³。起源于印度的音乐传入中国的途径有多种，除了中亚以外，还有印度支那诸国即林邑、扶南、骠国等。这些国家也将它们的管弦乐以及舞伎等贡献给了唐朝。印度支那乐工演奏的曲目大多数主要都是来源于佛教经典，如“佛印”、“斗羊胜”和“孔雀王”等曲目都属于此例¹¹⁴。

第二章 人乐人和舞伎（5）（图）

乐舞图（之一、二）佚名 唐代壁画 纵分别为142、148厘米，横分别为141、137厘米 陕西省西安市苏思晟墓

苏思晟壁画墓，在西安市东郊经五路，成于唐天宝四年（745）。墓内壁画有“四神”、男侍、侍女、“胡腾舞图”等。这两幅来自“胡腾舞图”，为舞者两侧的乐队。右图为右侧五人，前排三人跏趺坐，分持竖笛、七弦琴和箜篌，后排二立者，一吹排箫，一为乐队指挥；左图为左侧六人，前排三人分持琵琶、笙和钹，后排三人，一指挥，一横笛，一击拍板。人物形象写实生动，神情刻画入微，线条奔放流动，是一幅盛唐风俗画的精品。虽然这些深受唐朝人喜欢的音乐现在已经在亚洲大陆上绝迹了，但是其中有些乐舞却仍然藉改变了的和业已僵化的舞蹈形式，在日本的宫廷里残留了下来。二十世纪日本宫廷的乐工和舞伎以及日本的古典音乐爱好者们，都能表演这些乐舞¹¹⁵。日本宫廷中残存下来的，在唐乐中伴奏的这些管弦乐器，与唐朝的管弦乐器肯定是非常接近的。它们由三组乐器构成：第一组是木管乐器，其中包括横笛、笙、篳篥以及“口琴”等，这种乐器用来表现高音区的旋律，而且它还可以利用和音来增强演奏效果；第二组是打击乐器，包括钹，放在鼓架上的小“羯鼓”，还有悬挂在一个顶部金黄灿灿的朱红色的框架中的“大鼓”；第三组是低音弦乐，即箏¹¹⁶与琵琶。这些管弦乐器演奏的乐曲可以分成明显不同的几个部分，通常包括一个自由舒缓的前奏，前奏根据“口琴”定出的音调来确定乐曲的调式，然后是一个展开部和急骤的尾声¹¹⁷。在十九世纪的日本分谱中，保留了一出叫做“迦陵频伽”¹¹⁸的唐朝乐舞，这首乐舞仍在继续上演。迦陵频伽是佛教天界的一种神鸟的名字，据说这首乐曲是由一位天使泄露给人类的。迦陵频伽最初创作于印度，后来可能是通过林邑的途径传到了中国¹¹⁹，最后再又流传到了日本。九世纪时，迦陵频伽在日本相当流行¹²⁰。懿宗咸通二年(861)，甚至在日本奈良东大寺为毗卢遮那大佛的头像举行开光仪式时，也进行了迦陵频伽乐舞的表演。当时是由一位移居国外的汉人舞师表演舞蹈，由横笛乐师演奏林邑风格的新音乐¹²¹。日本的迦陵频伽舞是由四位身著

双翼，头戴花冠的男僮表演的。表演者敲击小铙钹，模仿迦陵频伽鸟颤动而美妙的鸣叫声¹²²。另外一首当时仍然在日本表演的唐朝乐舞叫做“拔头”¹²³。这首舞蹈表现了一位身穿素衣，披头散发的年轻人，在寻找吞噬了自己父亲的野兽。与迦陵频伽一样，拔头舞也是通过唐朝传到日本的，但它与迦陵频伽一样，最初也起源于印度的乐舞¹²⁴。通过唐朝传到日本的乐舞还有“醉胡乐”、“破阵乐”和“打乐”等。醉胡乐表现了一位喝醉酒的胡人酋长的形象。破阵乐表现面目狰狞的湿婆神的一事迹，而打乐则反映了波罗球游戏的场面¹²⁵。但是在所有的原封不动地从唐朝传入日本的乐舞中，最新颖，最有趣的还是“泼胡乞寒戏”。这是在冬至时表演的一种舞蹈，表演者是一大群赤身裸体的胡人和汉人青年，他们戴着稀奇古怪的面具，在鼓、琵琶、箜篌的喧闹声中跳跃舞蹈，用冷水互相泼洒，而且也向过往行人的身上泼水。对于生活在道德礼仪之邦的唐朝市民而言，这种粗俗的表演确实是一种有伤风雅的事情。所以在开元元年十二月(714年初)，唐玄宗宣布敕令，禁断泼胡乞寒戏¹²⁶。

第二章 人乐人和舞伎（6）（图）

舞女俑 唐代 高31厘米 1973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舞女俑的头部为泥塑彩绘，身躯以木柱支撑，胳膊用纸捻制成。舞女头梳高髻，点朱唇，描花钿，涂红双颊；上身穿红黄间隔的竖条曳地长裙，与西安唐执史奉节墓壁画上红衣舞女所穿的曳地长裙相似；肩上垂下一条绿色白花罗披帛。舞女呈侍立恭候状，含羞待上场。可以想像一旦上场施展才华，必定像白居易描述的那样：“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烟蛾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唐代乐舞盛行，官僚贵族往往养有训练有素的舞女，以供享乐。从外来音乐在唐朝招致的物议来看，唐朝人一般并不认为百戏、幻术的表演比这些音乐更低贱。幻人、走绳伎、柔软伎、吞火者以及侏儒伎等等，各种各样的艺人的表演都被称做“散乐”¹²⁷。许多散乐艺人都是从突厥斯坦和印度进入唐朝各地的城市中的¹²⁸。在凉州和洛阳等地的祆佛寺里，往往都有定期举行的幻术表演，其中有些显然是属于自残的表演¹²⁹。虽然唐朝官方大体上对幻术表演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而且像玄宗那样的皇帝甚至采取了鼓励的态度，但是这些来自异域的江湖骗子的表演有时也会遭到当权者的禁止。例如在唐高宗时，高宗曾命令将一位波罗门胡人发遣还乡。驱逐的理由是他“以剑刺

肚，以刀割舌，幻惑百姓，极非道理。”而且高宗还下令“仍约束边州，若仍有此色，并不须遣入朝”¹³⁰。虽然从古代起，在中国就已经能够见到羊皮纸影戏了，但是据认为，牵线木偶最初是在七世纪时从突厥斯坦带到长安的¹³¹。

第二章 人乐人和舞伎（7）（图）

黄釉乐舞图 瓷扁壶 北齐 容器 高20.5、口径5.1、足径10.1厘米 1971年河南省安阳市出土

这件扁圆形壶的两面，模印着一模一样的胡人乐舞图像。舞蹈者和伴奏者的形象、服饰表现的是典型的西域胡人，而表演的乐舞来自当时的“石国”（即今中亚塔什干地区），也就是后来盛行于唐代的“胡腾舞”。有一种观点认为，就唐朝本地人的资质而言，他们在音乐技能方面是无法胜过异族人的，这种看法无疑大大伤害了唐朝人的自尊心，但是唐朝人的确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学习新音乐的。异族音乐大师，尤其是来自河中地区和东突厥斯坦的大师，始终都受到唐朝人的欢迎。来自安国的乐人，来自康国的横笛演奏者，来自于阗的箏篥演奏者以及来自塔什干的舞妓或者是来自龟兹的歌曲作者等等，肯定都能够找到在远东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¹³²。然而根据一位作家写的一件佚事，太宗朝的一位宫女只听了一遍由一位著名的异族音乐大师演奏的乐曲之后，就完全准确无误地重新演奏了这首曲子——这种事情在当时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位狼狈的艺术家于是灰溜溜地离开了唐朝，“……西国闻之，降者数十国”¹³³。唐朝在文化方面的统治地位就是如此之强大。在演艺者中间，有许多人是被远国绝域的君主作为礼物送给唐朝君主的；属于这类的演艺者及其音乐，大都在唐朝的编年史中记载了下来。但是当时也有许多慕名而来的，自由的音乐家。后一类人及其音乐虽然没有能够像龟兹和康国的音乐那样，汇入唐朝官方的音乐之中，但是他们的音乐在唐朝民间社会里却十分流行。被唐朝史官忽略的，帕米尔山下的无名音乐家；或者是被唐朝称做“曹国的，劫布那的音乐家大多数都是琵琶演奏家，在留居唐朝境内的外来音乐家当中，来自劫布那的琵琶演奏家比其他所有的国家都要多得多¹³⁴。这些具有独立身份，四处漫游的艺术家，不属于我们在本节要讨论的对象，我们现在必须言归正题，讨论那些属于国王或者是平民的财产的外来音乐家。

第二章 人乐人和舞伎（8）（图）

反弹琵琶图 佚名 唐代壁画 尺寸不详 甘肃敦煌莫高窟112窟

此图见于莫高窟112窟的《伎乐图》，为该窟《西方净土变》的一部分。表现伎乐天神态悠闲雍容、落落大方，手持琵琶、半裸着上身伴随着仙乐翩翩起舞，天衣裙裾如游龙惊凤，摇曳生姿，项饰臂钏则在飞动中叮当作响，别饶清韵。突然，她一举足一顿地，一个出胯旋身使出了“反弹琵琶”的绝技——左手高举琵琶反背身后，右手转向背后弹拨，上身前倾右屈，右腿高提，左脚独立——于是，整个天国为之惊羡不已，时间也不再流逝。在实际的演奏中，这只是一瞬间的效果，作者极其准确地抓住了这一独特优美的造型，以高超精湛的技艺描绘出了这一精彩的舞姿，就像抢拍下了一幅精美绝伦的特写。特别是那着地的左脚、拇指跷起、正合着乐曲的旋律拍打着节拍，更显得妙趣横生。这幅“反弹琵琶”无论是从反映生活的角度，还是从绘画技法的角度，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引人注目的，是敦煌壁画中的代表杰作。

在这些具有特殊才能的奴隶当中，地位最低的是作为横笛135演奏者在贵族中备受宠爱的孩童。例如唐玄宗在其梨园弟子中蓄养的“胡雏”，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例证136：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137。

在音乐奴隶中，地位最高的是那些已经成年的音乐大师。无论是作为演奏家，还是作为指导者，他们都是受到人们欢迎的对象。至少就某些乐器而言，文人雅士要想学到这些乐器的演奏艺术的真髓，就必须以异族音乐家为师，认真地进行学习。据汉文史料记载，八世纪时，有一位很有才华的汉人，是个笛子138演奏家，一位听众对他的演奏技能很欣赏，但发现他演奏的音乐中杂有夷乐，于是就问他：“得无有龟兹之侣乎？”这位演奏家高兴地回答说“本师实龟兹人也139。”龟兹人白明达(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是奴隶还是自由人)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位演奏家140。白明达谱写过一首流行乐曲叫《春莺啭》，这首乐曲具有强烈的龟兹音乐的色彩，元稹在一首诗歌中曾对《春莺啭》大加称颂，这首曲子也流传到了日本141。

第二章 人乐人和舞伎（9）（图）

骆驼乐舞三彩俑

唐代明器骆驼头高58.4、首位长43.4厘米，舞俑高25.1厘米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鲜于庭海墓出土唐代，中亚有许多乐师、歌舞者留住长安城内，唐高祖曾拜中亚安国出生而长居长安的安叱奴为散骑常侍。曹国人曹保及其子善才、孙曹纲都是蜚声艺林的琵琶高手。宪宗开元时，康

国、史国均遣使献胡旋女子。南亚、东亚诸国中的骠国、扶南，以及日本也有很多乐工旅居住长安，带来了很多新的乐曲和乐器。在中国，那些作为乐师、舞伎、歌伎而受过专门训练的漂亮女子，自古以来就可以当做礼物相互馈赠——虽然“儒家的传统道德将她们看做是最轻浮，最堕落的礼物。在唐代，许多统治者仍然从他们下属的王公，特别是从突厥斯坦的印度化的政权那里接受这些女乐人。例如开元廿一年(733)骨咄王贡献的“女乐”就是如此。骨咄国地处阿姆河上游的山区之中，那里盛产良马、赤豹以及乌盐矿等物产¹⁴²。在来自中亚的演艺者中，唐朝人最喜欢的是年轻的男童和女童。按照惯例，他们表演的舞蹈被分成“软舞”和“健舞”两大类¹⁴³。白明达创作的“春莺啭”就是属于最典型的软舞。春莺啭是一首风姿婀娜、细腻优雅、富有诗意的舞蹈。但是在当时最为流行的，因而在唐朝诗人的笔下提到的最多的舞蹈则是健舞。唐朝的健舞中，有三首舞蹈是相当有名的，而“胡腾舞”就是其中之一。舞胡腾者一般都是石国的男童。他们身穿窄袖伊朗上衣，头戴尖顶高耸的帽子，帽子上缀着光珠。这些男童的身上还系着长长的飘带，当他们伴随着琵琶、横笛音乐，蹲身、旋转，快速跳跃时，长飘带的另一端也随着飘逸高扬¹⁴⁴。“柘枝舞”¹⁴⁵是因起源于现代的塔什干附近的地区而得名的¹⁴⁶。舞柘枝者是两名女童。她们的身上穿着饰有银带的五色绣罗宽袍和典型的西极¹⁴⁷才有的窄袖罗衫，头上戴着尖帽，帽子上装饰着金铃，脚上穿着红锦靴。演出开场时，台上有两朵人工制作的莲花，莲花绽开之后，两名舞女从花瓣中缓缓地显现在观众面前，然后随着急剧的音乐翩翩起舞。这是一支含情脉脉的舞蹈：舞女频频向观众递送秋波，舞至曲终，则脱去罗衫，裸露出圆润丰腴的酥肩¹⁴⁸：平铺一合锦筵开，连击三声画鼓催。红蜡烛移桃叶起，紫罗衫动柘枝来。带垂钿胯花腰重，帽转金铃雪面回。看即曲终留不住，云飘雨送向阳台¹⁴⁹。白居易写的这首《柘枝妓》是九世纪初期唐朝诗歌中反映外来事物诗歌的一个优秀范例。在这首诗歌的最后一行中，揭示了诗歌的爱情主题。诗中以“阳台”以及“云雨”等象征性的描写，将这些貌若天仙的舞妓与巫山神女的传说联系了起来，并由此来暗示性的结合。“桃叶起”句很不好理解，它似乎是指一种焰火表演¹⁵⁰。在所有这些来自西域的年轻舞妓中，最受唐朝人喜欢的是“胡旋女”¹⁵¹。许多胡旋女都是作为礼物，由俱密、史国、米国，特别是由康国的统治者在唐玄宗在位时期，也就是在公元八世纪前半叶被送到唐朝来的¹⁵²。这些粟特女子穿着锦缎做成的绯红袍，绿锦裤，红鹿皮靴，舞台上放着一个大球，随着球的滚动，舞女在球的顶端腾跃、旋转，以满足富豪和权贵奢侈放纵的心目之好。唐玄宗非常欣赏胡旋舞，杨贵妃和安禄山也都学会了表演这种舞蹈¹⁵³。就某些方面而言，这种欣赏胡

旋舞的风气，在当时确实被看成了天将乱常的一种征兆¹⁵⁴。

第二章 人乐人和舞伎（10）（图）

乐队 佚名 中唐 甘肃敦煌莫高窟¹⁵⁹窟西壁佛龕北侧

这是文殊变下部的乐队，一人打串板，一人吹横笛，一人吹笙。三位乐人眉目清秀，楚楚动人。三人眼睛的形状和神态各不相同，但都全神贯注，沉浸在乐曲旋律的美妙境界中。优雅的演奏动作，灵巧娴熟的指法，特别是吹笙乐人跷起的大拇脚趾，正合着音乐节奏轻轻地敲打，形神兼备，生动传神。来自亚洲其他地区的乐工和舞伎，要比中亚地区少得多。然而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各国也曾经向唐朝贡献过乐舞。贞元十六年(800)位于唐朝西南边疆的南诏国向唐朝宫廷贡献了一部乐舞，为唐朝皇帝表演助兴¹⁵⁵。这种外来音乐在当时可能就已经是一种混杂的音乐了，因为在几年之前，一位前往南诏的唐朝使臣曾经在南诏本地见到过龟兹乐人，而这些乐人则是在很久以前由唐玄宗赐给南诏的。直到这位使臣见到他们的时候，龟兹乐人仍然还在南诏的乐队中演奏¹⁵⁶。八世纪末年，当南诏被最终征服¹⁵⁷，通往唐朝的道路开通之后，骠国在贞元十八年(802)贡献了一支由三十五位乐工组成的乐队。据记载，“骠国乐多演释氏之词，每为曲皆齐声唱，各以两手十指齐开齐敛，为赴节之状”，当他们演奏乐曲时，是用海螺壳和镌刻精美的铜鼓来伴奏的，这种铜鼓与唐朝“南蛮”富室豪酋拥有的铜鼓非常相似¹⁵⁸。早在开元十二年(724)，尸利佛誓国就曾经向唐玄宗贡献过“杂乐人一部”¹⁵⁹。九世纪后半叶，诃陵国也曾遣使向唐朝献女乐¹⁶⁰。大历十一年(777)，渤海国遣使来朝，并且贡献“日本舞女一十一人及方物”¹⁶¹。另外还有一次，一位日本使臣带来了稀有的海螺作为贡礼¹⁶²。七世纪时，当高丽、百济被唐朝政权平定之后，他们的音乐也成了战利品，整个的乐队及其乐器、曲谱都被胜利地带回了唐朝¹⁶³。高丽乐工及其后代忠实地为唐朝朝廷演奏了一个多世纪，直到七世纪末期，他们还知道二十五首乐曲，但是到了八世纪末，他们就已经只能记得一首了。这些音乐俘虏的祖先穿的本民族的服装，到这时也已经完全失传了。而被俘的百济的乐工则在八世纪初期就已经散失殆尽了¹⁶⁴。北朝鲜人(即高丽人)的乐工之所以具有更强的耐久性，可能要归功于元和十三年(818)连同乐器一起贡献给唐朝的两部高丽乐人(当时他们已经臣服了新罗)，故国同行的到来，激发了那些软弱的高丽乐人的生活勇气¹⁶⁵。新罗是朝鲜半岛勃兴的一个国家，也是唐朝的友好邻邦。贞观五年(631)新罗向唐太宗贡献了两名绝色的女乐人，她们楚楚动人的秀发

就如同她们的音乐才能一样出众。唐太宗先是讲了一些诸如“朕闻声色之娱，不如好德”¹⁶⁶之类的格言，接着对站在一边肃立恭听的新罗使臣讲，他如何将林邑贡献给唐朝皇室的两只白鹦鹉送回了本土，最后，他郑重地宣布，这些美貌可爱的少女比外国来的鹦鹉更使人同情，所以必须将她们送回新罗¹⁶⁷。

第三章 家畜马（1）（图）

双骑图 韦偃 唐代 册页 绢本 设色 纵31、横44.5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两匹马都挤压在画面的右下角，右边的那匹几乎已到了画的边缘，但作者通过马扭曲的动态和骑手的朝向告诉我们骑手正改变前进的方向，从而使构图绝处逢生，重心得到了稳定。马的造型夸张、充满气势，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唐朝人对马匹极为重视，马对于人来说，除去用于行旅作战外，还用于郊游、打马球等活动，所以马的形象在艺术品中经常出现，如绘画（包括壁画）、唐三彩、陵墓雕刻等。画家中如曹霸、韩、韦偃等，均以擅长画马而闻名于画坛。韦偃，唐代画家，据记载，他的伯父、父亲都是画家，特别是伯父也擅长画马。韦偃继承了家传，与韩、曹霸同为唐代画马名家，世称“曹韩韦”。韦偃的风格以气势见长，与韩含蓄、稳重的风格区别很大，传世作品有《双骑图》、《百马图》等。

皇太子：一匹飞马，一匹神马，它的鼻子里喷着火焰！我骑在它身上就象在飞，我变成了一头鹰。它凌空奔驰——它接触到地球时，地球就唱起歌来——长在它蹄上的最微不足道的老茧，比赫尔墨斯的横笛还富于音乐性呢。——威廉·莎士比亚《亨利五世》，第三幕，第七场。

在与流动的敌人，特别是与唐朝的贪婪的对手，即游牧民族的战争中，马是供战士骑乘和驮运给养的重要工具，唐朝统治者在亚洲民族中的崇高地位及其广被天下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能够得到的战马的数量，所以对唐朝统治者而言，马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新唐书》里，明确表示了国家武备最终依赖大批战马的观点。当谈到因为遭受疾疫而损失了十八万匹监牧马时，《新唐书》指出：“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国将危亡²。”七世纪早期，正当唐朝建立之初，唐朝统治者发现在陇右（即现在的甘肃）草原上牧养的，他们所掌握的马匹只有五千匹。其中有三千匹是从已倾覆的隋朝所继承的，其余的是得自突厥的战利品³。通过负责马政的地方官吏的悉心照料，到了七世纪中叶时，唐朝政府就宣布已经拥有了七十万六千匹马。这些马被分开安置在渭河以北（即西京北部）的乡村里的八坊之中⁴。从这时起，唐朝政府尽了一切努力，使马匹的数

量一直保持在这样高的水平上，只是在玄宗统治时期之后，即在八世纪中叶，唐朝的养马业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八世纪中叶的战乱使农村变成了荒芜的不毛之地。战祸带来了中央集权的崩溃，此后，大贵族和地方豪强占有了大量的牲畜，其数量最终超过了政府拥有的牲畜⁵。然而，对于马的极大的需求，并没有使唐朝统治者感到非得接受作为贡礼的马匹不可。可能是出于坚定的信念，或者是出于权宜之计，唐朝的君主往往拒绝接受贵重的礼物——不管是舞女还是舞马。因为要坚持讲求道德、清正廉洁的统治，就不应该去接受类似的贵重礼物。唐朝初年的三位皇帝就是这样做的⁶。另一方面，在七世纪期间，外族政权却总是想要同唐朝联姻，进而从中得到好处。于是他们就成群地送来唐朝政权非常渴望得到的战马，以便提出与唐朝公主结亲的要求。所以就唐朝政府而言，接受礼物就等于是宣布了“对外政策”。例如，唐朝在处理两个突厥政权的贡礼时表现出来的不同的态度，就非常值得我们深思——贞观十六年(642)，铁勒献马三千匹，同时向唐朝提出了联姻的请求。但是经过旷日持久的争论之后，唐朝政府最终还是拒绝了这种不体面的妥协，“下诏绝其婚”⁷。然而仅仅是在第二年，唐朝政府却答应了薛延陀提出的请婚的要求，薛延陀因此派遣其突利设向唐朝贡献了五万匹青白杂色和黑鬃⁸的薛延陀马以及大量的牛、驼和羊⁹。唐朝人在观念上将马看做是外交政策和军事策略的工具，与这种观念相适应的，是将乘马看成是贵族的一种特权——乾封二年(667)，唐朝政府企图实施一项歧视性的法令，禁止工匠和商人乘马¹⁰。

第三章 家畜马（2）（图）

翼马 唐代 长350、高345厘米 乾陵陵园石刻 乾陵博物馆藏

置于乾陵司马道，为传说中的神马。昂首站立，两肋雕卷云纹双翼。马是一种贵族动物，除了它对于地主来说具有的实用价值之外，马在古时候还具有更高的特殊的地位。古代的种种传说使马这种动物罩上了一层神圣的色彩，它不仅被赋予了奇异的品性，而且显然被印上了出自神种的烙印。有一则将马视为神圣的神话传说中称，马是龙的近亲，而龙则具有与水的神秘力量近似的神力。的确，几乎所有的名驹都被当做是龙的化身。例如虔诚的玄奘骑过的骏马就是如此。在后来的传说中正是玄奘的这匹马从印度驮回了佛经。在古代时，中国人甚至直接将他们饲养的高大的马称做“龙”¹¹。在所有的古代名马中，最负盛名的是被称做“八骏”的穆天子神奇的坐骑。“骏”在古代汉语中用来指称纯种和健壮的马，这个字常常具有超自然血统的含义，即指那些出自

神秘的西方神马种系的名马，甚至它还隐喻地表示具有人性的英雄。马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但又如同天使一般的动物，它曾经陪伴伟大的周穆王穿过了被视为圣地的昆仑荒漠。对于马的艺术表现，形成了中世纪中国想像艺术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五世纪时描绘的骏马的荒诞不经的形象，被唐朝的收藏家视为珍宝秘藏。他们解释怪异的骏马的形象，认为这是因为“世闻其骏也，因以异形求之”，他们指出，古代的圣贤，甚至连孔子本人的形象，在世人的眼中都是迥乎寻常的。但凡是神圣之物，不管是人还是马，其本质与形象都必定是怪异的和超凡离俗的¹²。在西极，生长着被称为“骏骨龙媒”的神奇的天马，天马的骨头长得类似理想中的，西方神骑的双翼，天马是致龙之兆，也是神龙之友¹³。李白是这样描述天马的： 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纹龙翼骨¹⁴。 关于西方龙马的信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时，当时汉武帝想借助炼丹术士配制的神奇的食物，或者通过精心安排的(和可疑的)古代仪式，来保证他本人的神性和做到长生不老，他渴望能得到一批超自然的骏马，以便带着他飞升天界¹⁵。 据我们所知，在突厥斯坦各地都有水中出生的马的传说。例如龟兹地区就是如此。七世纪时，唐玄奘曾经路过龟兹城。根据他的记载，龟兹一座天祠前有一处龙池，戾难“诸龙易形，交合牝马，遂生龙驹，馭。龙驹之子，方乃驯驾”¹⁶。其实这个故事必定来源于更西部的伊朗地区。长着双翼的马，普遍存在于伊朗地区的艺术作品和神说传说之中¹⁷。甚至长着长腿、小腹的“大食(Tajik)马”(即阿拉伯马)据说也是“西海”¹⁸岸边的龙与牝马交合所生。到汉武帝的时代，典型的神马就已经在传说中被放置到了锡尔河流域的“大宛”(Farghana)，大宛马与波斯诸王骑乘的米底亚的尼萨(Nisaeen)种马是同一个种系，这种马在东、西方都以“汗血马”著称¹⁹。汉代著名的张骞可能就承担了寻找汗血马的使命。其实张骞只是皇帝的个人使节，但也正是他，在公元前二世纪时就已经开通了中国人进入西方的道路。这种神奇的骏马宣告了汉民族龙的时代的到来²⁰。

第三章 家畜马（3）（图）

三彩马 唐代 明器 高54、长52.7厘米 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鲜于庭海墓出土

此马全身白色，马鞍上则披有墨绿色绒毯状障泥，胸前股后络以绿色革带，串以黄色朵花，垂挂金铃等饰件，色彩对比鲜明，造型矫健，形态逼真，将唐朝时期达官贵人的华贵乘骑活脱脱地塑造出来。在中国陶瓷工艺史上，唐三彩以其造型、色彩和施釉工艺开创了一个新的时

代，此器代表了唐三彩的最高水平。虽然张骞本人并没有带回神马，但是最晚到公元二世纪时，中国人就已经从西方得到了一种品系优良，外观神骏的良马²¹，他们将这种马看做是传说中的龙马。虽然这种马并没有长双翼，但它们却长着“龙翼骨”。这种龙马比蒙古种的马身材更高大，而且它经过驯化的变种在中国也很普遍，可是龙马似乎并没有被用做战马，而是被训练成了在仪式上使用的立仗马²²。这些神奇的骏马在动物学上的归属到现在还无法确定。有一位学者曾经将它们描述为“亚利安”马。亚利安马在古代的里海地区附近，这种马以身材高大，脚程快捷而著称于世²³。或许从现代的突厥马中，我们可以识别出亚利安马的后代。土库曼马或突厥马是从突厥斯坦这个地名而得名的。但是这种马分布范围却很广泛，主要散布在波斯、亚美尼亚以及小亚细亚等地区。突厥马有好几个种系，其中最优良的品种栖息在咸海和锡尔河以南的地区或者是阿姆河地区。这种马的身高一般有十五到十六掌宽，具有非常强的耐力。突厥马的体形特征是头部硕大，高鼻梁，母羊式的脖颈，身材纤细，四肢修长。虽然它们的颜色一般都呈栗色和灰白色，但有些则是黑身白蹄。从突厥马的速度以及它们所具有的美丽的身材来看，我们可以将它们看做是阿拉伯马系与本地的一种原始品种的杂交种马。毫无疑问，它们或多或少与蒙古草原野马也有近亲关系……

24 汉代中国人观察到的“双脊”，揭示了这种马表现出来的阿拉伯马的成分²⁵。所谓“双脊”就是指在马的脊椎两侧之上的两条肉脊，长了这种肉脊的马，驽背骑起来非常舒服。“双脊”也是西方古典时代非常欣赏的一个特点²⁶。而另一方面，李白诗中提到的“虎纹”，则表明了这种马表现出来的返祖成分。“虎纹”就是“鳃纹”，它实际上是马的背部的下方的一种暗色条纹。就如同挪威产的暗褐色马一样，鳃纹是许多原始马具有的共同特征，从亚细亚野驴身上也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这种特点。

唐朝人将康国出产的马引进唐朝，作为繁殖唐朝战马的种马。他们确信，从土地丰饶的康国引进的这种马，就是最初的大宛马的种系²⁷。唐朝人还了解到了“多雪不风”的迦湿弥罗的山谷中出产“龙种马”的消息²⁸。根据十一世纪初期的一个故事中的记述，我们知道在八世纪中期时，拔汗那国曾经向唐玄宗贡献过六匹真正的汗血马。这六匹马的名字分别叫做“赤叱拨”、“紫叱拨”、“绯叱拨”、“黄叱拨”、“丁香叱拨”和“桃花叱拨”。“叱拨”(Cherpdh)这个词在粟特文中的意思是“四足动物”。唐玄宗高兴地接受了这些马，并且给它们起了新的更典雅的名字，将马的形象画在了大殿的墙壁上²⁹。这个故事的编者是一位叫秦再思的文人，他生活的时代距离这起传说事件大约有三个世纪之久。人们可能会将这个美妙的故事单单归结为作者本人的怀旧想像，例如，对于这种马的原产地，秦再思浪漫地使用了这个地区的古名“大宛”。但是我们认

为，对秦再思记载的这个故事不能彻底加以否定。首先，中国人对于外国，总是倾向于使用已经废弃的名称；其次，在可靠的历史记载中，确实有关于大宛向唐朝贡马的报道(遗憾的是，在报道中既没有对马加以描述，也没有具列马的名称)³⁰。而且，“赤叱拨”这个名称也不止一次地出现在八世纪的文学作品当中，这个名称甚至还被用来称呼一种特殊品种的中国猫，而这种猫则的确出产于甘肃的灵武³¹。总之，我们倾向于相信这些关于唐朝汗血马的记载和关于唐玄宗的马的壁画的传闻。然而不管有关这些马的记载是否真实，中国古时候说的汗血马的种系带有想像的特点，这一点应该是无可置疑的。

第三章 家畜马（4）（图）

蒙古马

因勇敢顽强而在全亚洲备受重视的蒙古马是蒙古人最宝贵的财富。这些额宽腿短、身体粗壮的骏马得到了悉心的照顾，满3岁的马才可以骑，路途遥远时要数次更换新马。成吉思汗对马的待遇定下了严格的规定，其中一条是禁止牵戴着嚼子的马。正是这种马的素质和高明的用马之道造就了蒙古人军事上的优势。战时之外，马匹在礼仪规矩和民间传说中也扮演着显著的角色。虽然可以宰食瘦弱的马，但绝对不能宰食在战场上骑过的马。蒙古人崇拜速度和耐力非凡的马，最后会将其死去坐骑的皮毛和头骨当做神圣的遗物保存起来。图为一位蒙古猎手同其坐骑在一起，彼此都矮小强壮、不可分离。自古以来，中国人所熟知的马是一种头部硕大、鬃毛直立，冬季全身长满了粗毛的矮种马。这种马曾经生活在北亚和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法国和西班牙旧石器时代的人们也常常可以见到这种马。它就是亚洲草原上的野马。在中国北部鄂尔多斯地区更新世的沉积物中，曾经发现过亚洲草原野马的骨殖³²。现在只有在准噶尔地区才可以见到这种草原野马³³，但是准噶尔的草原野马也已经濒临灭绝的边缘³⁴。这种草原野马(*Equus przewalskii*)也有其经过驯化的亲枝散布在世界各地，无论是像挪威产的暗褐色马那样的比较纯的种系，还是那些由于与阿拉伯马血统混合而发生了很大变化的种系，都与草原野马有着亲缘关系³⁵。中国人依赖的主要是经过驯化的蒙古矮种马，而蒙古矮种马大体上也属于草原野马的种系。这种马与典型的草原野马的区别在于，它有长而飘逸的鬃毛、额毛以及粗大的尾巴，而这些特点很可能也是与阿拉伯马杂交的结果³⁶。古代的许许多多毛色各异，种类不同的马的种系，可能都是以草原野马为祖系，在其他一些未知种系的马的血统的影响下，逐步演变、发展而来的。例如，传说中与夏代

有关的黑鬃白马，商代的黑头白马以及周代的红鬃黄马等等，都属于这种类型。甚至早在周、汉时代，汉文中有关马的种类的词汇就已经很丰富、很复杂了。这表明当时中国人在繁育马的技能方面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³⁷。尽管唐朝人非常渴望能够得到身材更为高大魁伟的西方马，但是他们似乎仍然还保留着某种对于野生矮种马的爱好。例如在永徽五年(654)时，吐蕃人曾将一百匹野马作为贡礼献给了当时在位的天子，这表明他们认为唐朝天子是乐意接受这种贡礼的³⁸。与草原野马出自同一原始种系，但是或多或少混杂了西极马的血统的，还有一些非常少见，而且又独具特色的中世纪中国马的类型。例如，唐代在今天的陕西繁育出来的一种“朱鬃”白马就是属于这种类型³⁹，这种马很可能是典型的周代马的残遗种；瘦削而结实的四川矮种马，是唐代州的特产，但是在许多世纪以前，中原的西邻各国就已经听说了这种马⁴⁰。唐朝的“国马”(即由政府选育的马，例如驿马、战马等等)中有许多是草原野马和阿拉伯马的杂交种马，而有些则主要是阿拉伯马。有时候，为了国防目的喂养的马的数量太少时，就需要引进外来的马，以补充国马数量的不足。例如在八世纪初年，唐玄宗曾经下诏，批准与“六胡州”市马⁴¹。但是阿拉伯马的种系在唐朝处在不利的境地，蒙古矮种马就在毗邻唐朝的地区，所以阿拉伯马很难保持与蒙古矮种马相抗衡的地位。到了唐朝灭亡之后，西方骏马的种系就开始渐次消亡，而随着元、明时代蒙古矮种马的大量涌入，到了近代的初期，西方马的种系就完全绝迹了⁴²。

第三章 家畜马（5）（图）

献马图 唐乾封元年 高146、长154厘米 1990年咸阳市礼泉县韦贵妃墓出土 昭陵博物馆藏

画面绘有两名控夫和一匹良马，反映了西北少数民族向唐王朝贡献良马的情景。两名卷发阔口、高鼻深目的控夫身着胡服、体格健壮，一人紧按马头，另一人牢抓丝缰，刚制服了一匹余怒未息的烈马，整个画面极具写实性。在唐朝帝国统治期间，北方矮种马和西方的战马这两种外来马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杂交种马和其他品种的马，都大量进入了唐朝的境内。唐朝人对于外来的马非常喜爱，也非常欣赏。唐朝这种崇尚外来马的风尚部分地可以归结为西方龙马传说的影响，部分地则应该归结于突厥人以及那些与突厥有血亲关系的遥远的游牧统治氏族。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对于唐朝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众多的骑马者以及玩波罗球游戏的贵族对马的需求甚大，而唐朝境内牧养的马匹一向都很缺，这就自然地导致了对外来马的喜爱。有关远国绝域出产的良马的传闻，也深受唐朝人的欢迎，他们甚至连那些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传闻也深信不疑。例如，唐朝人听说常年积雪的极北地区有一个“马国”⁴³。国家的名称很可能是从突厥部落的名称“Ala-yondlu”(有花斑马者)翻译来的。根据传说，这种马在其原产地受到了屈辱的待遇，被用来耕田，我们不知道这种身上带有花斑的马是否曾经到过唐朝的境内⁴⁴。大食国地方甚至比马国还要遥远，大食人的战马能解人语，唐朝人对这一点惊叹不已⁴⁵。长安三年(703)，一位穆斯林使臣曾经将一批这种纯种的马带到了唐朝⁴⁶。但是这些马后来的遭际如何，对此我们一无所知。唐朝的更为可靠的马的来源是东北地区，即来源于渤海⁴⁷、室韦和奚部落。渤海分布在黑龙江以南的地区⁴⁸，室韦⁴⁹的居住地在渤海以西⁵⁰，而奚部落则在更南的地区。元和十一年(816)，奚人“遣使献名马，尔后每岁朝贡不绝，或岁中二、三至”⁵¹。契丹人也分布在东北地区，日后他们将注定成为中国北部地区的统治者。七、八世纪期间，契丹曾经派遣了许多使臣，带着形体矮小，惯于驰走于林木之间的契丹马向唐朝朝贡⁵²。突厥人位于唐朝的北境，突厥马是唐朝马的主要来源。“突厥马技艺绝伦，筋骨合度，其能致远，田猎之用无比，《史记》匈奴蓄马，即也。”⁵³突厥马对于自傲的唐朝人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为了得到急需的马匹，被迫在许多细枝末节的问题上降尊纡贵，折节相求。例如在唐朝初年，汉阳郡王李环有一次亲自到了遥远的突厥汗帐。突厥可汗“始见环倨甚。环开说，示以厚币(这些丰厚的礼物中必

定有成匹的丝绸和成瓮的佳酿)，乃大喜，改容加礼，因遣使随入献名马”⁵⁴。突厥人除了得到礼物之外，还可以得到其他一些小小的好处。然而唐朝人并不总是利用物质的礼物来作为获取突厥良种马的代价。在开元十九年十二月(731—732)突厥雄主伽可汗向唐朝京城送去了五十匹马。而这些马则纯粹属于谢恩的性质。原来在此之前不久，可汗的弟弟去世了，唐朝派了六名画工前往草原帐篷城，为死去的突厥特勤写真，画像工妙绝伦，“伽每观画处，嘘唏如弟再生，悲泣不自胜”。于是伽可汗在护送画工返回唐朝的同时，顺便献马谢恩⁵⁵。唐朝人就是这样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诱使北方的突厥部落——不管是薛延陀还是乌古斯(九姓部落)——将大量的马匹送进了唐朝的马厩，有时一次就有五千匹之多⁵⁶。但是在唐朝马匹的供应者当中，最大的，也是最傲慢的供应者是回鹘人。八世纪中叶以后，回鹘人就控制了唐朝的马市。当时唐朝对内、对外的战争连绵不绝，从而造成了正在衰落的大唐帝国对于马的无法满足的需求。回鹘和吐蕃这时也成了唐朝主要的外敌和天然对手，于是唐朝政权将外交政策转向回鹘一边，利用回鹘来与吐蕃对抗。在这一时期，吐蕃人不仅尽数赶走了唐朝在陇右牧放的成千上万匹良马⁵⁷，而且甚至还攻陷了唐朝的都城长安；而傲慢自负的回鹘人则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对卑躬屈膝的唐朝人颐指气使——因为正是回鹘人凭借他们自己的优势才赶走了高原上的吐蕃人。回鹘人的傲慢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甚至公然在唐朝的土地上袭击唐朝人。尽管社会上对回鹘人蛮横无礼的行为怨声载道，但是唐朝政府还是将有利可图的马匹贸易垄断权交给了回鹘，以此作为他们帮助唐朝的回报⁵⁸。以前，谄媚奉承的回鹘使臣将免税纯种马作为贡礼送到长安，希望能讨得东方君主的欢心，现在他们已经不用这样做了。如今的回鹘使臣与唐朝的关系，是精明练达而讲求实际的商人与素有教养但却又柔弱的汉人(对于外族人而言，他们似乎确是如此)之间的关系。这时的汉人对回鹘人表示出了应有的敬意，而且要按照卖方的价格支付马价。在八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中，一匹回鹘马的普通价格为四十匹绢，这对于唐朝来说是一笔令人触目惊心的支出⁵⁹。九世纪初年，衰落疲弊的唐朝政权一年支付上百万匹绢来交换北方边境地区淘汰下来的老弱不堪的弩马，已经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⁶⁰。唐朝皇帝一度也确实想限制这种虚耗国力的交易。大历八年(773)，回鹘派遣一名特别代理商，赶着一万匹马来到唐朝请求互市。这批马的价钱甚至比唐朝政府每年的收入还要多⁶¹。当时在位的唐代宗是一位很有头脑的皇帝，他因为费用过大，“.....不欲重困于民，命有司量入计，许市六千匹”⁶²。

第三章 家畜马（6）（图）

黑釉三彩马 唐代 明器 高66.5厘米1971年 河南省洛阳市关林出土

唐马雕塑一改秦汉时期那种平稳古拙的风格，而以生动的高昂姿态著称。唐墓中出土的各种三彩马，尽管千姿百态，却都有头小、臀圆、体态均匀、膘肥体壮的特点，是当时西域马体型的写照。这件马俑除面、鬃、尾、蹄涂白釉外，全身披黑釉，在唐三彩中实属罕见，而且造型雄健，釉色匀称，姿态自然，是唐三彩马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九世纪初期，黠戛斯人⁶³危险地游荡在突厥本土的北方边缘地区。黠戛斯人将是回鹘亡国的祸根，他们被描述为身材长大、皙面、绿瞳、赤发的人⁶⁴。在七世纪后半叶和八世纪前半叶，黠戛斯努力使他们的马通过敌对的地区，顺利地送到唐朝的边境⁶⁵。从唐朝的玉门关到咸海地区，横断整个中亚地区的是西突厥和臣属于西突厥的亚利安种居民。他们也将本地的马送到了唐朝庞大的马厩之中⁶⁶。

来自河中地区的辽阔平原、富庶的城市及其附近山区的马，都具有近乎纯正的阿拉伯马的血统，这些地区的马主要是在八世纪时，即那充满活力的唐玄宗统治时期引入唐朝的。康国⁶⁷、安国⁶⁸、拔汗那国⁶⁹、吐火罗国⁷⁰、石国⁷¹、史国⁷²、曹国⁷³、米国⁷⁴以及骨咄国⁷⁵等国都曾向唐朝贡马。

在唐代，蒙古种吐谷浑人先前值得骄傲的地位已经大大衰落了，永徽三年(652)吐谷浑从吐蕃边界地区向唐朝贡马⁷⁶，两年之后，吐蕃人自己也为唐朝朝廷送来了一百匹马⁷⁷。但只是在九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间，即受挫于回鹘之后，吐蕃马才成了唐朝马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供给来源⁷⁸，而且即使是在这一时期，由吐蕃贡献的马与傲慢的回鹘人相比，也是微乎其微的。

西域城郭诸国也是向唐贡献良种马的地区之一。其中龟兹曾几次贡马⁷⁹，于阗也至少贡献过一次良马⁸⁰。在七世纪后期，胜利的大食人也曾经有一次向唐朝贡献他们的第一流的骏马⁸¹，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八世纪初期，大食又献过一次名马。在唐玄宗统治的黄金时代，大食人特意几次遣使来朝献马⁸²。宾国(即古代的Gandhara)位于印度西北边疆地区，这里适宜于热带稻米的生长，盛产大象；佛法非常兴盛但却处在突厥的统治之下。在君临天下的天可汗(Tengri Qaghan)唐太宗在位期间，甚至连遥远的宾国也在贞观十一年(637)遣使贡献名马⁸³。地处唐朝西南边疆，正在兴起的南诏国，也在贞元十一年(795)遣使向朝廷贡献了六十匹品种不详的马⁸⁴。

开元十五年(727)，唐朝政权准许在政府官方的监督之下，在鄂尔多斯地区边界设立“互市”，互市的设置，将唐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重要的马匹贸易制度化了。互市政策的目的是，要增加唐朝马的数量，并且通过与合乎需要的胡马的杂交来改进“国马的品种⁸⁵。设立互市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唐玄宗收到了突厥毗伽可汗贡献的三十匹名马的友好贡礼，与此同时，毗伽可汗还送来了

一封吐蕃君主写给他本人的信件。吐蕃人在信中怂恿毗伽可汗与吐蕃一起入寇唐朝边境，但是毗伽可汗却派使臣将信送给了唐玄宗。玄宗对毗伽可汗的友好举动非常赞赏，于是下诏：……仍许于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之所，每年赍帛数十万匹，就边以遗之⁸⁶。这样一来，西受降城就成了北方部落的马匹进入唐朝的固定地点。此后，我们就可以在唐史中见到如下的记述：“令西受降城使印而纳之”⁸⁷—这段文字是附在九姓、坚昆以及室韦在天宝六载十二月(748)献马六十四匹的呈文之后的。开元廿九年(729)，唐朝政府又在与吐蕃交界的赤岭地区设立了类似的贸易机构⁸⁸。在政府允许的范围以外，在唐朝边界地区也存在着活跃的私人贸易活动。尤其是居住在唐朝西北边疆地区的党项居民，他们就是因为从事私人贸易而致富的。在九世纪初年，党项人“以部落繁富，时远近商贾，赍缯货入贸羊马”⁸⁹。可是这种繁荣是很不稳定的，就在九世纪三十年代，党项人因为贪暴的唐朝官吏的巧取豪夺而被迫反抗，“藩镇统领无绪，恣其贪婪，不顾危亡，或强市其羊马，不酬其直，以是部落苦之，遂相率为盗，灵、盐之路小梗”⁹⁰。在由政府管理的，大规模的边疆贸易集散地，马和骆驼、驴、羊等牲畜都是由政府主管人进行接收、检查和登记工作，然后送往特定的牧场或朝廷的马厰。在由边疆递送往内地的路途上，每十匹马分为一组，每组由一个牧人单独管理⁹¹。从启程时起，这些马就受到政府的精心照料，政府最为关心的是要使这些马尽可能少的受到伤害，避免丢失或者被盗。无论在什么时候，管理政府马匹的人员都要对他管理的马的安全和健康负责。马若不死尚可，如果要是死了马的话，管理马的人就得提供死亡的确切证据，报告使用马的人应负多少责任等等。按照规定，要尽可能详细地履行这一套程序，哪怕是最细微的情节也不能遗漏。例如，如果长行马(即用于长途旅程的马，长行马与用于固定路途的驿马不同)死在途中的话，就得将马肉卖掉，而马皮则要送回政府的仓库。但是如果马是死在沙漠里，而且附近又没有买马肉的人的话，骑马人只需带回马身上那块烙有政府印记的马皮(如果他本人还能够回来的话)就可以了⁹²。

【关注公众号】：[奥丁读书小站（njdy668）](#)

- 1.每日发布新书可下载。公众号首页回复书名自动弹出下载地址。
- 2.首次关注，免费领取**16**本心里学系列，**10**本思维系列的电子书，**15**本沟通演讲口才系列，**20**本股票金融，**16**本纯英文系列，创业，网络，文学，哲学系以及纯英文系列等都可以在公众号上寻找。
- 3.我收藏了**10**万本以上的电子书，需要任何书都可以这公众号后台留言！看到第一时间必回！
- 4.也可以加微信【**209993658**】免费领取需要的电子书。

5.奥丁读书小站，一个提供各种免费电子版书籍的公众号，提供的书都绝对当得起你书架上的一席之地!总有些书是你一生中不想错过的!上千本电子书免费下载。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大唐盛世历史概况（1）（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历史概况（2）（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历史概况（3）（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历史概况（4）（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历史概况（5）（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的外国人（1）（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的外国人（2）（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商船与海路（1）（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商船与海路（2）（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商队与陆路（1）（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商队与陆路（2）（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1）（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2）（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3）（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4）（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5）（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6）（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7）（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8）（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9）（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唐朝外来居民的待遇（1）（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唐朝外来居民的待遇（2）（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唐朝外来居民的待遇（3）（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唐朝外来居民的待遇（4）（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唐朝外来居民的待遇（5）（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进贡](#)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胡风（1）（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胡风（2）（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胡风（3）（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胡风（4）（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胡风（5）（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胡风（6）（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外来事物在文学中的反映（1）（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外来事物在文学中的反映（2）（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外来事物在文学中的反映（3）（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外来事物在文学中的反映（4）（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外来事物在文学中的反映（5）（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外来事物在文学中的反映（6）（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外来事物在文学中的反映（7）（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外来事物在文学中的反映（8）（图）](#)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外来事物在文学中的反映（9）（图）](#)

[第二章 人战俘（1）（图）](#)

[第二章 人战俘（2）（图）](#)

[第二章 人战俘（3）（图）](#)

[第二章 人战俘（4）（图）](#)

[第二章 人奴隶（1）（图）](#)

[第二章 人奴隶（2）（图）](#)

[第二章 人奴隶（3）（图）](#)

[第二章 人侏儒（1）（图）](#)

[第二章 人侏儒（2）（图）](#)

[第二章 人人质（图）](#)

[第二章 人贡人](#)

[第二章 人乐人和舞伎（1）（图）](#)

[第二章 人乐人和舞伎（2）（图）](#)

[第二章 人乐人和舞伎（3）（图）](#)

[第二章 人乐人和舞伎（4）（图）](#)

[第二章 人乐人和舞伎（5）（图）](#)

[第二章 人乐人和舞伎（6）（图）](#)

[第二章 人乐人和舞伎（7）（图）](#)

[第二章 人乐人和舞伎（8）（图）](#)

[第二章 人乐人和舞伎（9）（图）](#)

[第二章 人乐人和舞伎（10）（图）](#)

[第三章 家畜马（1）（图）](#)

[第三章 家畜马（2）（图）](#)

[第三章 家畜马（3）（图）](#)

[第三章 家畜马（4）（图）](#)

[第三章 家畜马（5）（图）](#)

[第三章 家畜马（6）（图）](#)